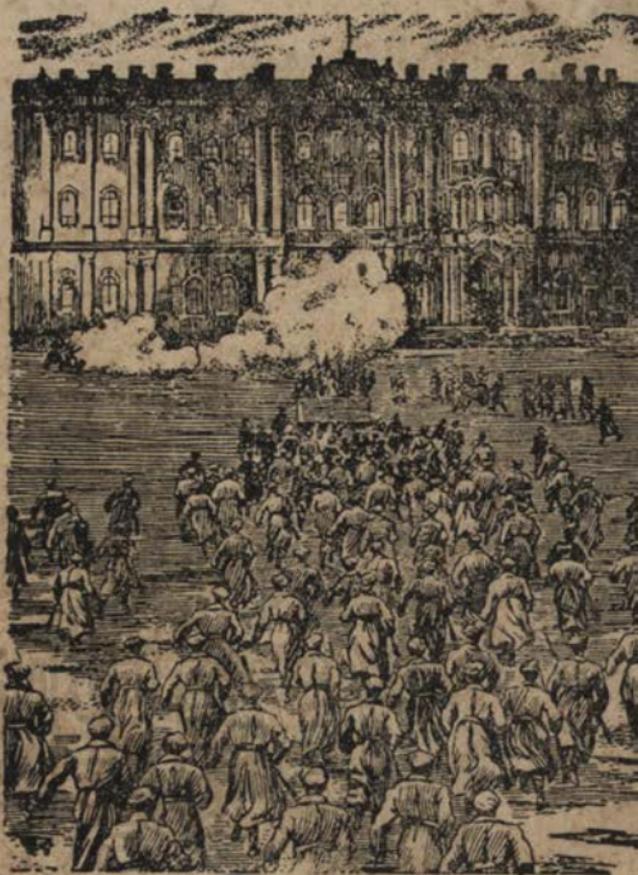




74
85

舊

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



19

列 寧 著
莫 師 古 譯







列寧 著
莫師古 譯

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

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經售處

各大書店

譯者

莫

師

古

古

著者

列

寧

寧

寧

每冊實價肆角伍分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出版

710. V
854

目錄

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階段（遠方來信，第一）	一
論目前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	二六
論兩個政權	二五
論策略書	三
無產階級政黨的綱領之草案	二五
我們的觀點	一〇一
致全俄農民代表大會一封公開信	二〇八
土地問題決議案的草案	二一五
在轉變中	二一八
六月十八日	二二
論口號	二六

國家圖書館



002878403

農民和工人	二二
致社會民主工黨（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書	一五一
論妥協	一五一
布爾塞維克必須奪取政權	一六六
馬克思主義與暴動	一七〇
革命的任務	一八一
危機成熟了	一九五
布爾塞維克能否維持政權	二〇五
論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	二二六
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彼得格勒委員會及莫斯科委員會書	二八一
局外人的建議	二八五
致同志書	二八九
論十月革命	三三一

論和平

..... 三三二

和平宣言

..... 三三六

結論

..... 三三一

論土地

..... 三三六

土地令

..... 三三九

關於言論自由的演說

..... 三四一

通告大眾的無線電

..... 三四四

工人勞苦的及被剝削的農民聯合

..... 三四七

論銀行的國有

..... 三五二

立憲會議提綱

..... 三五五

勞動的和被剝削的人民之權利宣言

..... 三六一

社會民主工黨布爾塞維克黨團的宣言

..... 三六七

關於立憲會議的演說

..... 三六九



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解散立憲會議令

和平提綱

三六九

三七六



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階段

——遠方來信，第一——

「因世界帝國主義大戰而產生的第一次革命，爆發起來了。這第一次革命大概總不會是最後一次的吧！」

根據在瑞士寫這篇文章時，所得到的枯燥消息，說這第一次革命，即一九一七年三月一號的俄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已經完結了。這第一階段，大概總不會是我們革命中最後的階段吧。

沙皇專制政體已堅持了幾世紀，他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全國的階級大激戰中，能不顧一切堅持下來，這些的專制政體，祇在八天內，便崩毀了（如密留柯夫在致俄國全體駐外代表的得意洋洋的電報上所說的），這種怪事，從何而來的呢？

在自然界中，在歷史中，怪事是從來沒有的；但是歷史上各種緊張的轉變（包括各種的革命），給我們以這樣豐富的內容，展開這樣出於意外的特出的鬥爭形式

和鬥爭力量相互關係之總合，使庸人看來，多成怪事了。

要使沙皇的專制帝國能在幾天內崩裂下來，一定要有全世界歷史上許多重要條件的總合。我們現在僅舉其要者：

如果沒有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三年中，俄國無產階級的偉大的階級激戰和革命的毅力，那麼第二次革命，或許就沒有這樣的迅速（指幾天內完成了革命的開始的階段）。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深刻地震動了帝制的基礎，掃除了幾世紀的舊習，警醒了數百萬工人和數千萬農民，使他們進入政治生活和政治鬥爭中，相互的指示出（並且指示給全世界看）俄國社會的一切階級（和其主要的政黨），指出他們的本質，他們利益和力量的相互關係和他們目前及將來的目的，第一次革命和革命以後的反動時期（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四）盡形暴露了沙皇專制政體的內容，使之纖微畢露。揭破了沙皇以拉斯布丁（Rasputin）為首的沙皇狗黨底一切腐敗、醜、淫亂、放蕩，顯示了羅曼諾夫（Romanov 沙皇姓）朝的殘暴，這些羅曼諾夫輩的強盜，把猶太人、工人、革命者的鮮血，洒遍了全俄國；這個擁有千百萬俄畝土

地的「一等之一」的地主，爲保障自己和自己階級的神聖的財產起見，就是什麼殘暴舉動，什麼滔天罪惡，對於任何公民的摧殘和屠殺，都無所不爲了。

倘若沒有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的革命，沒有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四年的反革命，那麼俄羅斯民族和居住於俄國的其他民族的各階級，或許就不能有二月三月革命的八天內所表現出來的這樣確定底自決；這些階級相互中間和專制對於沙皇的關係，或許就不能像二月三月革命的八天內所表現出來的那樣確定。倘然可以玄妙些說，那麼這八天的革命，正有經過十數次主要和次要的練習後方才「排演」出來的戲；「角色」都相互知道自己的作用的地位，熟知自己的境遇，以至透悉較大的政治方向和行動方法。

爲古契柯夫 (Guchikov) 密留柯夫 (Mihnikov) 諸先生及其走狗們斥爲「大逆不道」的一九〇五年第一次偉大的革命所以能夠經過十二年而進到一九一七年的「雄壯」『光榮』的革命（古契柯夫和密留柯夫之流，稱這革命爲『光榮』，祇因這革命，此刻給他們以政權），其中一定要於偉大的有力的萬能的『導演者』，這個導

演者一方面能夠非常的加速世界歷史的進程，他方面能夠產生全世界經濟上、政治上、民族間、國際，種種恐慌的空前的力量。除通常的世界歷史進程的加速以外，是特別要有世界歷史的緊張的轉變，使在其中的一次轉變中，可把滿染羅曼諾夫沙皇全部腥血的牛車，一下子顛覆過來。

這個萬能的『導演者』這個有力推進物，便是世界帝國主義大戰。

這個戰爭之爲全世界的戰爭，已是無可疑慮的事實，因爲美國和中國，今天已有一半牽入，明天恐怕要全部捲入漩渦之中了。

從雙方看來，這次戰爭帝國主義性，現已成爲無可疑義的事實了。祇有資本家和其僕從，社會愛國主義者，和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方能否認或遮掩這個事實。德國資產階級和英、法資產階級之所以進行這個戰爭，都是一樣的爲着剝削別國，爲着要在財政上統治世界，爲着分割和重分殖民地，爲着要用欺騙和分裂各國工人的方法，來挽救將近滅亡的資本制度。

帝國主義的戰爭，客觀上一定是不可避免的要特別推進和空前地加厲無產階級

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帝國主義大戰一定要轉變為敵對階級間的國內戰爭。

這種轉變開始於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三月的革命，這個革命第一階段，指示出二種力量共同對專制沙皇的打擊，這二種力量，一方面是俄羅斯全部資產階級和地主，及其不自覺的僕從，與自覺的作領導者英、法大使和資本家；他方面則是工農兵代表蘇維埃。

三個政治的營壘，三個主要的政治力量：（一）沙皇的專制政權，此乃農奴主與地主的首領，舊時官僚將軍們的首領。（二）俄國的資產階級，地主的十月黨——立憲民主黨，他們後面跟着小資產階級。（三）工農兵蘇維埃，他在全部無產階級和全部貧苦民衆中，尋找同盟者——就在革命「第一階段」的八天中，就在那樣遠和事變相隔而祇在外國報章上尋找枯燥消息的觀望者，即作者看來，這三種主要力量也已經非常明顯地暴露出來了。

但在未詳細說及這點以前，我先要講信上所說的第一有力的原素——全世界帝國主義大戰。

戰爭把交戰各列強，交戰的資本家，資本主義制度的主人，資本主義奴隸制度的奴主等等的各個集團，纏縛於鐵鏈之中。一團污血——，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生活。

在戰爭開始就投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的社會主義者，如德國的但維特 (Dauvid) 謝德曼 (Cheideman) 輩，如俄國的普列漢諾夫 (Plekhanov) 波特列索夫 (Potresov) 格服士直夫 (Gvozdev) 之流，很久就高聲大呼，反對革命者的『幻想』，反對巴扎耳 (Bazal) 宣言的『幻想』，反對把帝國主義戰爭變成國內戰爭的那種『嚶語』。他們同聲頌揚，好似資本主義產生了什麼巨大的力量，生命力與適應性。他們幫助資本家，他們使工人適應於資本家的利益，他們擺佈愚弄和分裂各國的工人階級！

但是『誰笑得最後，誰就笑得最好』。資本階級決不能長時拖延大戰所產生的革命恐慌。這種革命的恐慌，在各國，自德國起至英法爲止，都與日俱增，在德國，據不久以前遊訪德國的一位考察家的話，正過着『組織再好沒有的飢荒』，在英、法，也受饑荒，不過他們的組織遠不及德國這樣好罷了。

自然，在破壞得不堪設想，無產階級最革命（並不是因它具有特性，而是因為有「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傳統）的俄國，革命的恐慌，就最先爆發。因為俄國和其聯盟者經過多次敗仗，所以這種恐慌更形加速。軍事上的失敗搖動了整個的政府機體和整個舊的制度，激怒了人民中的一切階級，起來反對牠，敗仗使軍隊更形兇暴，撤去了大批昏庸老朽的貴族式的舊軍官，而代以新起的大部分來自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官吏和小資產階級的青年軍官。

如果戰爭中的失敗，成爲加速恐慌爆發的原素，那麼英、法帝國主義和俄國十月黨，立憲民主資產階級的連繫，更加速了這種恐慌。

英、法的報章，爲着顯明的原因，把這方面非常重要的事實，緘默起來，而德國的報章，則鼓舞地指示出來。我們馬克斯主義者對於官場的謊語，對於戰爭中一個帝國主義集團的外交家和總長們的甜言蜜語，或是別個的集團的財政與軍事競爭者底眉飛目笑，都不爲之吃驚，我們應該透澈地目睹真理。二月三月革命事變的進程，顯明地指示出來，即英、法大使館，帶着他們的走狗，和其「交通者」競爭，

已竭其全力，去障礙尼古拉第二和威廉第二間的『單獨』條約及單獨和平（我們希望得到并且定要獲得這個和平），他們直接想撤換尼古拉羅曼諾夫。

革命之所以能夠勝利這樣迅速和這樣『激進』（表面上，粗看起來），祇是因爲這種完全不同的潮流，完全不同的階級利益，完全相反的政治和經濟的企圖，在非常特別的歷史環境下，融合起來并且非常『親密』地融合起來了。就是說：一方面，英、法帝國主義的陰謀，爲着要延長帝國主義的戰爭，爲着要更激烈地堅決的進行戰爭，爲着要拷榨新的千百萬俄國工農，以求爲古契柯夫獲得君士坦丁；爲法國資本家獲得敘利亞；爲英國資本家獲得美索不達美亞等等起見，於是推動了密留柯夫，古契柯夫之流，上去奪取政權。他一方面：廣大民衆（全體城市和鄉村中的最窮苦的農民）爲着麵包，和平，和真正自由，興起了深刻的革命運動。在某個短促的，時勢形成的特殊時期中，只想掉換皇帝的比根甫（Puchanan）古契柯夫，密留柯夫輩底鬥爭，也給革命的工人兵士以助力；但革命的工人兵士對之並不有所驚喜，他們要把齷齪的沙皇專制政權破壞到底。

事情就是這樣，也祇能是這樣。一個政治家假使不怕真理，而透澈地分析革命中的社會力量的互相關係，假使他不但從目前的特點上，而且還從更深的動機及更深的俄國和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利益關係上去估計一切『時局』，那麼他應該這樣並且也只能這樣去觀察時局。

彼得堡的工人兵士，以及全俄的工人兵士，爲着自由，爲着要把土地給農民，爲着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和平，而堅決地起來打倒沙皇的專制政權。英、法帝國主義的資本家爲着要繼續和加厲這種戰爭，而玩弄宮廷裏的詭計，製造陰謀，慫恿古契柯夫及密留柯夫，屬望於他們，擺佈完全準備好了的新政府，這新政府，在無產階級的鬥爭給沙皇政體以最初的打擊以後，即奪取了政權。

這政府并不是幾個人的偶然湊合。

這是俄國新的階級的代表，這些資本主義地主和資產的代表，在經濟上久已統治了俄國，他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革命時，在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四年的反革命時期中，最後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的大戰期中（這時特別的快），非常迅

速地在政治上組織起來，把地方自治，國民教育，各種形式的大會，國會，軍事工業委員會等等，都奪在自己掌握中了。這個新的階級，到一九一七年時，「差不多完全」當權了；所以沙皇帝制，一經打擊，就崩毀下來，而讓位給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戰爭要求非常緊張的力量，他把落後的俄國發展過程，加速到這種程度，使我們「一下子」（事實上好像一下子）就追上了意大利、英國，差不多也追上了法國，而得到了「混合的」「民族的」（這就是說，適於進行戰爭，和愚弄民衆的）「國會的」政府。

和這個政府（這個政府，從目前戰爭的觀點看來，實際上不過是擁有無數量富的「英法」洋行的夥計而已）并存的，還產生了一個新的，非正式的，尚未充足發展的，還比較柔弱的工人政府，他表現無產階級和鄉村城市中全體貧窮人民的利益。這就是彼得堡的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

實在的政治形勢就是如此，我們應該盡力根據客觀上的最真實的情形，去斷定這個形勢，使我們可以在馬克思策略所應該根據的唯一正確的基礎上，即在事實的

基礎上，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策略。

沙皇的專制政權破壞了，可是沒有破壞到底。

要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到底的十月黨與立憲民主黨底資產階級政府，實際上不過是「英法財政公司」的夥計，他不得不允許人民以最高度的自由和最多的贈品，以期保持自己的凌駕人民的政權，并繼續帝國主義的戰爭。

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乃工人政府的萌芽，是全體最貧苦的即十分之九的民衆的代表，他要去獲得和平，麵包和自由。

這三種力量的爭鬥，造成現在所處的形勢，這是革命第一階段轉到第二階段上去的過渡形勢。

爲着和沙皇專制政體進行實際的爭鬥起見，爲着不但在口頭上不但在自由主義的詭辯家的巧言上，而且在實際上，保障和平起見，不是工人應該幫助新政府，而是這個政府應該「幫助」工人！因爲要擔保自由，擔保徹底破壞沙皇政體，唯一的祇有武裝無產階級、鞏固、擴大，和發展兵士代表蘇維埃的作用，意義和力量。

其他一切豔辭巧語，都是自由主義者或激進派的自欺之談。

假使幫助工人武裝起來，或是至少不加以阻礙，——那麼，自由在俄國，已一往無敵，帝制將再不能恢復，而共和國將獲得保障了。

不然，人民就要被騙。空口允諾，是廉價的東西。空口允諾，是一錢不值的。在一切資產階級革命中，各種資產階級的政客，都是空口允諾，來「灌注」人民，愚弄工人。

取消派方面的一錢不值的政客，這樣的說：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所以工人還應該幫助資產階級。

我們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說：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唯其如此，所以工人應該揭開人民的眼睛，使他們了解資產階級政客的謊語，教訓他們不要相信空話，而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組織，自己的聯合，自己的武裝。

十月黨和立憲民主黨人，古契柯夫和密留柯夫之流的政府，不能（即使他誠心要做的話）給人民以和平、麵包和自由。

他不能給人民以和平，因為他是戰爭的政府，繼續帝國主義血戰的政府，掠奪的政府，他絲毫沒有放棄沙皇時代的政策，而要掠奪阿美尼亞、加立西亞、土耳其，侵佔君士坦丁，征服波蘭、庫爾蘭（Kurland）立陶宛邊陲等地。這個政府，四肢都和英法帝國主義的資本相連。俄國資本祇是全球擁有無數萬萬盧布，而名叫「英法」的「洋行」的支店。

他不能給人民以麵包，因為這政府是資產階級的政府。最多他祇能像德國一樣給人民以「組織得很好的饑荒」。但是人民已不肯忍受饑荒了。人民知道，并且大概很快就可以知道，麵包是有的。而且是可以得到的，但是一定要採取不屈服於資本與土地的神聖私有權之下的辦法。

他不能給人民以自由，因為他是地主和資本家的，畏懼民衆的政府。

關於我們最近怎樣對付這個政府的策略上的任務，我們在別篇文章上再講。在那裏，我們將指出目前時局和革命從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的特點：說明為什麼在這時期，我們的口號及切身的任務，應該是：工人們，你們在反對沙皇帝制的國

內戰爭中，已經表示出無產階級的民衆的特出英雄氣概，你們應該更表現出無產階級和全民衆的組織上的特長，以預備革命第二階級上的勝利。

我們此刻祇限於分析階級爭鬥和階級力量的相互關係，但我們還應該提出這個問題，在這次革命中，無產階級有那些聯盟者？

他有兩方面的聯盟者：第一，廣大的數達幾千萬的，佔俄國人民大多數的半無產階級及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羣衆。這些羣衆需要和平、麵包、自由和土地。這些羣衆，將相當處在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因為他們在生活的條件上，比較最接近小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他們將動搖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戰爭的殘酷的教訓（古契柯夫，爾伏夫，米留柯夫輩，進行戰爭愈是積極，這種教訓愈是殘酷）不可避免的將推動這些羣衆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使之不能不跟從無產階級。我們現在能夠利用新政局下的自由，及兵工代表蘇維埃，我們首先應該用全力去啟發和組織這些羣衆。組織農民代表蘇維埃，農村工人蘇維埃——這就是最切身的任務之一。這上面我們的任務，不僅要使農村的工人形成自己特別蘇維埃，並且還要使

沒有產業和最貧窮的農民，脫離富有的農民，單獨組織起來。關於現在切身需要的組織底特別任務與特別形式，在下信中再說。

第二，俄國無產階級的聯盟者還有全體交戰國和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這些無產階級目前極大的受戰爭的壓迫，並且那些投奔於資產階級方面的歐洲和俄國的（如普列漢諾夫，格服士及夫，波特列索夫之流）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常時利用他的名義說話。但是無產階級之脫離他們影響，因帝國主義戰爭，而與時俱進，俄國的革命，不可避免的更要極大地加速這個過程。

俄國的無產階級，和這兩方面聯盟者一起，利用現在過渡時期的特別情況，可以走到而且正在走向勝利之途，起初是奪得民主共和國以及農民對於地主的完全勝利，然後就走向社會主義；祇有社會主義，方能給顛沛於戰爭中的人民以和平，麵包和自由。

一九一七年三月七號作。

署名 列甯

（初次發表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二一、二二日的一四、一五、二號真理報上）

論目下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

我祇在四月三號夜才到彼得堡，所以我自然祇能夠用自己的名義在四月四號的會議上作「論革命無產階級任務」的報告，並且我事前已經聲明過，對於這次報告，沒有充足的準備。

預備書面提綱，對於我自己，對於好心的反對者，在工作上都可以方便些。我把這提綱讀了，並且把原文交給宰萊台萊同志。我讀得非常的慢，並且讀了兩遍；起初在布爾塞維克的會上，後來在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的聯合會上。

提綱

現在發表我個人的提綱，且僅以最簡短的註解加以解釋，這些註解，將在報告中詳細申說。

一、爾伏夫輩的新政府，是資產階級性的政府，所以從俄國方面看來，目前

的戰爭仍是掠奪的帝國主義的戰爭。在對於戰爭的態度上，我們決不能對「革命的祖國保衛派」作絲毫讓步。

覺悟的無產階級，祇有在下列條件之下，方才可以同意於實在需要革命保衛的革命戰爭：（一）政權轉給無產階級和依附無產階級的一部份最貧窮的農民；（二）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事實上放棄一切併吞政策；（三）實際上完全和資本的利益脫離。

（因革命祖國保衛派羣衆代表的廣大階層，無疑地懷着善心好意，「他們承認進行戰爭祇是因爲必需，而不是因爲奪賊」，因他們實在是受資產階級之欺，所以應當懇切地、堅毅地、忍耐地解釋他們的錯誤，解釋資本和帝國主義戰爭間不可或斷的連系，證明如果要使戰爭歸結於德謨克拉西的和平而不是武力壓迫的和平，那末不能不推翻資本主義）。

在作戰爭的軍隊中，給這種意見，作最普遍的宣傳。

舉行交戰國兵士的聯歡。

二、俄國現時政局的特點，就在革命要從第一個階段轉到第二個階段；俄國革命的第一個階段，因無產階級覺悟和組織的不足，把政權給了資產階級，在革命的第二階段上，政權應該轉到無產階級和一部分最貧困的農民的手中。

這個過渡時期的特點即在：一方面有最高限度的公開的可能，（俄國目前是全世界交戰國中最自由的國家），他方面，對於羣衆沒有武力的壓迫，最後，羣衆對於和平及社會主義的最壞敵人，尚持信任和不覺悟的態度。

這些特別情形，要求我們能在絕頂廣大的剛在覺醒起來走上政治生活的無產階級羣衆中，使黨的工作，適應於特別的環境。

三、對於臨時政府，不能給以絲毫的幫助，應指出他所允許的話，（特別是關於放棄併吞的話），全是謊語。要求這個資本家政府，不成爲帝國主義政府，祇是自欺，我們對於這個要求，不能用來自欺，而是要加以揭破。

四、承認這個事實，即全體處在資產階級影響下而又把這種影響傳於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份子（從人民社會主義派，社會革命黨，一直到且夷

之，采萊台里等的孟塞維克和司節克洛夫（Stehlov）組成了聯合。我們的黨，在大多數工人代表蘇維埃中，現在祇佔少數，並且還極是薄弱的少數。

解釋給羣衆聽，即工人代表蘇維埃，是革命政府的唯一可能形式，所以目前當這個政府（指蘇維埃——譯者）處在資產階級影響之下時，我們的任務，祇有忍耐地、有系統地、堅毅地，特別適合羣衆的實際需要，去解釋他們策略上的錯誤。

當目前我們處在少數地位時，我們應該進行批評和解釋的工作，同時宣傳政權轉給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必要，使羣衆從經驗中，改去自己的錯誤。

五、從工人代表蘇維埃回到國會制度的共和國，是往後退步，所以現在所要的，不是國會制度的共和國，而是普遍全國的工人、僱農、農民代表蘇維埃。

廢除警察，軍隊和官吏。（註：即以全體民衆的武裝，來代替常備軍）。

各種官職都經選舉，並且隨時可以把他們更換，他們薪俸不能超過高等工人的平均工資。

六、在土地綱領上，重心點應轉移到僱農代表蘇維埃上去。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

國內一切土地，都爲國有，歸各地的僱農農民代表蘇維埃支配。另組貧農代表蘇維埃。在每個大的地主采邑上（依照鄉土及其他條件，依照地方機關的決定，面積可從一百俄畝起至三百俄畝止——一俄畝約等中國十六畝許），建設模範的農莊，由僱民代表蘇維埃監督，並且爲公產。

七、立刻把國內全體銀行併成一個全國的銀行，並由工人代表蘇維埃監督。

八、我們直接的任務，並不是立刻「實行」社會主義，而是立刻要使工人代表蘇維埃監督社會的生產品的分配。

九、黨的任務：

(一) 迅速召集黨的代表大會；

(二) 改變黨的黨綱：主要的是：

(1) 關於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

(2) 關於國家的關係，和我們關於「公社式國家」（即類似「巴黎公社」的國家）的要求；

(3) 修改已經陳舊的最低度黨綱。

(三) 改變黨的名稱（全世界上社會民主黨的正式首領如「祖國保衛派」和動搖的考茨基派等，都叛賣了社會主義，而投奔資產階級。所以應該改名為共產黨，以代社會民主黨）。

十、重新建立國際。

發起建立革命的國際，建立反對社會狹隘愛國者反對「中庸派的國際」（中庸派指國際社會民主黨中搖擺於狹隘愛國主義者「等於「祖國保衛派」」和國際主義者中間的一種傾向，就是：德國考茨基之流，法國郎格之流，俄國且夷之輩，意大利都拉第輩，英國麥克唐納爾之流等等）。

要使讀者明瞭，我為什麼特別把好心反對者指出來，作為稀有例外，我可以舉出以下高爾登堡君的反對意見，來和這個提綱比較。他說：列甯「在革命民主派的

隊伍中間高舉國內戰爭的旗幟』（摘自普列漢諾夫的統一報第五號）

這究竟是否真話呢？

我寫着，讀着，細細咀嚼着：『因着革命祖國保衛派的羣衆代表的廣大階層，懷着善心好意……因他們是受資產階級之欺，所以應當懇切地，堅毅地忍耐地解釋他們的錯誤。』……

而資產階級方面，自稱社會民主黨，自稱不屬於祖國保衛派廣大階層，也不屬於祖國保衛派羣衆代表的先生們，却以清亮的口齒轉述我的意見，把他說得這樣：『在革命民主派的隊伍（！）中間，高舉（！）國內戰爭的旗幟（！）』（關於國內戰爭，在提綱中在報告上，一個字都沒有說過）。

這算什麼，這和鼓吹蹂躪的煽動，和俄羅斯自由報，有什麼區別呢？

我寫着，讀着，咀嚼着：『工人代表蘇維埃，是革命政府的唯一可能形式，所以目前當這個政府處在資產階級影響之下時，我們的任務，祇有忍耐地、有系統地、堅毅地、特別適合羣衆的實際需要，去解釋他們策略的錯誤。』

某種反對者，就把我的意見，轉述爲：號召在『革命民主派的隊伍中，進行戰爭！』

我所以攻擊臨時政府，因他祇說空話，而不能規定召集立憲會議的最近的日期，或將來的一定的日期。我證明沒有工兵代表蘇維埃，立憲會議是沒有擔保的，他的成功，是不會有的。

他們轉述我的意見，好像我是反對立憲會議迅速的召集！！

倘然十數年來政治的爭鬥，沒有教訓我，來把反對者的善心好意，看作稀有的例外，那麼我或許要把這些話，都稱爲「夢囈」了。

普列漢諾夫先生在他報上稱我的演說爲夢囈。很好，普列漢諾夫先生！但是請看，在你們自己的辯辭中，你們爲何這樣的笨拙，愚鈍和不敏。倘然我講了二點鐘夢囈，爲什麼數百聽者，來忍受這種夢囈？再者，爲什麼你們報紙以整個篇幅來論述「夢囈」？豈不是你們完全不能自圓其說。

呼號，辱罵，哭叫，自然比較敘述、解釋、回憶、要容易得多了。試回憶一下

馬克斯，恩格斯在一八七一，一八七二，一八七五時對於巴黎公社的經驗和無產階級需要何種國家的問題，是怎樣推論的呢？

以前的馬克斯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先生，大概已不願回憶馬克斯主義了吧。

我摘引過盧森堡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號稱德國社會民主黨爲「發臭的屍屍」的話。普列漢諾夫，高爾登堡這類先生，就「發氣」起來了……爲誰呢……爲稱作狹隘愛國主義者的德國愛國主義者呵！

可憐的俄國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已經昏頭昏腦了，在口頭上算是社會主義者。在事實上却是狹隘的愛國主義者。

（載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七日第二十六號真理報上）

論兩個政權

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總是國家政權問題。倘然沒有認清這個問題，那就講不到什麼自覺的參加革命，更說不上什麼領導革命了。

我們革命的奇特之點，大部分就在他造成了二個政權。這件事實首先就要認清，因不了解這問題即不能前進。例如，對於布爾塞維克主義的舊的『公式』，我們應該能加以補充和修改，因為這些公式，一般的看起來是對的，但他們的具體的實現，可就有些不同了。以前對於兩個政權，沒有一個人想過，並且也不能想到的。

兩個政權，在什麼地方呢？他在這一點上，就是除臨時政府（資產階級政府）之外，還成立了現在很柔弱的處在萌芽時期，但實際上已是無疑地存在着和發展着的別一個政府：——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

這另一個政府的階級成份怎樣呢？無產階級與農民（穿着軍服的農民）。這個

政府的政治性質怎樣呢？這是革命的專政，即直接依靠革命的奪取，不按集中的國家政權所頒布的法律，而由民衆直接從下創設起來的政權。這並不是一種存在於國會制度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國家裏而統治於歐美各先進國家的那種尋常形式的政權。人們時常忘記這件事實，時常不加以思索，但全事線索，却正在其中，這個政權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那種形式的政權。這種形式最主要的標誌：（一）政權的來源，——不是預先由國會討論和通過的法律，而是各地民衆直接從下而上的創設，用普通的話來說，就是直接的『奪取』；（二）以全民的直接武裝，來代替離開民衆和民衆對立的機體的警察和軍隊。在這種政權之下，武裝的工農，武裝的人民，自己來保衛國家的秩序；（三）官吏僚屬，或由人民自己的直接政權來代替，或是至少要受人民的特別監督，他們不僅要經過選舉，并且按照人民的初次要求可把他們即行撤換，他們應處於簡單的代表地位；他們從盤據高性的領取資產階級式巨數薪俸底特權階層，轉為利用『特種工具』的工人，他們薪俸，不得超過高等工人的尋常工資。

巴黎公社之所以爲特別的形式國家，其實質就祇在於此。普列漢諾夫輩（背叛馬克斯主義的直接的狹隘愛國主義者）考茨基輩（中央派，即搖擺於狹隘愛國主義和馬克斯主義之間的那些人）以及現在居統治地位的一切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等等；都把這種實質忘了。或是改頭換面了。

他們祇限於口頭上的空談，他們緘默着，束縛着，千百回地相互慶祝革命，但不願意想一想，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究竟是什麼東西。他們不願意看到明顯的真理，就是當這些蘇維埃存在之時，當他們代表政權之時，在俄國總存着如巴黎公社這樣形式的國家。

我特別着重「當」字。因爲這祇是剛處在萌芽時候的政權。他自己正因與臨時政府的直接妥協和許多事實上的讓步，已經並且正在把自己的地位，逐漸讓給資產階級。

爲什麼？是不是因爲且夷之，采萊台里，司節克洛夫輩做了「錯誤」？並不是。這樣想的，祇有俗人，而不是馬克斯主義者。真的原因，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

組織力和覺悟力不足。上述的領袖們的錯誤，即在他們站在小資產階級的地位，即在他們不去開導工人的自覺，而反加以蒙蔽，他們不去反對小資產階級的幻想，而反加以鼓吹。他們不去使羣衆脫離資產階級的影響，而反使這種影響更加鞏固。

從此，就已很明白，爲什麼甚至我們自己的同志，也做了這樣多的錯誤而『簡單』地提出這個問題：應否推翻臨時政府？

我的回答是：（一）這個政府，應該推翻，因為他是寡頭的資產階級的而不是民衆的政府；他不能給和平、麵包、和完全的自由；（二）這個政府，目前不能推翻，因為他與工人代表蘇維埃，首先，是和主要的彼得格勒蘇維埃作了直接的，間接的，形式上的，實際上的妥協；（三）這個政府，一般不能以尋常的方法去推翻，因為他依靠着第二政府（工人代表蘇維埃）對於資產階級的『幫助』，但是這個第二政府，却是直接表示大多數工農覺悟和意志的唯一可能的革命政府，比工人、僱農、農民、兵士代表蘇維埃更高更好的政府形式，人類還沒有創造出來，我們直到現在，也還不知道。

要獲得政權，覺悟的工人，一定要把大多數的民衆，爭取到自己方面來；現時在對於羣衆沒有應用暴力的時候，再沒有別的獲取政權的道路。我們並不是布朗基派，並不是主張少數人奪取政權的人。我們是馬克斯主義者，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階級爭鬥，以反對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反對祖國保衛派的狹隘愛國主義，反對空言及對於資產階級的依靠。

我們要建設無產階級的共產黨，我們已有了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忠實信徒，作為這黨的組織成份；我們要團結起來，作無產階級的階級工作，無產階級，最窮苦的農民，將更多的轉到我們這一方面來。因為實際生活，將每天揭破社會民主黨人如且夷之，采萊台里，司節克洛夫輩與其他社會革命黨以及更『純粹』的小資產階級份子等等的幻想。

資產階級要求資產階級的單一政權。

覺悟的工人，要求工人、僱農、農民、工人等代表蘇維埃的單一政權，——即無產階級表現他的覺悟力，脫去資產階級影響，以造成的政權，而不是得自冒險的

政權。

小資產階級——社會民主黨，社會革命黨等等——搖擺着，障礙這種覺悟和這種解放。

這就是決定我們任務的實際階級力量底相互關係。

(一九一七年四月九日真理報第二十八號)



論策略書

引言

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我在彼得堡先出席於布爾塞維克的會議，爲表題上所指出
的題目，作一個報告。因爲這都是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的代表，他們就要散歸
各處，所以絲毫不能給我以遲延的時間。會後主席齊諾維也夫同志代表全體會議，
向我提議，要求立刻把我的報告，複述於願意討論社會民主工黨合併問題的布爾塞
維克及孟塞維克代表們之聯席會議上。

要立刻複述我的報告，本來是很困難的，但是既然我的同道者和孟塞維克，都
起來要求，而他們又因歸程，確實不能給我以遷延的時間，所以我就無權可以拒絕
這種要求。

在報告時，我誦讀了一九一七年四月七號第二六號真理報上所發表的提綱。

我的報告和提綱都引起了布爾塞維克本身和真理報編輯部內部的分歧的意見。經過多次討論後，我們一致以爲最好就是公開的詳細討論這些不同的意見，這樣將使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號在彼得堡召集的我黨（由中央執行委員會統一起來）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俄臨時代表大會可有材料。

爲執行關於這個討論問題的決議案起見，我於是發表了下面的信，在這信內，我不想爲這問題，作各方面周到的研究，而祇是要指出在工人階級運動的實際任務上特別重要的幾個論據。

第一信 目前情勢的估計

馬克斯主義要求我們對於階級的相互關係和每個歷史時機的具體特點，有最正確的，並在客觀上證實了的估計。我們布爾塞維克總是盡力所及，以求忠於這個要求，從無論那種政策的科學根據上看來，這要求無疑地是必須遵守的。

『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領導』，馬克斯和恩格思對於背誦和簡單

地複述「公式」的人們，常加以這樣的譏笑；因此種公式，最多祇指出一般的任務，但歷史過程上，每個特別階段各有具體的經濟和政治底境遇，所以這些任務就要有形式的變更。

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為決定自己行動上的任務和形式起見，應該根據何種確實規定的和客觀的事實呢？

在我第一封遠方來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階段登載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二一，二二號第一四和一五號的真理報上）及提綱上，我決定俄國現時的特點，「為革命從第一階段轉到第二階段去的過渡時期」。所以這時期內基本的口號和切身的任務，我以為是：「工人們，你們在反對沙皇帝制的國內戰爭中，已經表示出無產階級的，民衆的，超羣拔類底英雄氣概，你們還應該表現出無產階級和全民衆的組織上的奇能，以預備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勝利。」（見第一封遠方來信）。

第一個階段是怎樣的呢？

就是國家政權，轉入資產階級手中。

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三月革命以前，俄國政權，是握在一個舊的階級的手裏，就是，握在尼古拉·羅曼諾夫爲首的『農奴主，貴族和地主』階級手裏。

自這次革命以後，政權轉到別個新階級，即資產階級手裏。

在革命的嚴格科學意義以及實際政治意義上講來，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轉到別個階級，是革命的第一個根本的主要的標誌。

因此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革命已經完結了。

在這裏，我們就聽到那些自命爲『老布爾塞維克』的反駁者的喧嘩聲，他們說：難道我們不是常常說，祇有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方能完成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嗎？難道土地革命（也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結了嗎？其實這個革命還沒有開始，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我回答道：布爾塞維克的口號和思想，一般的講，已經爲歷史所證實，但具體的事實，却和任何人所期望的不同，他要奇異些特殊些，和複雜些。

誰要是忽略和忘記這個事實，那末，就等於那些『老布爾塞維克』，他們在我

們黨的歷史上，盡過可憐的作用，已不止一次，他們無意義地背誦爛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鮮的靈動的實際情形上底特點。

在俄國革命中，「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已經實現了（在某種形式下，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公式所能預見的，祇是階級的相互關係，而不是實現這種相互關係和相互合作的具體的政治機關。「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這就是已在生活中實現了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這個公式，已經陳腐了。生活已把他從公式變成實際，充以血肉，使他具體化，這樣，使他形態也因而改變。

現在日程上，已有別的新任務：即是使這個專政內部，無產階級成份（反對保護祖國的，國際主義的，「共產主義」的，主張轉變到公社去的等等之成份）和小財主或小資產階級成份（且夷之 Tscheidie，采萊台里 Tseretelli，司節克洛夫 Steklov 社會革命黨，以及其他革命祖國保衛派，反對轉向公社去的運動和贊成「幫助」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政府的那些人）發生破裂。

現在要是誰祇講『工農民主專政』誰就落伍在生活之後，他因此實際上就投奔小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因之就應把他送到布爾塞維克的革命以前的古物陳列所去（或可以名之爲：『老布爾塞維克陳列所』）。

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已經實現了，但是實現得非常奇特，並且帶着極重要的形式上的變更。關於這些，我將在以後的信上特別細說。現在且應該記着這種無疑的真理，即馬克斯主義者應顧及靈動的生活，確切的事實，而不應繼續爲昨日的理論所牽制，這種理論與任何理論一樣，最多祇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要點，最多祇能接近複雜的實際生活。

『好朋友，理論是灰色的，（意指呆板的——譯者）而生活却是常青的（意指往前發展的活動的）。』

誰要是照舊提出資產階級革命『完全』的問題，誰就要使活的馬克斯主義，爲死的字句的犧牲品。

依照從前應是這樣：隨着資產階級統治之後，可以有並且應該有無產階級和農

民的統治，他們的專政。

但在靈動的生活上，却已經產生不同的情形：現在却有非常奇特，新鮮，從所未有的二方面的錯綜，資產階級的統治（乃爾伏夫 Лвов 和古契柯夫 Гучков 的政府）與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同時並存，這個民主專政自願地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自願地轉為他的附屬品。

但決不要忘記，在彼得堡，政權實際上在工人和兵士的手裏，新的政府決沒有並且也不能以武力壓迫他們，因為警察，脫離民衆的軍隊，顯赫威臨民衆的官僚，一概都沒有了，這是事實。這些事實正表現出巴黎公社式國家之特質。這些事實，沒有規定在舊的綱領上。我們要能使綱領適合事實，而不要一般的背誦已失意義的『工農專政』的辭句。

再從另一方面來討論這個問題，使之更可明瞭。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脫離正確的階級關係的分析。資產階級握着政權。農民羣衆難道不是另一部分，另一階層，另一種性質的資產階級嗎？從何知道，這一部分人不能獲取政權。而『完成』資產

階級民主革命？爲什麼這點不可能？

老布爾塞維克，常時這樣辯護着。

我回答道：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馬克斯主義者在估計時機時，不應該從可能方面出發，而應該從實際方面出發。

實際狀況指示給我們以這件事實，就是自由選舉出來的工農的代表，自由加入第二個附屬政府，自由補充、發展和完成這個政府。但是他們以同樣的自由，把政權給資產階級——這種現象毫不「違背」馬克斯主義的理論，因爲我們久已知道，並且屢次指出，資產階級不但擁有武力並且還利用羣衆的不覺悟、冥頑、魯鈍，和組織上的種種缺點，以維持自己的權力。

在目前這樣的實際情形下，誰要是不顧事實而講「可能」的將來，簡直荒謬之至。

可能的，農民會奪取一切土地和全部政權，我不但沒有忘記這個可能，不但沒有把我的眼界，祇限於今天一天，而且我還直接地確切地顧到新的現象，即僱農貧

農，與富農的分裂愈趨劇烈，而規定了土地政綱。

但是還有別一種可能：或許多農民聽從小資產階級政黨社會革命黨勸告，此種小資產階級政黨，處在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轉投入「祖國保衛派」，並且勸告農民等候立憲會議，雖然直到如今，這會議的召集期還沒有規定。（爲免除別人對於我的話底誤會起見，我預先說明：我無條件地贊成，僱農和農民的蘇維埃，立刻奪取全部的土地，但要自己嚴守秩序和紀律，不使機器，建築物，牲畜，受絲毫損壞，絕對不要破壞農事和穀類的生產，而要增加生產，因爲兵士需要加倍多的麵包，而人民不應受餓）。

可能的，農民保持並且繼續和資產階級作交易，目前他們經過工兵代表蘇維埃，非但在形式上，且在實際上，和資產階級幹這個交易。

有各種不同的可能。倘然忘記了農民運動和土地政綱，那是極大的錯誤。但另一方面，假使忘記實際狀況，那更是莫大的錯誤。實際狀況告訴我們妥協的事實，——倘用更正確，少帶法律性，而多具經濟階級性的術語來說，——便是資產階級

和農民階級合作的事實。

當這個事實不復成爲事實，「當農民脫離資產階級，奪取土地以反對資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反對資產階級的時候，——那麼這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將進到新的階段。一關於這點，以後特別的講。

倘然一個馬克斯主義者，看着將來這個階段的可能，而忘却他目前在農民和資產階級妥協時的任務，那他就變爲小資產階級份子了。因爲實際上，他就在宣傳無產階級，去信任小資產階級（這些小資產階級，這些農民，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中，已應該和資產階級分裂）。他想到快樂甜蜜的將來之「可能」，（那時農民不再爲資產階級的尾巴，社會革命黨不再爲資產階級政府的附屬品），而忘却不快樂的現在（當農民還是資產階級的尾巴，當社會革命黨人社會民主黨人還仍舊是資產階級政府的附屬品和爾伏夫「陛下反對派」）。

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這種人，好像甜蜜的魯意白郎，好像甘味的考茨基派，但決不會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

但是，我們會不會有陷入主觀主義的危險，會不會有『跳越』尚未完成的（農民運動，尚未過去）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而即轉入社會主義革命的那種危險呢？

倘然我這樣說：『推翻沙皇，成立工人政府』，那麼就有上述的危險。我所說的，不是這樣，而是別個樣子。我說，在俄國，除工人，僱農，兵士及農民代表蘇維埃外（資產階級政府不計），再不能有別政府。我說過，在俄國現時政權從古契柯夫，爾伏夫等的手裏，祇能夠轉給這些蘇維埃，但是在這些蘇維埃中，佔多數的恰是農民、兵士；倘不按生活上，居住上，職業上的特質，而按階級的特質，用科學的馬克斯的名詞來說，那麼其中佔大多數的却是小資產階級。

我在自己的提綱中，絕對避免各種對於還未經過的農民運動或一般小資產階級運動的『跳越』，避免以工人政府『奪取政權』為兒戲的舉動，避免任何布郎基式的冒險；我已直接指示出巴黎公社的經驗。這個經驗，馬克斯在一八七一年，恩格思在一八九一年已明顯地詳細地指示出來了，這個經驗，完全屏棄了布郎基主義，

並且說明祇在大多數羣衆，本身自覺地行動起來時，方能保證他們的積極性。

我在提綱中，非常確定地說明要在工人、僱農、農民、及兵士代表蘇維埃中間，增加我們的影響。爲使不至發生絲毫的疑慮起見，我在提綱中曾一再提出應該作忍耐的堅毅的適合羣衆實際需要的「解釋」工作。

祇有那冥頑不靈的人，或馬克思主義的叛徒，如普列漢諾夫之流，方能高喊無政府主義，布郎基主義等等。誰要是願意思索和學習一下，那麼就不能不知道，布郎基主義是主張由少數人奪取政權，而工人等等代表蘇維埃，大家都知道是大多數人民的直接組織。在蘇維埃裏面爲增加我們影響而爭鬥的工作，絕不能和布郎基主義併爲一談。這種工作，也不能和無政府主義相混，因爲無政府主義者，否認在資產階級的統治轉入無產階級統治的過渡時期中，有國家與國家政權的必要，我以絲毫不至引起誤會的明確態度，堅持在這個時期中要有國家，但是根據馬克斯和巴黎公社的經驗，我們不需要尋常國會制度的資產階級的國家，而是需要那種沒有常備軍和沒有反對人民的警察，沒有壓迫人民的官僚等的國家。

倘然普列漢諾夫力竭聲嘶地在他的統一報上，高呼無政府主義，那末，這不過更多一次地證明他脫離馬克斯主義罷了。在第二十六號真理報上曾登過我的一篇文章，敘述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七一，一八七二，一八七五等年，關於國家的學說，普列漢諾夫先生在回答時，對於這個問題本身，一語不發，而僅以怒忿的資產階級口氣，大作咆哮之鳴。

以前的馬克斯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完全沒有懂得馬克斯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可說，這種不懂的萌芽，在他德文的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上（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已經表現出來了。

現在來看，加米尼夫同志在第二七號真理報的一篇文章上怎樣規定他對於的我提綱及上述意見的『異議』。這能使我們更正確地了解這個問題。

加米尼夫同志這樣說過：『至於列甯同志的總綱領，那我們是不能採納的，因為這個綱領的出發點，是承認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已經完成了，並且打算馬上把這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這裏，有二個極大的錯誤：

第一，資產階級性民權革命『完成』與否的問題，提得不對。這樣就使這個問題，帶着抽象的，簡單的，單色的（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立場，這種立場不適合客觀的實際情形。誰要是這樣提出問題，誰要是現在簡單的祇這樣的問：『資產階級性民權革命有否完成』，那麼他就不能懂得非常複雜的至少是『二色』的實際情形，在理論上如此。在實際上，他就茫然無主地投入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觀點中去了。

事實怎樣？實際情形指示我們，一方面政權轉給資產階級（普通形式的資產階級性民權革命的完成），他方面和當權的政府一起存在的，還有一個代表『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附屬政府。這後一個『另外政府』自己把政權讓給資產階級，而受資產階級政權束縛。

加米尼夫同志的老布爾塞維克的公式：『資產階級性民權革命，還沒有完成』，有沒有蓋括這種實際情形呢？

沒有。這個公式，已經陳腐了。他已完全無用了。他已死了，要使他復活起來，祇是徒勞無功。

第二，實際的問題，在俄國還能否有特別的與資產階級政府相脫離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這點現在還不知道。但馬克斯主義的策略，是絕對不能根據於渺茫不可知的事情的。

即使說這樣的專政，還可以實現的話，那麼到這上面去的路，祇有一條：馬上堅決地，一往不回地，使革命運動中的無產階級及共產主義成份，和小資產階級成份分裂起來。

爲什麼？

因爲全體小資產階級不是偶然地而是不可避免地要轉向狹隘愛國主義（祖國保衛派），轉到「幫助」資產階級，依靠資產階級，而懼怕和資產階級脫離。

倘然這個小資產階級已經能夠而却不願意獲取政權，那麼怎樣能夠「推動」他們去獲取政權呢？

祇有使無產階級共產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自由獨立地和這些小資產階級的卑怯氣象分立開來。無產階級不是在口頭上而是要在事實上脫去小資產階級的影響，祇有這樣的無產階級的緊密聯合，方能使小資產階級腳下，有這樣「熱」的土地，使他在某種條件之下，不能不奪取政權；可能的，或許古契柯夫，密留柯夫等（又在某種情形之下），會贊成且夷之，采萊台里，社會革命黨及司節克洛夫輩的全部政權或統一政權；因為這些人無論如何，總是「祖國保衛派」。

誰要是馬上迅速地，一往不回地使蘇維埃中的無產階級成份（即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政黨），和小資產階級分裂開來，那麼，他在二種可能的情勢下，都能正確地代表革命運動的利益：第一種情勢，即在俄國，或許還會經過特別的獨立的不服從資產階級的「工農專政」，第二種情勢，即小資產階級不能和資產階級脫離，而將永遠（在社會主義前）動搖於我們和資產階級之中。

誰要是在行動上，祇根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未完成」的公式，那麼，他就差不多擔保小資產階級一定能夠脫離資產階級而獨立。這樣，在現時就要徬徨無策

地乞憐於小資產階級。

關於工農專政的「公式」，儘可以回憶我在兩個策略（一九〇五年七月）一書上特別注重地所說的話：

「工農民主專政和天下其他事物一樣，有他的過去和將來。他的過去，——是專制政權，農奴制帝國，特權等。……他的將來，——是反對私有財產制的爭鬥，僱用工人對於主人的爭鬥，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爭鬥。……」

加米尼夫同志的錯誤，就在他至一九一七年，還祇看着革命民主專政的過去。實際上，這專政的將來，已經開始，因為實際上，僱傭工人和主人的利益及政策，已經背道而馳了，例如對於這樣重要的問題，如「保護祖國」問題及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等等問題。

現在我要說到上述的加米尼夫的論據的第二個錯誤。他反對我，說我的綱領，是在估量把「這個（資產階級性民權的）革命，馬上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

這是不對的。我非但不「估量」把我們革命「馬上」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而

簡直深自驚惕，反對這種主張，在四月提綱第八條上，並且聲明：『我們直接的任務並不是立刻實行社會主義』。

倘然誰估量把我們的革命，馬上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那麼他就不能起來反對直接實行社會主義的任務，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還不止此。即在俄國建立『公社式的國家』（即遵照巴黎公社形式而建設的國家），也不能『馬上』就實行，因為這上面需要全體（或大多數）蘇維埃中的大多數的代表，明白地覺悟社會革命黨，且夷之，采萊台里，司節克洛夫等等的政策和策略底全部錯誤及害處。我已很正確地聲明，我在這方面，祇估量作『忍耐的』解釋！（倘然所希望的變更，『馬上』可以得到，那麼還用得着忍耐嗎？）

加米尼夫同志稍許有些『不能忍耐』的顫動，他對巴黎公社，重複資產階級的習語，好似巴黎公社『馬上』就要實行社會主義似的，實際上並不如此，巴黎公社之實行社會主義可惜太遲了。公社的實質，並不是資產階級分子所說的那樣，而是在創立了特殊的國家形式。這種國家，在俄國已經產生了，這就是工兵代表蘇維

埃。

加米尼夫同志，並不詳細考慮事實，考慮已經存在的蘇維埃的意義，及蘇維埃在形式上、社會政治等性質上與公社式國家的相同之點。他不去考究事實，而却空口呼喊說我似乎估量着『馬上』實行社會主義。結果可惜祇是重複許多資產階級分子所慣用的手段：他對於這些切身的實際的，生活上最緊急的問題，如工兵代表蘇維埃是什麼？在形式上講，他是否高於國會制的共和國，他對於民衆是否有益，他是否要德謨克拉西些，他是否更便於鬥爭（如補救麵包缺乏的鬥爭）等等，置之不顧，而却把注意力，轉到空的好似科學的，但實是毫無內容的大學教授式的死問題，即『估量於立刻轉變』的問題，——空的，騙人的問題。

我唯一的僅僅估量着，工人兵士農民在應付實際的困難問題上，如增加麵包生產，改良的分配，改善兵士供給等等上面，比較官僚和警察為好。

我深信工兵代表蘇維埃能夠比國會制的國家，更快地，更好地實現民衆的自動力（關於兩種國家形式的比較，在他信中再行詳述），他們（蘇維埃）能夠更好地

更實際地更忠實地決定，怎樣做，做什麼，以便逐步向社會主義前進。管理銀行，把全部銀行，合併爲一，這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進向社會主義去的一種步驟，德國的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也採取這一種步驟來反對人民。倘然明天蘇維埃獲得了全部政權，那麼，他更能夠採取這種步驟，去爲人民謀利益。

爲什麼一定要採取這種步驟呢？

飢荒，經濟的破壞，可怕的危機，戰爭的慘苦，及戰爭與人類的創傷。

加米尼夫同志文章之末，有下列的聲明：「在廣大的辯論中，他希望堅持自己的主張，以爲這是革命社會民主黨內唯一可能的主張，因社會民主工黨始終要成爲革命無產階級羣衆的政黨（並且這是應該的），而不應轉爲宣傳員——共產主義家的小團體。

我以爲在這些話裏，可以明顯地看到他對於目前情勢估計的錯誤。加米尼夫同志把「羣衆的黨」和宣傳員的小團體對立起來。但不知道「羣衆」現在正在陷在「革命的」祖國保衛派的穢氣中。國際主義者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能抗拒「羣衆

的穢氣」，不是比較「和羣衆留在一起」，即比較共同陷在瘴氣中，要好些嗎？歐洲的交戰國裏，狹隘愛國主義者，怎樣爲自己辯護，讓他們要「和羣衆留在一起」，這點我們難道沒有看到嗎？應否在某個時候，站在少數地位，以反對「羣衆的」穢氣？在現在這種時候，我們正要把無產階級的路線，從「羣衆的」祖國保衛派及小資產階級的穢氣中，解放出來，這時宣傳員的工作，難道不是中心點嗎？

無產階級以及非無產階級羣衆的混雜，羣衆內部階級區別的混淆，正是造成祖國保衛派瘴氣的條件之一。輕蔑地說什麼無產階級路線的「宣傳員小團體」，恐不很合式的罷。

（作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中，最初在一九一七年由浪花書局印成單行本）

我們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

——無產階級政黨的綱領之草案——

現時俄國所處的歷史時期，含有下列主要的特徵。

過去革命（即二月革命）之階級性

（一）祇代表一小羣農奴主的地主而指揮全部政府機關（軍隊，警察，官吏）的舊的沙皇政權，已被毀壞和掃除了，但還沒有清除到底。專制政體，還沒有正式廢除。羅曼諾夫（沙皇）的狗黨，還在繼續作帝制的陰謀。農奴主的地主的大地產，還沒有消滅。

（二）俄國的政權，已轉入新的階級底手裏，即轉入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地主們的手裏。因此，俄國的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了。

掌握政權的資產階級，和顯明的復辟份子訂了同盟，這些份子在一九〇六年至

一九一四年之間鞠躬盡瘁地擁護血手尼古拉和絞手史託里賓（如古契柯夫之流及當政的右派立憲民主黨人）。爾伏夫輩的新政府，已企圖，而且已開始和羅曼諾夫談判俄皇復辟的問題了。這個政府，在大嚷革命辭句的喧嘩聲中，暗中委託舊制度的擁護者為重要官吏。這個政府，把國家的各種機關（軍隊，警察，官吏），轉給資產階級，但總想把他改造得越少越好。革命羣衆運動的發展和民衆從下而上的奪取政權，是革命真正勝利的唯一保障，但新政府對之，已竭力加以阻礙了。

直到現在，這個政府還沒有規定召集立憲會議的日期。大地主地產，為農奴主沙皇的物質基礎，新政府對之，絕不動手。這個政府，自然更從來沒有想到怎樣把壟斷的財政機關，大銀行，資本家的新迪加和卡台爾等等底行動，查察和公佈，從來沒有想到加以管理。

新政府中最主要的總長位子（內務總長，陸軍總長，即指揮軍隊，警察，官吏，以及全體壓迫羣衆的機關）屬於顯明的復辟黨和大地主產業的保護者。立憲民主黨，過去的共和派，以及共和派等等，免強地祇佔據了對於指揮人民，對於政權

機關沒有直接關係的次要位子。勞動派的代表和「假社會主義者」克倫斯基，除以響亮的辭句，蒙蔽民衆的警覺心和注意力外，差不多絲毫不起什麼作用。

因上述原因，所以就在內政上，無產階級對於新的資產階級政府，不應給以絲毫的信任，也不許給他以絲毫的幫助。

新政府的對外政策

(三)因客觀的條件，現在對於政策，佔首要的地位，新政府在對外政策上，是和英法等帝國主義列強聯合，繼續帝國主義戰爭，以分潤資本主義的贓物，以蹂躪弱小的民族。

新政府爲了俄國資本主義及其有力的羽翼者和主人，全世界最富有的資本帝國主義，英、法等的利益，就不顧俄國真正大多數的人民經過工兵代表蘇維埃堅決地表示出來的願望，而總是絲毫不採取實際的辦法，去停止爲資本家的利益而起的戰爭。就是顯然的包含掠奪別國的內容（瓜分波斯，掠奪中國，土耳其，瓜分奧大利

奪取東普魯士，德國的殖民地）而使俄國和英法帝國主義強盜資本聯結起來的秘密條約，新政府也不加以公佈。數百年來，沙皇之掠奪和壓迫其他民族甚於別的霸王和暴君，他非但壓迫，並且羞辱和蠱惑大俄民族，使他變為其他民族的劊子手；這樣的沙皇政權所訂的條約，新政府却加以批准了。

新政府批准這種和強盜締訂的可恥條約以後，不顧俄國大多數民衆怎樣經過工兵蘇維埃明白提出立刻停戰的要求，而總是不把這個要求建議於全體交戰的民族之前，他作了許多莊嚴響亮，威風凜凜而毫無內容的宣言和辭句；在資產階級的外交家中，這樣的宣言和辭句，都是用來欺騙被壓迫民族中的誠實和幼稚的羣衆的。

（四）所以對於新政府，在對外政策上，非但不能給以絲毫的信仰，而且就是向他提出要求，叫他滿足人民的和平渴望，叫他放棄併吞政策等等，也祇是在實際上欺騙民衆，鼓吹不能實現的要求，延滯民衆覺悟心的啓發，間接地令民衆允許繼續戰爭；因為這種戰爭的真正的社會性，不是靠好心的希望來決定，而是要看進行戰爭的政治底階級性，目前政府所代表的階級對於俄，英，法等國財政資本帝國主義

的關係，這個階級所採取的實際政策等來決定的。

特殊的兩個政權及其階級意義

(五)我們革命中最主要的特徵，最足令人深思熟慮的特徵，即是在革命勝利後最初幾天內所形成的兩個政權。

兩個政權，表現於存在兩個政府的事實上：主要的真正的實際的資產階級政府，即爾伏夫輩的臨時政府，在他掌握中，有全部的政權機關。此外還有補充的，附屬的，監督的政府，即彼得格勒的工兵代表蘇維埃，在他手中，沒有國家政權的機關，可是直接依靠於顯然的大多數人民，依靠於武裝的工人和兵士。

兩個政權的階級來源及其意義，就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不但廢除了全部沙皇的帝制，不但把全部的政權轉給資產階級，並且還往前達到了工農民主專政。彼得格勒蘇維埃和其他地方的工兵代表蘇維埃，就是那種上述階級的專政（就是說不依靠於法律而依靠於武裝民衆的直接力量底政權）。

(六)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從各方面看來，獲得大多數地方蘇維埃的信仰，但他自願把國家政權轉給資產階級和其臨時政府，自願把首位讓給臨時政府，與之訂立扶助的協定，他祇以觀望和監督立憲會議的召集爲己任（立憲會議的召集期，臨時政府至今還沒有發表），上述情形也是俄國革命中非常重要的特徵。

這種非常奇特的在歷史上從未遇到過的情況，使兩個專政相互地合而爲一地錯綜起來，這兩個專政，即是資產階級專政（因爾伏夫輩的政府，是一種專政；就是說不依據於法律，不依據民意的預先表現，而是依據於強有力的奪取底政權，實現這種奪取的，是一定的階級，即資產階級）和工農民主專政（工兵代表蘇維埃）。毫無疑義的，這種「錯綜」，是不能久長維持下去的。國內不能有兩個政權。其中有一個，一定要消滅；俄國的資產階級正在用其全力，用各種方法，以求排除，削弱，和消滅工兵代表蘇維埃，以求建設資產階級的統一政權。

當革命超出了普通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範圍但還沒有達到「純粹」工農專政的時候，兩個政權是革命發展中的過渡階段。

這個過渡的及不穩定的情勢之階級意義（和階級的解釋）如下：我們革命和其他革命一樣，在與專制政體爭鬥表顯了羣衆莫大的英勇和自己犧牲的豪氣，他並且立刻能把空前未聞的極大多數量的常人，拉進運動中來。

在『常人』中，開始積極地自動地活躍地參加政治生活，參加國家建設的人數，非常迅速地，急驟地，利害地增加起來，這種情形，是一切真正革命的主要的科學的以及有實際政治意義的表誌之一。

俄國也是如此。俄國現在正在沸騰起來。十數年來在政治上昏睡着的，在政治上爲沙皇的殘酷壓迫，爲地主和廠主盡力所摧殘的千百萬羣衆，覺醒起來而參加政治生活了。這千百萬人，是誰呢？大部分是小生產者，小資產階級，即站在資本家和僱用工人中間的那些人。在全體歐洲的國家中，俄國是最富於小資產階級性的國家。

洶湧的小資產階級的波浪，掃蕩一切，他非但在數量上並且在思想上壓倒了覺悟的無產階級，就是說，極大部分的工人被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觀點，浸潤着和籠罩

着。

小資產階級本身的生活，是主人式的，不是無產階級的（指他在社會生產中所佔地位），他在生活上，要依靠資產階級，在思想上，他也是跟着資產階級走的。

對於資本家，即對於和平和社會主義的凶惡的敵人，採取信任和不自覺的態度——這就是俄國羣衆現時政策的特點，這就是歐洲各國中最小資產階級性的國家的社會經濟基礎上所急轉直下地產生出來的結果。這就是臨時政府和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堅妥協的階級基礎（注意，我所講的不但指形式上的妥協，而且還指實際上的幫助，默認的妥協，信任的不自覺的退讓政權），這種妥協，給古契柯夫輩以肥肉，以真正的政權，而蘇維埃祇得克倫斯基輩的空口允許，稱讚（到一定的時候）阿諛好話，保證，和禮儀。

面。
俄國無產階級人數的不足，其覺悟性和組織力的不足，——就是這塊徽章的反

全部民粹派的政黨，直至社會革命黨，都是小資產階級性的，孟塞維克（且夷

之，采萊台里等）也是一樣，非黨的革命者（史節克洛夫等）也同樣的，被捲於浪濤中，而不能並且也不及加以克服。

從上述情形中產生出來的策略上之特點

（七）在應該顧到客觀事實，顧到羣衆和階級，而不是顧到個人的馬克斯主義者看來，從上述實在情形的特點中，就應產生出這個時期的策略上的特點。

這種特點；即在我們第一要把酸醋和膽汁，灌入革命民主派辭句的甜水中（像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一位同志切奧道洛維赤在昨天彼得格勒鐵路職工人代表大會上所講的，這話非常的中肯）。我們應行批評的工作，解釋小資產階級政黨，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等的錯誤，準備和集合自覺的無產階級共產黨之成份，把無產階級從小資產階級的瘴氣中，解放出來。

看來似乎『祇』是宣傳的工作。但事實上，這是最實際的革命工作，因為我們已經再不能往前推進革命，革命已經停頓，已爲空言虛言所阻，已經『蹣跚於原

處』，其原因，並不是外方的阻礙，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武裝壓迫（古契柯夫現在祇恐嚇要用武裝對付兵士羣衆）而是羣衆的盲目的信仰。

祇有和羣衆的盲目的信仰，進行爭鬥（與他鬥爭祇能並且應該在思想上，用同志的勸告，指出實際生活上的經驗），我們方能從流行的革命辭句中解放出來，而真正推進無產階級的覺悟力，以及各地羣衆奮勇和堅決的自動力，自動的把自由，民權及土地民有的原則實現，發展和鞏固。

（八）全世界上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政府的經驗，產生了二種束縛人民於壓迫中的方法。第一種，武力。尼古拉第一（毒手的尼古拉）尼古拉第二（血手的尼古拉），把這種殺人方法中可能和不可能的最高限度，都表現給俄國的民衆看了。但此外還有別種方法，英法的資產階級在經過多次偉大革命和革命運動的教訓後，把這種方法用得最好。這種方法即是，欺騙，阿諛，發表空辭，給無量數的允許，賞賜微小的獎賞，作不重要的讓步而保守重要的地位。

現時俄國所處時期的特點——，即在於第一種方法，非常迅速地轉到第二種方

法，由武力凌辱民衆轉到阿諛民衆，以空洞的允許來欺騙民衆。貓聽着傻廚子儘發高論，而大啖其肉（俄國有一故事，說一個廚子，見着貓兒來吃肉，於是對貓，作洋洋不斷的演講，貓聽他儘講而大啖其肉）。密留柯夫，古契柯夫掌握政權，保護資本家的利潤，爲着俄國和英法資本的利益，進行帝國主義的戰爭，而以空口允許，宣言，聲明，答覆且夷之，采萊台里，史節克洛夫這般廚子的演說，這些廚子，對於這隻貓作種種威脅，訓戒，咒咀，請求，頌揚，但貓聽着他們講，而閒逸地大啖其肉。

實際生活（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教訓他們，不要相信資本家，所以在無產階級和貧農方面，這種深信資本家的不覺悟心，和盲目的信仰，將逐日消滅下去。

小資產階級的領袖，『應該』教民衆信仰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應該教他不要相信。

革命的『祖國保衛派』及其階級意義

(九)小資產階級浪濤最洪大的最明顯的而且差不多籠罩了「一切」的表現，應該承認是革命的「保護祖國派」。他就是俄國革命往前發展和勝利的最兇惡的敵人。

誰要是陷入這個觀點中而不能解脫，那麼他對於革命是已經死亡的了。但是羣衆之進入陷穽與領袖不同，他們的解脫，也不相同，也要經過不同的發展過程，採取不同的方法。

革命的「祖國保衛派」，一方面是資產階級欺騙羣衆的結果，是農民和一部分工人信仰資本家的不覺悟的結果，他方面是小生產者的利益和觀念的表現，因小生產者，相當的系念於併吞和銀行的利潤，他「神聖地」保守着沙皇（他把大俄羅斯民族變爲其他民族的劊子手）之遺規。

資產階級玩弄革命的榮耀，把事情鋪張得這樣，好似因爲發生了二月革命，因爲古契柯夫——密留柯夫的差不多相像的共和國，代替了沙皇的帝制，於是大戰的社會政治性質，在俄國方面看來，就變更了。民衆方面，也就相信了他（暫時的），

這大部分是因爲舊的習慣，迫得他們除大俄羅斯民族以外，俄國其他民族，看作大俄羅斯人的財產和地盤。沙皇對於民衆的下流蠱惑，使大俄羅斯人把其餘民族，看作下等的『天生』應屬於大俄羅斯人的民族；這種蠱惑，不能立刻消滅。

我們應當有能幹，去對羣衆解釋，說戰爭的社會政治性質，不是由個人，團體或甚至民衆的『好意』來決定的，而是由進行戰爭的階級的情形，這個階級的政（戰爭祇是這種政策的繼續），資本主義的連繫（這是統治於現代社會的經濟力量）。國際資本的帝國主義性質，俄國在財政上，銀行事業上，外交上，對於英法等國的依賴等等來決定的。要使羣衆能夠明白了解，不是容易的事，我們中間沒有一個能夠避免錯誤而立刻做到這點。

但是我們宣傳的方向，或是正確點說，我們宣傳的內容，應該如此，並且僅能如此。如果對於革命祖國保衛派，作了絲毫的讓步，那麼不管他說得怎樣動聽，不管他作些怎樣實際的辯護辭，總是叛賣社會主義，完全放棄國際主義。

『打倒戰爭』的口號，自然是對的，但他沒有顧到目前任務的特點，沒有顧到

目前必須用別種方法去接近羣衆。這個口號，據我意見，好似『打倒』沙皇的口號一樣，舊時不善運用的煽動家，帶了打倒沙皇的口號，簡單地骨直地走到鄉村裏去，於是受了大的打擊。革命的祖國保衛派的羣衆代表，是蓄意良善——，並不是講個人，而是講階級，就是說他是屬於工人和貧農，這些階級，從併吞和蹂躪其他民族上面，實在是得不到什麼的。他們不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先生們那樣的明知不放棄資本主義的統治，決不能放棄併吞政策，而仍舊用漂亮的辭句，空口，允許，無底的空話來無恥地欺騙羣衆。

祖國保衛派的羣衆代表，把事情看得極其單純和尋常：『我不要併吞別人，但德國人要「斬」我，因之我所保護的是本身權利而不是甚麼帝國主義的利益』。對於這種人，我們應該向之懇切地解釋，說事情並不是在他的個人希望，而是在羣衆階級和政治關係及狀況，在戰爭對於資本主義及國際銀行集團的關係。祇有用這種方法，反對祖國保衛派，方是認真的，方可預期勝利的，這種勝利，或許不是很快，但總是正確和穩當的。

怎樣方能停止戰爭

(十) 戰爭不能『因希望』而停止。一方面的決議，也不能停止戰爭。『槍頭的刺刀倒插土中』(借用一個保護派兵士的話)，也決不能停止戰爭。

祖國保衛派，半保衛派，半國際主義派報紙上的文章，和工兵代表蘇維埃的無數決議案和宣言，滿幅包含那種辭句，如各國社會主義者的『聯合』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發動』，民衆的『公意』等等，這些辭句決不能停止戰爭，因為他僅僅是小資產者空洞的，天真爛漫的好意的希望。比這些辭句，如『人民表示渴望和平』無產階級按照次序發動，『俄國以後，應跟着德國』等等更有害的東西，再也沒有的了。這是魯意白郎主義，這是黃梁大夢，以『政治運動』爲兒戲，實際上祇是重演貓吃肉的故事。

戰爭雖然無疑地祇爲着資本家強盜的利益而起，雖然祇使他們發財，但他並不是因爲他們的惡意而產生的。戰爭的發生，由於半世紀來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及

其千百萬條複雜的錯綜和連繫。不推翻資本主義的政權，不使政權轉入別個階級（無產階級）手中，決不能脫出帝國主義戰爭，決不能得到民主的，非武力的和平。

俄國的二月——三月革命，是把帝國主義戰爭轉成國內戰爭的開始。這個革命在轉變戰爭上，做了第一步。但祇有往前再走第二步，方能擔保戰爭的停止，這第二步就是：政權轉入無產階級手中。這將是普遍地「衝破戰線」，衝破帝國主義利益的戰線底開始，祇有衝破這條戰線，無產階級方能使人類脫離戰爭的痛苦，方能給人類以穩定的和平底幸福。

俄國的革命，創立了工人代表蘇維埃，他已經推進無產階級到「衝破帝國主義戰線」的地步上了。

在我們革命中興發起來的新的國家形式

（十一）大多數人民，非但不明瞭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階級意義及其在俄國革命

中的作用，並且還不了解他們是代表新的一種國家形式。

資產階級國家中最稱完美和先進的形式，要算國會制度的民主共和國：政權屬於國會；政府的機體和管理機關，和尋常一樣：有常備軍，警察，官吏等，官吏實際上不行更換，他們居特別地位，處在人民之上。

但是從十九世紀末期開始的革命時代，提出一種最高的民主國家的形式。據恩格斯意見，這種國家，在好多方面已不經是國家，他『已不是按照字面本意的那種國家』。這就是巴黎公社式的國家，他以人民自身的直接武裝，代替凌駕於人民之上的軍隊和警察。資產階段的作者謾罵毀謗巴黎公社，他要立刻『施行』社會主義（其實是說錯的），其實巴黎公社之實質，就是在此。

一九〇五年與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正是開始建設這種形式的國家。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這些蘇維埃，由全俄人民代表立憲會議或蘇維埃的總委員會聯合起來）——這就是現在已經實現於我們國內的形式；他的實現，是由於數千百萬民衆的自動，他們按照自己路線，創立民權，不等到大學教授和立憲民主黨的先生

們寫成國會制度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法律草案，也不等待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民主黨的師傅和老學究們的如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之流，放棄他們對於馬克斯主義國家學說的錯誤見解。

馬克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區別，即在馬克斯主義承認，在一般的革命時期中，特別是在從資本主義轉到社會主義的時期中，必須有國家和政權。

馬克斯主義和普列漢諾夫，考茨基等的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之區別，即在馬克斯主義承認在上述時期中，不要那種尋常的國會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而是要這種像巴黎公社那樣的國家。

後一種（巴黎公社）國家和前一種國家的主要差別如下：從國會資產階級共和國，回復到專制帝國，是輕而易舉的（已由歷史證實），因為，舊的壓迫人民的機器，還是絲毫沒有動搖：如軍隊，警察，官吏等等。公社和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把這種機器搗毀和消除。

國會制度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壓制和抹殺羣衆的獨立政治生活，以及羣衆自

下而上的對於整個國家的民主建設底參加，工農兵蘇維埃，正好相反。

蘇維埃造出巴黎公社似的國家形式，馬克斯稱公社爲『可在經濟上解放勞苦羣衆的公開政治形式』。

有人常時提出這種異議：說俄國的人民，還沒有這種的能力來採用公社制度。這是農奴主的論調，說農民還沒有能力，享受自由權。公社，即工農兵蘇維埃，決不『實施』，不要『實施』，也不應該實施任何在實際經濟情形上，在大多數人民的覺悟力上，還未成熟的那種改革。經濟上的破壞，和戰爭所產生的恐慌，越是利害，最完善的政治形式的需要，也愈是緊急，這種形式，正可幫助醫治戰爭給與人類的重傷。俄國人民的組織經驗愈少，人民本身的組織上的建設工作（而不是單單高位『肥缺』上資產階級政客的組織），就愈應竭力進行。

我們把普列漢諾夫考茨基等假馬克斯主義者所曲解的陳見，愈拋棄得快，我們愈是盡心竭力的幫助人民，立刻在各處建設工農兵蘇維埃，把全部社會生活奪到自已手中。爾伏夫之流，愈是拖延立憲會議的召集，那麼人民就愈是容易作他們的選

擇（經過立憲會議，或者爾伏夫輩如果久不召集立憲會議，那末就是不經過立憲會議）而歸附於工農代表蘇維埃的共和國。人民本身新的組織上的建設的錯誤，在起初時是不能免的；但在爾伏夫所召集的教授們法律家們，起草召集立憲會議奠定國會制度資產階級國家，消滅工農代表蘇維埃等等的法律時，人民犯些錯誤而往前進行，總比空手癡待要好得多。

倘然我們能夠組織起來，並且善於進行宣傳，那麼不但無產階級，就是十分之九的農民，也會起來反對警察的恢復，反對永不撤換的和擁有特權的官吏等，反對脫離人民的軍隊。但新的國家形式，還不祇限於此。

（一）以民警（Militsia）代替警察——這是全部革命過程所產生的改革，並且已在俄國大多數地方，實施起來了。我們應該向羣衆解釋，說在大多數的尋常的資產階級革命中，這種改革，是非常短命的，因為就是最民主最共和的資產階級，也要恢復舊的沙皇時代的警察，使之和人民隔絕而落於資產階級的統治下，以便從各方面壓迫民衆。

要使警察，不能恢復，祇有一種方法：建立全民的自衛隊（民警），把他和軍隊融合起來（以民衆的普遍武裝，代替常備軍）。全部約從十五歲起至六十五歲止的男女公民。都應挨次參加這個民警（倘在上述年齡中的未成年者及老年人可以參加的話）。當雇用勞動者和傭人，在民警中爲公共服務的時候，資本家應照常付錢給他們。如果不吸收婦女來獨立參加政治生活，並且參加日常公民的，社會的服務，那麼不但絲毫說不上社會主義，並且還說不上完全的和堅固的民權。「警察」的那些作用，如照顧病人，孤兒，衛生食物等等，一般的講來，如果沒有實際上的（而不是祇在紙面上）婦女的平權的參加，那末，這些「警察的作用」，如照顧病人孤兒，衛生食物等等，就不能滿意地實現。

不使警察恢復，吸引全體民衆的組織力量，來建設按丁服務的民警，——這就是無產階級爲保護，鞏固，與發展革命起見，所應該在羣衆中進行的任務。

土地和民族的政綱

(一三)現時我們不能確切的知道，在最近的將來，能否在俄國的農村中，爆發強烈的土地革命。農民中間，一方面雇農、雇用工人、和最貧農（『半無產者』），他方面富農和中農（有產者和半有產者）二者中間的分化，近來無疑地更加利害，我們不能知道這種分化，究竟深到何等地步。祇有經驗，方能解決並且正在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處於無產階級政黨的地位，我們無條件地不但應該立刻提出土地政綱，並且還應該立刻宣傳可以實行的實際辦法，以促進俄國的農民土地革命。

我們應該要求全部土地的國有，就是說把國內全部土地，變成中央政權的財產。這個政權，應該決定居民者所得土地的面積等等，決定保護森林，灌溉治水等等法律，禁止土地所有者（國家）和佃戶（農家）間，有任何媒介人（即禁止土地的重行出租）。但土地的管理權，及各地土地領有與土地使用的條件之決定，都完全不應該操在官僚們的手裏，而應該操在地方和區的農民代表蘇維埃的手裏。

為提高穀類生產的技術，增加生產的數量，為發展合理化的大規模的農村經

濟，提高社會對於他們的監督起見，我們應在農民委員會內部盡力實現我們主張，使之能在雇農代表蘇維埃的監督下，從沒收的地主采邑上，組織巨大的模範農莊。

社會革命黨滿口高唱小資產階級的空調和政策，特別是空口清談什麼『消費』率，『勞動』率和『土地社會化』等等，無產階級政黨與之相反，他應該解釋，說小規模的經濟，在商品的生產之下，決不能使廣大羣衆免去貧窮和壓迫。

無產階級政黨，並不要立刻且必然的破裂農民代表蘇維埃，但他應該解釋，爲什麼要有特別的最貧苦農民的蘇維埃，或至少要有那些具有這種階級地位的代表之常期特別會議，以作整個農民代表蘇維埃裏面的另外一個小的組織和政黨。沒有這點，那麼民粹派關於農民問題的全部小資產階級甜蜜辭句，都是富裕農民欺騙無產羣衆的遮蔽物，這種富裕農民，只是資本家的另一種變相。

許多社會革命黨人和工兵代表蘇維埃，勸導農民在未召集立憲會議以前，不要奪取地主的土地，不要開始土地革命，這樣，他們只是作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純粹官僚式的宣傳，無產階級政黨與之相反，他應該號召農民按照各地農民代表蘇維埃

的決議，立刻自動地實行土地革命，立刻沒收地主的土地。

這上面特別重要的，是要堅持必須增加食品的生產，以供給戰線上的兵士和城市，堅持絕對不准損壞牲畜，工具，機器，和建築物等等。

(十四)在民族問題上，無產階級政黨首先應該堅持，所有以前爲沙皇所壓迫或強力合併或強迫牽制於國界內（即武力併吞）的國家和民族，都可以宣布並且立刻實行脫離俄國而獨立的自由。

倘不去真正實現分立的自由，那麼什麼放棄併吞政策的聲明和宣言等等，都流成資產階級欺騙工人的工具，或流成小資產階級天真爛漫的希望。

無產階級政黨，企圖在可能的範圍內，建設最巨大的國家，因爲這樣對於勞苦羣衆，更爲有利，他企圖實現各民族間的親善和進步的融合，但他之達到這個目的，不是用武力。而是僅僅用各民族工人和勞苦羣衆之間的自由和友誼的聯合。

俄羅斯共和國，愈是民主化，他在組成工農蘇維埃共和國的路上愈得成功，那末吸引一切民族的勞苦羣衆自願歸附此種共和國的力量，也愈是強大。

完全的分立的自由，最廣大的地方（民族）自治，詳細規定的弱小民族權利的保障——這就是革命無產階級的政綱。

銀行和新迪加的國有

（十五）無產階級政黨，在小農的國家內，當極大多數人民還沒有覺悟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時，決不能以「實施」社會主義為其目的。

只有資產階級的詭辯家，隱避於「似是而非的馬克斯主義」的辭句後，方能從這個真理中，得出為他們政策辯護的結論，他們的政策，在於拖延實際上已經完全成為革命辦法的實行，其實這種辦法，在戰爭時已常為許多資產階級國家所採用；要和迫近的經濟上的完全破壞及饑荒鬥爭，這種辦法，是絕對必須的。

這種辦法，如國有土地，國有一切資本家的銀行和新迪加，或至少由工人代表蘇維埃，立刻加以監督等等，都絕對不是「實施」社會主義，但他們是無條件地必需採用的，並且應當盡可能力量用革命方法，來加以實現。這些辦法，是走向社會

主義去的步驟，且在經濟上已完全可以實行，倘不採用這些辦法，那麼要醫治戰爭所產生的創傷，預防將近的經濟危機，都是不可能的；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永不怕奪取資本家和銀行家的破天荒的利潤（他們『在戰爭上』，尤其大發洋財）。

社會主義國際中的實況

（十六）俄國工人階級的國際責任，現在特別嚴重擺在面前，成爲最主要的問題。

現在不贊許國際主義的，祇有懶漢；就是狹隘愛國主義的祖國保衛派，就是普列漢諾夫和波特索夫之流，並且就是克倫斯基之流，也以國際主義者自居。所以無產階級的政黨，就是愈應該極其明瞭，正確，固定地，用實際的國際主義，去反對口頭上的國際主義。

光禿禿的致全世界工人的宣言，空說忠於國際主義的誓言，直接或間接的想使各交戰國家的無產階級依照次序而發動的企圖，各交戰國家間應訂立革命鬥爭的

『妥協』底那種哀呼，忙碌於社會主義者大會以宣傳和平的舉動——這種思想，企圖和計劃，無論其作者如何誠實，但在他們客觀意義上看來，都是空口清談，最多，也祇天真爛漫的善心良意的希望，祇配遮掩狹隘愛國主義者對於羣衆的欺騙。

法國社會主義的狹隘愛國主義者。早就空口高呼着響亮和動聽的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的辭句，但他方面，却幹着空前可恥的對於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叛變，加入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政府，贊成借款或債券（和且夷之，斯柯比立夫 *Skobeljev*，采萊台里，司節克洛夫等近來在俄國所幹的一樣）反對本國國內的革命爭鬥等等，他們在國會的盜竊行爲上，最稱狡猾和老練，真是首屈一指，無與倫比。

老實人常時忘記世界帝國主義大戰時殘暴和酷虐的境况。這種境况，不容許空話的存在，他正在嘲笑天真爛漫的甜蜜的希望。

實際的國際主義，祇有一種：即奮往直前的工作，發展本國的革命運動和革命鬥爭，並且以宣傳，同情，或物質條件等等，去幫助全世界（不僅一國）上同樣的爭鬥，同樣的路線。

除此以外，其餘都是騙人話。

大戰發生以後兩年多，社會主義的和工人的運動，在各國形成三種派別，誰要是不承認這三種派別，不加以分析，而爲實在的國際派作堅決的爭鬥，那麼他就是自陷於懦弱無能和錯誤之中。

三種派別如下：

一、社會狹隘愛國派，口頭上稱社會主義者，實際上乃狹隘愛國主義者；這些人，承認在帝國主義戰爭中（首先是在現在的帝國主義戰爭中）應『保護祖國』。

這些人是我們的階級敵人。他們已經投奔到資產階級那方面去了。

全世界上（官許的）社會民主黨的正式領袖中，大多數都是如此。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德國的謝德曼輩，法國的萊諾台爾 (Renandel)，蓋特 (Ged) 汕巴 (Samba) 等，意大利的別索拉第 (Pissolatti) 英國的哈得曼，費邊派，和工黨領袖，瑞典的勃蘭丁 (Bronding) 等，荷蘭的特魯而斯特拉 (Trulsstra) 及其黨，丹麥的斯當寧，美國的伯格爾 (Victor Berger) 及其他祖國保護派。

二、第二派人，即所謂「中庸派」，搖擺於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之間。

「中庸派」頌揚和誇張自己，說他們自己是馬克斯主義者國際主義者，說他們贊成和平，贊成多方「逼迫」政府，贊成對於政府提出任何「要求」，政府「表現人民對於和平的渴望」，贊成擁護和平的種種運動，贊成不相併吞的和平（但是也贊成和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的和平）。還說，中央派贊成「統一」，說他們是分裂的反對者。

中庸派是慈悲的小資產階級空辭豔語的王國，口頭上說國際主義，實際上是害怕社會狹隘愛國主義卑怯機會主義及獻媚行爲。

問題的焦點，即在「中庸派」不相信必須革命，以反對本國政府，不提倡革命，不進行堅決的革命爭鬥；而臆造最卑鄙的（並且特別響亮地空談馬克斯主義）避免革命的遁辭。

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是我們的階級敵人，是工人運動中的資產階級分子。他

們客觀上是爲資產階級所收買（高等的工資，名譽的地位等），幫助自己資產階級掠奪和壓榨弱小民族，幫助資產階級爲分割資本主義贓物而爭鬥，他們就是這樣的這類的這部分的工人。

『中庸派』，是老頑固派，是爲腐敗的公開行動所腐化了的，爲國會主義環境所毀壞了的那種官僚，他們祇習於肥位厚祿，習於『平安』的工作。在歷史上和經濟上講來，他們並不代表特別等級，當工人運動從已過去的階段，從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的階段（這個階段，給無產階級以許多寶貴經驗，特別是非常廣大的無產階級所必需的，怎樣緩慢，堅毅，繼續不斷地進行組織的工作之藝術（轉到新的階段時（這個階段，從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以來，在客觀上已成必需的了，這個階段，展開社會革命的新時代）必然有些過渡東西，他們就是這些過渡的東西。

『中庸派』的主要領袖和代表是考茨基，他是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的出名首領，完全破產的馬克斯主義者模型，他最無品格，並且是一九一四年八月以來最可恥的搖動和叛賣行爲的模型。這派在德國有考茨基，哈賽（Hase）萊

及保和國會內的所謂「工人勞動友誼團」在法國有郎格 (Longuet) 拍萊司曼和一般的孟塞維克派；在英國有司諾登，麥克唐納爾及其他獨立工黨和一部分英國社會黨的首領；在美國有喜爾主持等，在意大利有屠拉第，脫萊凡司，莫及良尼等，在瑞士有格立姆；在奧大利有阿得萊之流，在俄國有孟塞維克，阿克賽而洛特，馬爾托夫，且夷之及采萊台里等等。

自然，單獨的個人，有時不知不覺地從社會狹隘愛國主義的地位轉到『中庸派』的地位，或是相反。每個馬克斯主義者都知道，不管個人怎樣可以自由的從一個階級轉到別個階級，但階級總是各不相同，同樣的在政治上生活上，不管個人怎樣可以從這派轉到別派，不管他們怎樣企圖和努力進行各派的融合，但各個派別，總是各不相同的。

三、第三派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青墨瓦爾特 (Zimmerwald) 左派」(一九一五年時，由意大利社會黨主動，在青墨瓦爾特地方召集國際社會黨大會，討論對於戰爭的態度，其中左派以列寧爲首堅持進行堅決的革命的鬥爭，把帝國主義戰

爭，轉成國內的戰爭——譯者註），最親切地表現他們主張。

主要的特點，是在他們和社會狹隘愛國主義及「中庸派」完全破裂。和他們本國的帝國主義政府，和本國的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爭鬥。他們的原則：「主要的敵人，是在本國。」他們和社會和平主義者的（口頭上是社會主義者，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者；資產階級和平主義，夢想不要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就可獲得永久的和平）甜密辭句和各種遁辭（說在現時的這次戰爭中，無產階級爭鬥，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沒有可能；不適應環境，不合時期），作堅決的爭鬥。

這派最有名的代表：在德國是「斯巴達團」或「國際主義團」，卡爾·李卜克內西即其會員之一。李卜克內西是這派的和新的真正無產階級國際的最有名代表。

李卜克內西號召工人兵士倒戈反對自己政府，李卜克內西，從國會的講壇上，公開的聲說。以後，他就出來到卜茨達場上（柏林最大空場之一）在遊行的時候，散發秘密印刷的宣言，號召「打倒政府」。他於是被捕，判作苦工。他現在坐在德

國的苦工監獄裏，其實，德國數百（倘不是幾千的話）的真正社會主義者，也都因反對戰爭而在牢獄中過活。

李卜克內西在演說與信札上，不但和本國的普列漢諾夫，波特萊索夫（即謝德曼，李金，但維持之流）並且還和本國的『中庸派』和本國的且夷之，采萊台里輩（即考茨基，哈賽，萊及保之流），進行無情的爭鬪。

從一百十個國會議員中，李卜克內西和他的朋友溜萊（Otto Rühle）衝破紀律，毀裂和『中庸派』及狹隘愛國主義者的『統一』，以二人力量，獨抗一切。李卜克內西一人代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事業及無產階級革命。其餘全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借用盧森堡（她也是『斯巴達團』的會員和領袖之一）的正確的話來說，是已成死屍的了。

別一個真正國際主義者的團體，是布萊盟城工人政策報。

在法國，最近於實際國際主義者的，是羅里歐（Lorio）與其朋友（蒲爾台龍 Burdoron 與梅亥姆 Merheim。已陷入社會和平主義中）以及日內瓦發行明天雜誌

的及爾波 (Guilbeau)；在英國有職工運動者報和英國社會黨及獨立黨的一部分（獨立工黨內例如萊賽 William Russell，公開號召和叛賣社會主義的領袖分裂）蘇格蘭的國民教師社會主義者馬克林，他因為幹反對戰爭的革命鬪爭，為英國資產階級政府，判作苦工，英國數百萬社會主義者，都因反對戰爭的同樣罪名，顛連於監獄之中，他們，祇有他們，方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在美國，有社會工黨，以及機會主義的『社會黨』內發行（自一九一七年一月開始）國際主義者雜誌的那些份子；在荷蘭，發行論壇報的『論壇派』（派涅柯克，郭泰，文珂伯，羅蘭好而斯特），以前是青墨瓦爾特的中庸派，現在歸到我們方面來了；在瑞典，少年黨或左派黨，其中有這樣的領袖，例如林特哈根、納爾曼、卡爾遜、司得立姆、海格龍特，他們親身參加青墨瓦爾特會議，共同建立青墨瓦爾特的左派，現在因進行反對戰爭的爭鬪，被判入獄；在丹麥，有特禮兒及其朋友，他們退出史多寧總長所領導的完全變成資產階級工具的丹麥社會民主黨；在保加利亞，有『且史涅克』派（社會民主黨中革命的左派）；在意大利，最相近的，是社會黨的書記拉撒里和

中央機關報紙前進的編輯賽拉弟；在波蘭，有拉台克，加涅茨基及其他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他們聯合於『邊陲局』中，此外還有盧森堡，鐵世科及其他聯合於『邊陲局』中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在瑞士，左派草成了『聲明書』（一九一七年一月）的要旨，以和本國『中庸派』鬭爭，他們並且在台賽城的祖立嚇區社會黨大會上，提出原則上反對戰爭的決議案；在奧地利，有法萊台立克，安得萊的左派朋友，其中一部分在維也納的馬克思的俱樂部內工作，這俱樂部，現在已爲奧地利最反動的政府封閉，奧大利政府因安得萊英勇敢地冒昧地刺擊總長，所以想把他毒害……等等。

事情並不是在爭執上，這種爭執，就在左派中，也是有的。事情是在派別上。要在殘酷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時代，作真正的國際主義者，不是容易的事，這就是分成各派的基礎。真正的國際主義者非常的少，但是社會主義的整個將來，却只在他們身上，只有他們是羣衆的領袖，而不是羣衆的誘惑者。

在帝國主義戰爭的狀況下，社會民主黨內部以及一般的社會主義者內部改良主

義與革命者的分別，現在客觀上不可避免的要經過變更。誰要是只限於向資產階級政府『要求』，叫他講和，叫他『表現人民渴望和平等公意』等等，實際上就落入改良派的主張中。因為客觀上，戰爭的問題，只能用革命來解決。

要從戰爭轉到民主的非強迫的和平，轉到民族的解放，使之脫離資本老爺們之數萬萬利息的抽剝（他們在『戰爭』上，特別發財），要做到這樣，除了無產階級革命外，再沒有其他出路。

對於資產階級政府，可以而且應該要求各色各樣的改良，但要知道這些人，這階級，是為資本帝國主義的千百萬條繩索所細扎住的，所以倘然要求他們扯斷這些繩索，那麼就非陷入改良主義不可，但如果不扯斷這些繩索，則任何關於戰爭以及反對戰爭的話，都只是空洞的騙人的辭句。

『考茨基派，中庸派』，口頭上是革命者，實際上是改良主義者，口頭上是國際主義者，實際上是社會的狹隘愛國主義的幫手。

青墨瓦爾特國際的破產——創設第三國際的必要

(一七)青墨瓦爾特國際在最初時，就已站在搖動的，『考茨基派』的『中庸派』的地位上，因之青墨瓦爾特左派就不得不劃清界限，明白目標，而發表自己的宣言（在瑞士用俄、德、法等國文字發行）。

青墨瓦爾特國際的最主要缺點——他破產（因他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經破產了）的原因，是搖動，是在最主要問題上遲疑不決。這個主要的問題，就是社會狹隘愛國主義和海牙社會狹隘愛國主義國際（以樊迪文，居依斯曼等爲首）完全分裂的問題，實際上，此問題可以決定一切。

我們還不知道：青墨瓦爾特的多數，剛是考茨基派。但這個主要事實，是不能不顧到的，並且在西歐已爲人所共知。就是狹隘愛國主義者，極端的狹隘愛國主義者，極端狹隘愛國主義的漢姆尼茨報之主筆，極端狹隘愛國主義的拍爾復斯（人名）的警鐘報之職員，玄依而曼（自然是『社會民主黨人』，並且是『統一』社會民主黨的顯然擁護者）也不得不在報上承認『考茨基派』和青墨瓦爾特的多數，實無二致。

在一九一六年末，一九一七年初，最終決定了這個事實。不管金泰爾的宣言，怎樣斥責社會和平主義，但整個青墨瓦爾特的右派，全部青墨瓦爾特的多數，都掩於社會和平主義之中了；考茨基之流，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二日的許多演說中，已有如此表現，法國蒲爾台龍梅和亥姆在社會黨和勞動總會（即法國職工會全國組織）的大會上（二大會都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和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同心一意地贊成和平主義的決議案；意大利的屠拉第之流及其他的全黨，都站在社會和平主義的地位，屠拉第本人，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的演辭中，甚至說出（自然不是偶然的）國家主義的掩飾帝國主義戰爭的辭句。

青墨瓦爾特，和金泰爾會議的主席格立姆（Robert Grimm）在一九一七年一月與其本黨內的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格萊立赫、拍處留格、苗萊而等），聯合起來，共同反對真正的國際主義者。

在各國青墨瓦爾特派的兩次會議的上面（一九一七年一月和二月），幾個國家的左派國際主義者如：國際青年同盟的書記和極好的國際主義報紙青年國際的主筆

民錚堡 (Munzenberg)，我黨中央代表徐諾維也夫，波蘭社會民主黨(邊睡局)的代表拉台兒，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斯巴達團」的會員哈得史登等，正式痛罵青墨瓦爾特多數的雙關的和掛羊頭賣狗肉的行動。

俄國無產階級所得的教訓，已經是非常多了，全世界沒有一處的無產階級，能夠像俄國那樣，發展這樣雄偉的革命力量。但是給他多的，所要求於他的也多。

我們再不能往下留在青墨瓦爾特的臭泥潭中了。絕不能因為青墨瓦爾特的考茨基派，而和普列哈諾夫與謝德曼的狹隘愛國主義國際，發生半面的關係。應該立刻和這個國際分裂，留在青墨瓦爾特只為着得些新聞。

正是我們這些人，正是現在這個時候，應該急不容緩地創立新的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國際；其實，我們正可高聲承認，這個國際，已經創設起來，並且已在開始工作了。

這是我們在上面所舉的那些「真正國際主義者」之國際。他們，只有他們才是革命國際主義的羣衆之代表，而不是羣衆的誘惑者。

倘然以爲這樣的社會主義者，數量太少，那麼每個俄國工人可以自問，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三月革命之前夜，俄國覺悟革命者，究竟多少？

事情不是在數量上而是在真正革命無產階級之思想和政策的正確的表現上。主要之點，並不在「宣布」國際主義，而是在當最困難的時候，能夠成爲真正的國際主義者。

我們不要被什麼協定什麼國際會議的希望所欺。倘然帝國主義戰爭延長下去，那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軍事專政，將如鋼鐵壓榨機似的，把國際間的關係，榨到極小限度。就是不得容忍第二政府（即工人代表蘇維埃）存在之共和主義者，密留柯夫先生，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時，也不放瑞士的社會主義者 拍拉登（Eritz platten）瑞士社會黨書記，國際主義，青墨瓦爾特和金泰爾會議的參加人）進境，雖然他娶了俄國的親，並且和其妻的親屬同行，雖然他在里加參加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坐過俄國的監獄，並且爲要獲得自由，納過保證金給沙皇政府；因之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他取回保證金，雖是如此，但密留柯夫，不放他進境；倘然在一九一七年四

月，共和主義者密留柯夫能在俄國幹這種事，那麼資產階級關於無併吞之和平底種種允許，預約，空辭和宣言等等，具什麼價值，自可不言而喻。

英國政府逮捕托洛斯基的事情如何？不放馬爾託夫出瑞士，希望把馬爾託夫誘到英國，使之和托洛斯基，受同樣的命運，這些事實又是如何呢？

不要墮入幻想，不要自欺。

我們已得證明，就是在斯託克好姆，也不放忠於馬克斯國際主義社會黨人過來，即連他的信，不管經過怎樣嚴密怎樣凶惡的軍事檢查，也不放他進來，所以在這樣狀況之上，『等待』國際代表大會和會議，就是做國際主義的叛徒。

我們的黨不應『等待』，而應該立刻創立第三國際，德國和英國監獄中的千百社會主義者聞之當爲之心曠神怡，成千萬的德國工人，現在正舉行罷工與遊行，嚇住德皇威廉麾下的混蛋和強盜們，他們（指工人）在祕密的傳單上，看到我們的決議案，看到我們對於李卜克內西（只對於他）的兄弟似的信任，看到我們直到如今總是反對『革命祖國保衛派』的決議案，他們看後，當更加堅決相信革命的國際主

義。

所受者多，所付者亦多。全世界上，現在沒有一國，有俄國這樣的自由。我們利用這種自由並不是去提倡擁護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革命祖國保護派』，而是要果敢地忠實地以無產階級的勇氣，李卜克內西的精神，建立第三國際，這個國際，是和叛賊（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及『中庸派』搖動分子，勢不兩立的。

（一八）我講上面這些話以後，對於俄國社會民主黨內部絕對談不到統一的這個問題，已可不必多費口舌了。

寧可只剩二人，如李卜克內西一樣（這就是和革命的無產階級留在一起），而不可片刻保存有與孟雪維克，與且夷之及采萊台里等聯合的思想；這些人在工人報上與波特萊索夫，成立聯盟，他們在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執行委員會中，贊成戰事借款，他們已流為『祖國保衛派』了。

讓死人殮葬他們的屍首。

誰要是想去幫助搖動的人，那麼最先就要使自己不搖動。

我們的黨應用什麼名稱，方使他包含正確的科學意義，並且在政治上，促進無產階級覺悟心的啓發

(一九)現在轉到最後的問題，我們黨的名稱。我們應該像馬克斯恩格斯一樣，稱自己爲共產黨。

我們應該重複的說，我們是馬克斯主義者，以共產黨宣言爲基礎；這個宣言在二點上爲社會民主黨所曲解，爲他所叛賣：這二點即是：(一)工人沒有祖國，在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衛祖國』是叛賣社會主義；(二)馬克斯主義關於國家學說，爲第二國際所改頭換面。

『社會民主黨』的名稱，在科學上講來是不對的，馬克斯不斷地並在哥達綱領批評上，把他指出來，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更通俗的複述過。人類從資本主義只能直接轉向社會主義去，就是說公有生產工具，並且按照工作程度分配產品。我們的黨要看得更遠些：社會主義不可避免的一定要轉到共產主義，在共產主義的旗幟

上輝耀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這是我的第一個理由。

第二、我們黨的名稱（社會民主黨）之第二部分（即民主），在科學上看來，也是不對的。民主主義（德謨克拉西）是國家形式的一種。可是我們馬克斯主義者是反對任何國家的（就是說馬克斯主義者，以消滅任何國家，爲其終極的目的——譯者註）。

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的首領普列漢諾夫，考茨基和諸如此類的人，脫離了馬克斯主義，把馬克斯主義曲解改頭換面了。

馬克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不同的，即在馬克斯主義承認在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時候，必須有國家；但是所需要的並不是國會制度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和考茨基等不同的即在此）而是像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和一九〇五年一九一七年的工人代表蘇維埃那樣的國家。

我們的第三個理由是：我們實際生活和革命，已在事實上造成新的「國家」，

雖然他現在還在柔弱萌芽的形式中，可是總已經存在了，這種國家已不是按照字面本意的那種國家。

這些已經是羣衆實際行動的問題，而不祇是領袖們的理論問題。

國家，在字面本意上講來，是脫離人民的一羣武裝隊伍對於人的指揮。

我們的正在產生的新國家，也是個國家，因為我們需要武裝隊伍，需要極嚴整的秩序，需要對於沙皇的，古契柯夫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之一切企圖，作無情的壓迫。

但是，我們的正在產生的新國家，不是按照字面本意的那種國家，因為在俄國許多地方，武裝的隊伍，正是羣衆本身，正是全體民衆，而不是高踞於上，離衆獨立，擁有特權，實際上永不更換的老爺們。

不應往後看，而應向前看，不要癡望着普遍的資產階級式的民主，因為他祇是用舊的。帝制時代的管理機關，用警察、軍隊、官吏等等，來鞏固資產階級的統治。

應該向前觀望正在產生的新生的民主，他已經不再是民主，因為民權是民衆的統治，而武裝民衆不會自己統治自己。

民主這個字，用來稱呼共產黨，非但在科學上不對，並且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以後，更像眼罩一樣，罩在革命民衆的眼上，阻礙他們自由地勇敢地，自動地建設新的國家（即工農等等代表蘇維埃）使能把他作爲『國』內的唯一政權，以作『消滅』任何國家的先鋒。

我的第四個理由是：應顧到全世界社會主義的客觀狀況。

當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時馬克斯和恩格斯自覺地容納這個不正確的，機會主義的名辭：『社會民主』，但現在情形，已經不像那時了。那時正當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歷史情形，提出那時的切身問題：進行緩慢的組織上和教育上的工作，其他工作沒有。無政府主義者不但在理論上而且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完全不對的（現在還是如此）。無政府主義者對於時機估計得不正確，他們不懂得世界形勢；那時英國工人，受帝國主義利潤的蠱惑，巴黎公社失敗，德國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

剛剛得到了勝利（一八七一年），半農奴制的俄國，正睡在數百年來的深夢中。

馬克斯和恩格斯正確地估計到時機，深悉國際的情勢，深悉怎樣逐漸進到社會革命去的任務。

我們也知道新時代的任務和特點，我們不效法那種可憐的馬克斯主義者，馬克斯對於這些人，曾這樣的說：『我散播了龍種，但給我的收穫，却是臭蟲。』

資本主義轉入帝國主義時代所形成的客觀要求，產生了帝國主義戰爭。戰爭使全人類瀕於危崖，使全部文化毀滅，使數千百萬的人，有如暴獸似的陷於死亡。除無產階級革命外，再無別的出路。

當這個革命，已經開始，當這個革命游移地，不堅決地不自覺地，深信資產階級地正做第一步的時候，當這時候，大多數（這是真話，這是事實）『社會民主黨』的首領，『社會民主黨的議員』，『社會民主黨的報紙』（這些正是影響羣衆的機關報），都叛變社會主義，出賣社會主義，投降『自己』國家的資產階級。

羣衆憤激起來心意錯亂，他們爲這些領袖所欺。

這個舊的『社會民主黨』的名稱，已如第二國際一樣的腐污，倘然我們還是沿用老的陳舊的名稱，那麼我們不會鼓勵和幫助這種欺騙。

讓『許多』工人，忠實地領會社會民主的名稱罷。可是我們應該知道怎樣把主觀和客觀情形區別開來。

主觀上，這些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是無產階級羣衆的最忠實領袖。

但是全世界上客觀的形勢，已是這樣，使我們黨的舊名稱，會幫助着羣衆，妨礙運動的前進；因爲羣衆在每一個步驟上在每個報紙上在每個國會的黨團內，都祇看到領袖，即看到那些言所共聞事所共知的人們，但這些人全都是『所謂社會民主黨人』，他們全都贊成和平社會主義叛賊和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統一』，他們全都要求償付『社會民主黨者』所發的舊支票。

反對的理由是怎樣的呢？怕『和無政府主義的共產主義者混淆』……。

我們爲何不怕和『社會民族主義者』及『社會自由主義者』，和急進社會主義者，和法蘭西共和國內部在資產階級欺騙羣衆上最稱先進最形狡滑的資產階級政黨

等等混淆呢？他們這樣回答道：『羣衆已經習慣了，羣衆「愛」自己的社會民主黨』。

這就是唯一的理由，但這個理由，完全拋棄了馬克斯主義的科學，及革命的將來的任務，完全不顧世界上社會主義的客觀情形，不顧第二國際的破產，不顧包圍無產階級的『所謂社會民主黨人』之狐羣狗黨對於實際事業的破壞。

這是冥頑不靈的理由，神昏顛倒的理由，萎靡不振的理由。

可是我們要改造世界。我們要停止世界帝國主義戰爭，在這戰爭中，連累數千萬人，牽制數千萬資本的利益；這個戰爭，如沒有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是不能停止的。

而我們自己害怕起來。我們還要沿用『習慣的』『可愛的』醜陋的外褂。……時候已經到了。該拋棄醜陋襤褸的外褂，穿起潔白清淨的大衫。

（彼得格勒，一九一七年四月十號。一九一七年九月，第一次印成單行本）

我們的觀點

——對於兵士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議決案的答覆——

四月十六號的報紙，登載下面的決議案：

「據同志們報告，搗亂派的宣傳，尤其是所謂列寧的宣傳，假冒着革命的甚至社會民主黨的旗幟，正在四下散布；兵士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討論了這個問題以後，認為這種宣傳的危險，不較任何右派的宣傳為次，同時因為當他（宣傳）祇限於宣傳時，我們不能對他採取壓迫的手段，但他方面更認為我們必須採取各種可能的辦法，用我們的宣傳和煽動，去對抗這種宣傳。我們應該努力，為使我們的組織有充分的力量，可以隨時用我們的行動，對抗無論那方面的反革命鬪爭起見，應在報章上特別在軍隊中，進行經常的煽動。」

倘然我們把這個決議案和新聞報（四月十七號）編輯部反對「可恥和可惡的謾罵」之時評對照，那麼我們立刻可以看到，對於這個問題，事實上存在着怎樣的政治上的分別。

謾罵的機關報俄羅斯自由報，及重複『這種鬭爭方法』的普列漢諾夫輩的統一報被人民事業報認作證人了。

兵士代表蘇維埃，採取別種態度，他直接的聲明：『當他祇限於宣傳時，我們不能對他採取壓迫的手段。』

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轉載執行委員會決議案全文，而以爲給他作實在的分析，是很有益處的原因。

這個決議案聲斥列寧的宣傳之『危險，不較任何右派的宣傳爲次』。

讓我們來看，差別之點，究竟何在：（一）右派的反革命的宣傳；再次（二）贊成臨時政府，贊成幫助臨時政府的宣傳；（三）我們的宣傳。

右派要想推翻臨時政府，回復到帝制去。

臨時政府口頭上允許徵求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同意而行動。

我們的宣傳：全部政權，祇應該轉到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手中去，因爲這些蘇維埃顯然的代表極大多數人民。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我們就要『解釋明白』

（列寧最初就在他的提綱上正確地明白地說過），使大多數民衆，都了解這種政權轉變的必要。

所以，右派主張皇帝的政權。資本家主張資本家的政權（因臨時政府是資本家的政府），他們口頭上允許徵求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同意和行動。

我們要使大多數人民相信，政權祇應該歸到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手中。

再明顯沒有，就是從贊成和臨時政府妥協的那些人的觀點上看來，也絕對不能把我們的宣傳，稱作『危險不較任何右派的宣傳爲次』。贊成妥協的人，現在正依靠在大多數人民之上！他怎樣能夠把我們勸告大多數人民奪取全部政權的宣傳，稱作『和右派宣傳一樣危險』呢？

這是顯然的矛盾。

工人代表蘇維埃，恐不能長久擁護執行委員會的這種意見罷。

再往上講。

我們的爭執，實際上究竟何在？

最主要的是在三點上：

(一) 土地問題，我們主張，農民可以根據本地大多數農民本身的議決案，立刻奪取全部土地，以增加供給兵士用的麵包和肉類的生產。

臨時政府，贊成農民和地主作『妥協』，就是說贊成三百個農民和一個地主妥協。

試看大多數民衆，在這個問題上究竟擁護我們還是擁護臨時政府。

(二) 我們要有這樣的共和國，使其從下而上，沒有警察，沒有常備軍（據我們的意見，代之而起的一定要有全民的總武裝），沒有事實上從不更換的享有特別權利的，領取資產階級薪俸的那種官吏。我們對於官吏，主張完全要經過選舉，隨時可以撤換，並且應領取無產階級的薪俸。

臨時政府贊成恢復尋常警察，贊成常備軍，贊成尋常的官吏。

(三) 臨時政府主張繼續血手尼古拉所開始的那個和那種戰爭。臨時政府主張批准沙皇所訂的祕密的盜劫條約，不問民意如何，而且甚至不把條約公佈。

我們反對那種戰爭，反對批准這種條約，反對不把條約公佈。

我們向全世界民衆建議非強迫的和平，即以真正民主的和平，來結束這個戰爭；這個和平，將給全世界的人民和民族以自由。我們要證明給民衆看，就是假使真正欲以非強迫的和平，來結束戰爭，那末必須使政權完全轉入工人蘇維埃的掌握中。

因爲當政權握在資本家和地主（古契柯夫，爾伏夫，密留柯夫等）的手裏時，戰爭總是實際上處在資本家領導之下的，這時關於放棄併吞，締結和平之允許，總是口頭上的允許；全世界工人羣衆對於資本家政府的不信仰，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戰爭還是要拖延下去的。

問題：倘然在俄國，政權轉到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掌握中，但在德國，却沒有發生這樣的革命，來推翻威廉第二，及德國的古契柯夫和密留柯夫輩（倘然德國的古契柯夫，密留柯夫輩代替了德國的尼古拉第二，那麼對於戰爭，絲毫沒有產生變更），那麼這時怎麼辦呢？

我們的回答：握於工兵代表蘇維埃手中的政權，將是大多數民衆的政權，這大多數是工人和最貧苦的農民。他們確實無意於併吞，他們非但在口頭上，並且在實際上，放棄併吞，他們在實際上不作資本家利潤的保衛者。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我們同意於革命的戰爭，以反對一切外國資本家。因為這個戰爭，在事實上確是反對一切國家的資產階級利益的戰爭，而不是擁護一國的資本家利益的戰爭。

問題：倘然不能簡單的應用『倒插槍上刺刀於土中』的辦法來結束戰爭，那麼，在實際上究竟怎樣方能可以立刻促進和平的實現呢？

我們的回答：簡單的把槍上刺刀，倒插於土中，或交戰國中的一國單方面地休戰，都不能結束戰爭。要促進和平的實現，實際的急切的辦法，祇有一種（除掉工人革命，戰勝資產階級以外）就是：前敵兵士，相互聯歡起來。

我們應該立刻地，盡力地，多方地，無條件地幫助前敵雙方交戰國兵士的聯歡，這種聯歡已經開始了。讓我們來幫助他呵。

這就是我們的意見。我們堅決地相信，大多數民衆，總不會把他稱作「其危險不較任何右派的反革命宣傳爲次」。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第三五號真理報)



我們的回答：握於工兵代表蘇維埃手中的政權，將是大多數民衆的政權，這大多數是工人和最貧苦的農民。他們確實無意於併吞，他們非但在口頭上，並且在實際上，放棄併吞，他們在實際上不作資本家利潤的保衛者。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我們同意於革命的戰爭，以反對一切外國資本家。因爲這個戰爭，在事實上確是反對一切國家的資產階級利益的戰爭，而不是擁護一國的資本家利益的戰爭。

問題：倘然不能簡單的應用『倒插槍上刺刀於土中』的辦法來結束戰爭，那麼，在實際上究竟怎樣方能可以立刻促進和平的實現呢？

我們的回答：簡單的把槍上刺刀，倒插於土中，或交戰國中的一國單方面地休戰，都不能結束戰爭。要促進和平的實現，實際的急切的辦法，祇有一種（除掉工人革命，戰勝資產階級以外）就是：前敵兵士，相互聯歡起來。

我們應該立刻地，盡力地，多方地，無條件地幫助前敵雙方交戰國兵士的聯歡，這種聯歡已經開始了。讓我們來幫助他呵。

這就是我們的意見。我們堅決地相信，大多數民衆，總不會把他稱作「其危險不較任何右派的反革命宣傳爲次」。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第三五號真理報)



資本家），祇應該相信城市工人。祇有和城市工人聯合，貧農方能使土地，鐵路，銀行，工廠等等，都轉為全體勞苦羣衆的財產；倘然不是這樣，而祇有土地，轉給人民，那麼困苦與貧窮，還是絕對不能消滅的。

在俄羅斯許多地方，工人已起來建立工人對於工廠的監督。這種監督，是對於農民有利的。因為他能夠使生產增加，生產品低廉。農民應該以全力幫助工人的這種舉動，不要相信資本家對於工人的毀謗。

第二問題，關於戰爭。

現在的戰爭，是掠奪的戰爭。各國的資本家，為着他們掠奪的目的，為着增加自己的利潤，所以進行這個戰爭。這個戰爭給與勞苦民衆的，除死亡，苦痛，破壞，暴亂等等以外，再絕對沒有并且也不會有別的東西。所以我們的黨，覺悟工人的黨，最貧苦的農民的黨，堅決地無條件地，斥責這個戰爭，拒絕在別國資本家之前，為一國的資本家辯護，拒絕幫助任何國家的資本家，要以推翻各國資本家，興起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手段，來求得這個戰爭的迅速的終結。

在我們現在新的臨時政府內，十個總長，屬於地主和資本家的政黨，六個屬於「民粹派」（「社會革命黨」）和社會民主工黨的孟塞維克。我們深信，民粹派及孟塞維克，在加入資本家政府及同意幫助政府等等事情上，做了極重大的致命的錯誤。這些領袖如采萊台里，邱爾諾夫之流，希望促醒資本家，叫他們更快地更忠實地去停止這個掠奪戰爭，這些民粹派和孟塞維克政黨的首領，錯了；事實上，他們幫助資本家，準備俄國軍隊對於德國的進攻，這就是說拖延戰爭，增加戰爭給與俄國人民的空前的繁重的犧牲。

我們深信各國的資本家欺騙民衆，他們空口允許迅速的公正的和平，實際上拖延掠奪的戰爭，俄國的資本家，以前握有舊的臨時政府，現在還照樣握有新的政府，他們就是連那些祕密的掠奪他國的條約，也不肯公佈（這些條約，是尼古拉和英法及其他等國所訂立的，其目的是在佔據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奧大利的加立西亞，土耳其的阿美尼亞。臨時政府已經批准并且正在批准這些條約）。

我們的黨，以爲這些條約，與德國資本家，威廉皇帝等等強盜和他們聯盟者所

訂的條約一樣，同是罪惡的掠奪的條約。

工農的鮮血，不應該爲着要達到資本家的掠奪目的而犧牲。

應該趕快停止這個罪惡的戰爭，不是用單獨的和平，而是用全體的總和平。不是用資本家的和平，而是用勞苦羣衆反對資本家的和平。要達到這個目的，祇有一條道路：即全部國家政權，應完全歸入俄國及其他各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手中。祇有這樣的蘇維埃，能在實際上阻礙資本家對於人民的欺騙，阻礙資本家方面之拖延戰爭。

現在我轉到我所舉出的第三問題：建設國家的問題。

俄國一定要成爲民主共和國。對於這點，就是素來擁護帝制的大多數地主和資本家，現在也是同意的了，因爲他們現在深信俄國人民，絕對不准帝制的恢復。所以資本家現在就用盡全力，以求俄羅斯的共和國愈像帝制愈好，愈容易復辟愈好（這種例子，在各國已經屢見不鮮）。因此，資本家就要保留站在人民之上的官吏以及脫離人民而爲不經選舉的將軍軍官等所指揮的常備軍及警察。將軍和軍官，倘

不是選舉出來的，那麼差不多總是出自地主和資本家。這點從世界其他共和國的經驗上，已可以明白看到。

所以我們的黨，覺悟的工人和貧農的黨，要求別一種民主共和國。我們要有這樣的共和國，使在其中沒有凌辱人民的警察，使其中從下至上的一切官吏全要經過選舉，並且隨時可由人民的要求而撤換，使官吏的薪俸，不能超過熟練工人的工資，使在軍隊中，全體官長，也都要經過選舉，使脫離民衆而爲敵視民衆的階級所指揮之常備軍，由民衆的全體武裝及民警 (People's Militia) 來代替。

我們要有這樣的共和國，使國內的全部政權，從下至上，都整個的完全的屬於工農兵等代表蘇維埃。

工人，農民，佔人民的大多數。政權應該握在他們手中，而不應該握在地主資本家的手中。

工人，農民，佔人民的大多數。政權和管理權，應該握在他們蘇維埃的手中，而不應該握在官僚們的手中。

農民同志！這就是我們的觀點。我們堅決的相信，經驗將很快的把民粹派和孟塞維克的政策上的錯誤，指示給最廣大的民衆看。俄國和德國及其他國家一樣，瀕於毀滅的危崖；經驗將很快的指示給羣衆看：如果要挽救這樣的俄國，要挽救，連於戰爭中的人民。那末應用和資本家妥協的方法，是絕對不行的。要挽救全體民衆，祇有使全部國家政權，直接的轉到大多數人民的掌握中。

列寧一九一七年五月七號

（登載於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一日的九號兵士真理報上）



土地問題決議的草案

一、全體地主的及私有主的土地以及皇室，教堂等等的土地。應該無報價地轉給人民。

二、農民應該有組織地經過農民代表蘇維埃，在各處立刻奪取土地，以作經營農業之用，但這并不是說預先替立憲會議或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倘人民把中央政權轉給這種蘇維埃的話）完全規定好土地的制度。

三、土地的私有權，應該完全取消，即是說，全部土地的財產權，應該屬於全體民衆，土地的支配權，却應該歸於地方的民主機關。

四、地主及臨時政府，勸告農民與各地地主成立「協定」，以立刻規定土地的支配權；農民對於這種勸告，應該拒絕；土地的支配，應由各地大多數農民的有組織的決議來決定，而不能由大多數（農民）和少數（極小的少數，即地主）間之「協定」來決定。

五、不僅地主，而且資本家，也是用着種種可能的鬥爭工具，出來反對把全部地主的土地無償還地歸給農民；這些資本家非但擁有極大的金錢的力量，並且還經過報紙，經過許多歸附資產階級統治的官吏，對於尙處黑暗中的羣衆，發生極大的影響。所以假使農民羣衆對於資本家的信仰，不被破壞，農民和城市工人間沒有親密的連繫，全部國家的政權，沒有完全轉入工農兵等代表蘇維埃的手中，那麼全部土地無償還地歸給農民的事，就決不能實行，自然更說不上澈底實行。蘇維埃之統治國家，不是經過警察，不是經過官吏，不是經過脫離民衆的常備軍，而是經過全民的，按了服務的工農民警，祇有掌握於這種蘇維埃手裏的政權，方能保證上述的全體農民所要求的土地改革。

六、農村僱用勞動者和最窮苦的農民，即那些沒有充分的土地，牲畜，工具等，而以出賣勞動爲一部分生活費來源的農民，應該用全力企圖在總的農民蘇維埃中，獨立地建立特別的蘇維埃，或特別的團體，以堅持自己的利益，反對富裕的農民，此種富裕的農民，不可避免的，是要企圖和資本家及地主聯合的。

七、因戰爭的結果，俄國和一切交戰及許多中立國一樣，正瀕臨種種經濟破壞，危機，因勞動不足而起的饑荒，及煤鐵的缺乏等等。祇有工農代表進去監督和領導全體生產品的分配，方能挽救國家。所以農民代表蘇維埃和工人代表蘇維埃之間，在現時就應該準備締結合同，決定怎樣不經過資本家的媒介，並取消他們的工廠管理權，而把麵包及其他農產品和工具鞋子，衣服等等相交換。爲了這些目的，應該鼓勵把地主的牲畜和工具歸給農民委員會，以便共同應用這些工具和牲畜。同樣的，應該鼓勵在每個大的地主采邑上，以最好的工具，在農學專家的指導下，根據農業工人的決議案，建立共同耕種土地的模範農莊。

（譯者註）一九一七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彼得格勒召集了第一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列甯在這個會議上，提出上述草案。但因社會革命黨在會場工佔據多數及優勢，所以列甯的草案，祇得極少數人的贊成，而被否決。

在轉變中

俄國革命，在其發展的第一階段上，把政權轉交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並且還在這個政權之外，建立了代表蘇維埃，蘇維埃中的大多數，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革命的第二階段（六月六日）形式上把厚顏的公開的帝國主義代表，如密留柯夫，古契柯夫之流，排斥於政權之外，並且在事實上，使蘇維埃內部佔據大多數地位的政黨，轉為政府黨。我們的黨，無論在六月六號以前或以後，都留在反對的少數的地位上。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是站在國際主義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在帝國主義戰爭中，站在國際主義地位上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決不能不對任何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政府，採取反對的地位，無論這個政權是帝制，共和或『社會主義祖國保衛派』的政權都是一樣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政黨，不可避免的將在自身的周圍，集合更多的顛連於綿延不絕的戰爭中之羣衆，羣衆以前不相信老牌帝國主義者，現在也同樣的不再相信為帝國主義效勞的『社會主義者』。所以

對於我們黨的鬥爭，在革命初起時，就已經開始。立憲民主黨和普列漢諾夫派對於無產政黨的鬥爭，無論採取怎樣下流和可惡的形式，他的意義，是很明顯的。這個鬥爭，和帝國主義者及謝德曼輩反對李卜克內西和安得萊的鬥爭一樣（德國社會主義的機關報上，宣布他們二人為『狂人』，資產階級報紙更不用說。他們把這二位同志簡直稱為替英國工作的『叛賊』）。總是全部資產階級社會（其中包括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無論他們是怎樣的革……革命）反對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無產階級之鬥爭。

在俄國，這個鬥爭，也進到這個地步，使帝國主義者，企圖借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采萊台里，邱爾諾夫輩之手，以極利害的極嚴重的打擊，來解決無產階級政黨的蒸蒸日上之勢力。采萊台里總長，為要找得進行嚴重打擊的理由起見，於是就採取反革命所慣用的方法，誣蔑我們陰謀不軌。這種誣蔑，僅是口實。其中底蘊，僅在於那種為俄國和協約國鞠躬盡瘁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需要永遠消滅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他們（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以為打擊的時機，已經成熟了。他們顛

動和驚恐，在他們的主人鞭打之下下個決定：或是下手或是從此完結。

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與我們的黨，應該集中冷靜的頭腦，表現最高限度的堅忍和警覺：讓未來的卡文涅克，首先動手吧。我們黨的臨時代表大會，在開會時，已經預先警告他們的毒手。彼得格勒的無產階級，決不讓他們卸責。他（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將等候着，積累自己的力量，準備在這些先生從空話轉到行動的時候，把他們推翻。

（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三日第八十號真理報）

六月十八日

六月十八，無論如何，在俄國革命的歷史上，總是一個轉變的日子。（註）各階級相互之間的情形，他們在相互鬥爭中的比重，他們的力量（特別是和黨的力量相比較）——這些都由星期日的遊行，指示得這樣的清楚、明顯、和深刻，使以後的發展，無論經過怎樣的過程和速度，其從這示威運動上所得的覺悟力和瞭解力，總是非常巨大的。

示威遊行在幾點鐘內，如拭去一團塵埃一樣地，肅清了一切關於布爾塞維克陰謀不軌的空話，並且清如明鏡地指示出，俄國勞苦羣衆先鋒，即首都的工業無產階級，及其大多數的軍隊，都贊成我們黨所素來擁護的口號。

工人和士兵的大隊，齊整地前進。遊行者約計五十萬。一致的和睦前進；一致的提出口號，口號中佔大多數的是：『一切政權都歸蘇維埃』，『打倒十個資本家的總長』，『不准和德國人訂立單獨的和平，不准和英法資本家，訂立祕密的條

約』等等。看到這次遊行的人，再沒有一個還會懷疑這些口號在俄國工人先鋒隊和兵士羣衆中所獲得的勝利。

六月十八日的遊行示威，成爲表示革命無產階級力量和政策的遊行，無產階級指示出革命的方向，指示出絕望的出路。這就是星期日遊行的偉大歷史意義，這就是星期日遊行和安葬革命烈士日及五一節等日遊行的不同之點。安葬烈士時的遊行，祇是人民對於革命第一次勝利及其英雄們的慶祝和敬禮，祇是人民對於已經走過的非常迅速非常順利的向自由走去的第一階段之回溯。五一節是希望的節日，這些希望，是和全世界工人運動的歷史以及和平與社會主義的理想相連的。

這兩次遊行的目的，都不在指示革命往前發展的方向，并且也不能指示出來。這兩次遊行，均沒有在羣衆之前，并且以羣衆的名義，提出具體的確定的切身的問題：革命應往何處走，并且怎樣走。

照這樣講來，所以，六月十八日的遊行，是實際行動的政治遊行；他不在書本上或報章上，而是在街道上，不是經過領袖，而是經過羣衆，解釋各個階級怎樣的

行動，要怎樣的行動，并且將怎樣的行動，以推進革命。

資產階級藏匿起來了。在顯然的大多數民衆的示威遊行中各黨（指資產階級各黨——譯者）有提出口號的自由，其主要目的是爲反對革命，在這樣的遊行中，資產階級拒絕參加。這是很明顯的。資產階級，也是反革命。他避開人民而作真正的陰謀不軌的反對民衆的舉動。現在俄國的當局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在歷史的可紀念的日子，六月十八日，很明顯地表示他們是動搖的政黨。他們的口號，表現出動搖，贊成他們口號的（大家都顯然看到）只極少數。他們的口號以動搖狀態，勸告人民不要移動，照舊維持現狀。但他們和人民，都感覺到這是不可能的。

無產階級的先鋒，俄國兵士和工人羣衆的先鋒說道：搖動得夠了。搖動得夠了。信任資本家，信任他們政府，信任他們的改良主義傭僕，信任他們的戰爭，信任他們進攻的政策等等，這些信任底政策，是沒有希望的。他（這種政策）的破產不遠了。他的破產，是不可避免的。這也就是當局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破產。經濟破壞的危機逐日逼近。除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採取革命辦法以外，再無別法

挽救人民。

讓人民脫離信任資本家的政策，而轉過來信任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在這上面，祇有在這上面，方是他們的力量。在這上面，也祇有在這上面，方才可有擔保，去保障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勞苦和被剝削羣衆的利益；他們這些羣衆被戰爭和資本家所鎮壓，有祇他們方能戰勝戰爭與資本主義。

無限的大危機，逼近俄國和全人類。唯一出路，祇有相信勞苦和被剝削羣衆的有組織的先鋒隊，而擁護他的政策。

人民能否迅速的懂得這個教訓，並且將怎樣加以實現，這點我們不能知道。但是我們肯定的知道除了這個教訓以外，再沒別的死裏逃生的出路，知道對於反革命的一切可能的搖動和殘暴行動，都是得不到什麼效果的。

除了民衆完全信仰自己的領導者無產階級以外，再沒有別的出路。

（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日第八十六號真理報）

（註）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八號在彼得勒格舉行盛大的遊行。蘇維埃大會起初禁止六月一號布爾塞維克

所規定的遊行，並且禁止在「三天」內舉行任何遊街運動，以後因羣衆的逼迫不得不在六月十八號，召集自己的示威運動。這次遊行的結果，出於妥協的蘇維埃大會意料之外，在遊行中布爾塞維克政策獲得完全勝利。參加這次游行的工人和兵士，約達四十萬。百分之九十的旗幟和標號，都寫着布爾塞維克中央的口號：「打倒十個資本家的總長」，「一切政權都歸蘇維埃」。寫孟雪維克和社會民主黨的蘇維埃大會所提出的口號：「信任臨時政府」的，祇有三個旗幟，一個屬於哥薩克的軍團，一個屬於統一報一派，第三屬於猶太工人同盟的彼得格勒支部。在莫斯科城，莫斯科省及俄國其他城市，在這天都舉行同樣的遊行。六月十八號指示羣衆同心一意地，擁護革命，反對任何妥協。



論口號

當歷史上發生急遽的轉變時，就是先進的政黨，也不能在較久的時期中，立刻領悟到新的情形，他還要重複舊的口號，這種口號，昨天雖然正確，但到今天歷史上「突然」的急遽的轉變，而「突然」失去了意義。這樣的事實，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

「全部政權歸於蘇維埃」的口號，也差不多重複這種情形。在過去的一去不返的約自二月二十七至七月四號的時期中這個口號是對的。這個口號現在顯然是不對的了。不懂這點，那麼就決不能懂得目前的切身問題。每個口號，是應該從每個政治環境的種種特點之全部綜合中探究出來的。現在經過七月四號的事變以後，俄國的政治環境，已和從二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四號時的政治環境，完全不同了。

當時，在革命的過去的一個時期中，統治於國內的，所謂是「兩個政權」，他在物質上和形式上，表現國家政權飄搖無定的過渡狀態。不要忘記，政權的問題，

是一切革命的基本問題。

當時政權處在搖動的狀況中。臨時政府和蘇維埃，根據相互間的自願的協定，分享這個政權。蘇維埃，是自由的（即不受外方任何壓迫的）武裝工人及兵士羣衆的代表團。武器握在人民手中，沒有外方的凌駕人民的強力，這是當時的實際情況。正是這種狀況，展開與保證全部革命和平往前發展的道路。『全部政權歸於蘇維埃』的口號，是這條道路上最親近的而且可以直接實現的口號。這是革命和平發展的口號；革命和平的發展，從二月二十七日到七月四日是可能的，并且自然是最所希望的，但在現時，這種和平的發展無條件地是不可能的了。

一般的看來，擁護『全部政權歸於蘇維埃』口號的那些人，不是全部深思熟慮過，不是全部了解這個口號乃是革命和平往前發展的口號。和平的意義，不僅在於沒有一人沒有一個階級，沒有一種強大的力量，會在那時（從二月二十七號至七月四號）反抗和阻礙政權之轉入蘇維埃手中。不僅如此，和平的發展在那時之所以成爲可能，還因爲各個階級及各政黨在蘇維埃內部的鬥爭（在全部政權及時轉入蘇維

埃手中的條件之下），可以最和平地最健全地解決。

關於最後這一方面，大家也沒有加以充分注意。蘇維埃根據他的階級成分是工農運動的機關，是他們專政的現成形式。倘然他們（蘇維埃）擁有全部政權，那麼其中小資產階級成份的最主要的缺點，他們最主要的罪過，對於資本家的信任，都可以在實踐上消滅下去。都可以在自己政策的經驗下，得到批評。擁有政權的階級和政黨，可以在蘇維埃內部，以蘇維埃的統一政權和全部政權為基礎，而和平地替換；全體蘇維埃政黨和羣衆連繫，還是很堅強和鞏固。我們決不能一刻忘記，就是：只有蘇維埃政黨，和羣衆之間最親密的而且同時往深廣二方面自由發展的連繫，方能幫助着去和平地消散小資產階級欲與資產階級妥協的幻想。政權之轉入蘇維埃手中，本身沒有并且不能改變階級的關係；他不能改變小資產階級的農民。但他可以及時的發生極大的效力，使農民脫離資產階級，而和工人親近，更進而與之聯合。

倘然政權及時的轉入蘇維埃手中，那麼可以發生上述的情形。這種情形對於人

民，最爲輕便，最爲有利。這條道路，最爲健全，所以就應該盡力爲之奮鬥。但是現在這種鬥爭，這種要使政權及時轉入蘇維埃手中的鬥爭的已經完結了。和平發展的道路已是不可能的了。不和平的最含有病態的道路，已經開始了。

七月四號的轉變，就是在於此後客觀的情形，急遽地變更了。政權的搖動情形，因此停止了，在最主要的地方，政權已轉入反革命的掌握中。在小資產階級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孟雪維克），與反革命的立憲民主黨妥協的基礎上，政黨的變化，使這二個小資產階級政黨，實際上變成反革命的殺人行爲的幫手。小資產者對於資本家的盲目的信仰，使小資產者在政黨爭鬥的發展過程中，簡直自覺地幫助了反革命派。各政黨中的關係發展底輪迴，已經完結了。在二月二十七日，各個階級，全都反對帝制。

七月四號以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和復辟黨及黑幫一起，吸引小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和孟雪維克，威嚇了他們中間的一部分，而把實際的政權，轉交加文涅克的掌握中，轉交軍閥黨徒的手裏，他們殘殺前敵上不服命令的士兵，並在彼得

格勒蹂躪布爾塞維克。

政權轉給蘇維埃的口號，在現時祇能成爲理想或笑話。這個口號在客觀上，要欺騙人民，灌注幻想於人民的頭腦中，以爲現在還是和以前一樣，祇要希望蘇維埃奪取政權，或提出接受政權的決議案便夠了，以爲在蘇維埃中，還有不犯幫同殺人的罪惡之政黨，以爲已經過去的，還可以使他回復過來。

如果以爲，革命的無產階級，因爲社會革命黨和孟雪維克，協同踐踏布爾塞維克，槍殺前敵戰士，繳除工人武裝等等，爲着『報仇』起見，而『拒絕』幫助他們來反對革命，那麼這種觀點，是極大的錯誤。這樣提出問題，第一，就是把小資產階級的道德觀念，搬到無產階級的中間來了（因爲爲了革命事業的利益，無產階級非但常時幫助搖動的小資產階級，並且甚至幫助資產階級）；第二，（這是最主要的）就是帶了市井小資產階級的企圖，想把『道德』觀念，來代替政治的實質。

實質即是，現在已經不能和平地獲取政權。只有在堅決的鬥爭中、戰勝現時實際的當權者以後，方能得到政權，現在當權的，正是軍閥的卡文涅克式的狗黨，他

們依靠調集於彼得格勒的反動軍隊，依靠立憲民主黨和保皇黨。

實質即在，只有革命的民衆，方能戰勝新的當權者，革命民衆運動的條件，非但在於革命民衆必須受無產階級的領導，並且還在於他們必須脫離叛賣革命事業的社會革命黨和孟雪維克。

誰要把市僧式的道德觀念灌注於政治上，那麼他就會作這樣的論斷：假使說，社會革命黨和孟雪維克，做了『錯誤』，幫助卡文涅克之流，解除無產階級及革命軍隊的武裝，可是我們總應該給他們以『改正』錯誤的可能，不要『妨礙』他們改正錯誤，應該幫助動搖的小資產階級，轉到工人方面來。這種論斷，即使不是新的對於工人的欺騙，至少也是兒童的幼稚思想，或者簡直可說是愚笨。因為要使小資產階級羣衆，走到工人方面來，只有先使這些羣衆脫離社會革命黨和孟雪維克。社會革命黨和孟雪維克現在想改正他們的錯誤，只有宣佈采萊台里，邱爾諾夫，坦，拉幾脫尼柯夫等爲兇手的幫犯。我們完全並且無條件的贊成這樣的『改正』錯誤。

我們說過，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的問題，還要補充說：正是革命方給我們

指示出這個問題上的不明顯的地方：『究竟真正的政權，在什麼地方』，指示出形式上政權和真正政權的差別。這就是任何革命時期的主要特點之一。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和四月，還不知道真正政權，究竟握在臨時政府手中，抑是握在蘇維埃手中。現在特別主要的是；覺悟的工人，應該深刻地觀察革命的根本問題，國家政權，現時落在誰的掌握中呢？想一想，政權的物質表現是什麼，不要把空話作實事，那麼你們就不難得到回答。

恩格斯說：國家首先是武裝者的隊伍，以及物質的點綴物如監獄等等是。在現時，這就是特別調到彼得格勒來的貴族軍官，反動的哥薩克；這就是拘禁加米尼夫等於監獄中，封閉真理報，解除工人及一部分兵士的武裝，槍殺一部分軍隊等等底那些人。這些劊子手，正是真正的政權。采萊台里及邱爾諾夫之流，乃無權的總長，木偶式的總長，幫助殺人的政黨的首領。這是事實。無論采萊台里及邱爾諾夫，怎樣『不贊同』殺人行爲，無論他們的報紙，怎樣卑怯地推諉殺人行爲，但事實總是不變的，這些變形的政治上的裝璜，不會變改事情的實質。

封閉彼得堡十五萬選舉人的機關報，工人伏因諾夫（*Voinov*）因從印刷所取真理副刊而被軍官學生所殺（七月六號），——這難道不是殺人行爲？這難道不是卡文涅克式的行動？但是有些人對我們說：這上面，政府和蘇維埃，都『沒有犯什麼過失』。

我們回答道？如果是這樣，對於政府和蘇維埃，更是不佳，因為這上面表示出：他們的作用只等於零，他們是傀儡，實際的政權不在他們手中。

人民首先，而且最主要的是應該知道真理，知道國家政權究竟握在誰的手中。應該把全部真理告訴民衆：政權是握在卡文涅克式軍閥狗黨的手裏（克倫斯基，某將軍，某某軍官，等等的手裏），以立憲民主黨爲首的資產階級以及那些在保皇派報紙在新時代（*Novoe Vremia*）生活言論（*Zivoe Slovo*）等等報章上活動的保皇黨人，都幫助他們。

應該推翻這個政權。不然，什麼關於和反革命爭鬥的話，祇是『自欺』，祇是『欺騙民衆』。

采萊台里和邱爾諾夫那些總長們，及其政黨，現時正在幫助這個政權；應該對民衆解釋他們殺人的作用，說明在他們犯了四月二十一日，五月五日，六月九日，七月四日，等等的錯誤以後，在他們贊助進攻的政策以後（這種政策，已經十分之九的預定了七月間卡文涅克輩的勝利），這些政黨不可免的要歸到這種結局。

在民衆中間的全部煽動，應該改造得這樣，使之能夠顧到現時革命的具體經驗，特別是七月事變的具體經驗，就是說，使之能夠清楚地指出人民的真正敵人，軍閥狗黨，立憲民主黨和黑幫等等，使之能夠顯豁地揭破幫同殺人（以前如此，現在還是如此）的小資產階級政黨。

在民衆中的全部煽動，應該改造得這樣，使之能夠說明，在未推翻軍閥狗黨的政權，在未揭破社會革命黨，在未消滅人民對於他們的信仰以前，農民是完全沒有獲得土地的希望的。在『經常』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下，這種解釋，是一種非常長久非常艱難的過程，但是戰爭和經濟的破壞，絕大地促進了這個過程。這種『促進者』，使現在的一個月或一星期，能夠等於平常的一年。

或許會有二種異議，來反對上述意見，第一種說，現在講堅決的鬥爭，等於鼓勵散漫的暴動，而幫助反革命；第二種說，推翻上述政權，等於把政權轉給蘇維埃。

我們對於第一種異議，這樣回答道：俄國的工人，已經有充分的覺悟，使他們不至於在顯然的對於他們不利的時候，投入敵人的挑釁的羅網中。現在如果出來動作，反對敵人，那末等於幫助反革命，這是毫無異義的，祇有在最低下的羣衆中，發生新的革命高漲時，方能作堅決的爭鬥，這也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一般的祇講革命高漲和涵湧，祇講幫助西歐工人等等，是不夠的，應該從我們的過去，得出一定的結論，應該估計我們自己所得的教訓。這種估計，使我們得出堅決反對革命以奪取政權的口號。

第二種異議，也是以太過籠統的論斷，來代替具體的真理。除了革命的無產階級以外，再沒有別的力量，可以推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在得到一九一七年七月的經驗以後，革命的無產階級，應該獨立的奪取國家的政權——，除此以外，再不能

獲得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獲取政權，更得貧農或半無產者的幫助——這就是唯一的出路；上面我們已經回答過，在何種情形之下，可以特別加速這種過程。

在這個新的革命中，蘇維埃可以而且應該出現，但那時蘇維埃已不是現在的蘇維埃，已不是和資產階級妥協的機關，而是和資產階級作革命爭鬥的機關。在那時候，我們的確還是贊成按照蘇維埃的形式建設整個國家。這上面不是籠統關於蘇維埃的問題，而是關於和現在反革命進行鬥爭和現在蘇維埃的叛賣行為進行鬥爭的問題。

如果以抽象的辭句，來代替具體的分析，那麼這是革命中最主要的罪過之一，最危險的罪過之一。現在的蘇維埃，因有社會革命黨及孟塞維克統治於其中，所以坍台了，完全破產了。現在這些蘇維埃，好像綿羊一樣，如果驅之作戰，那末他們祇能匍匐於斧口之下，作啾啾之哀鳴。現在蘇維埃，在勝利的反革命之前，毫無力量，祇能匍匐哀求。假使現在提出政權轉與蘇維埃的口號，那末這是『簡單地』號召把政權轉給現在的蘇維埃，倘在現時作這樣的聲明，作這樣的號召，那要等於欺

騙人民。再沒有別的東西，比這欺騙更危險的了。

俄國階級鬥爭和政黨鬥爭發展上的從二月二十七號至七月四號的一個時期，已經完結了。新的時期開始了，進入其中的，不是舊時的階級，政黨和蘇維埃，而是爲爭鬥的砲火所刷新了的，經過鍛鍊的，經過訓練的，爲爭鬥的進程所改造過的那些階級，政黨和蘇維埃。不應該往後看，而應往前看去。不應根據舊的階級和政黨的情形，而應根據新的七月以後的階級和政黨的情形。在新的時期開始時，我們的分析，應以下列情形爲根據：即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派，得到了勝利，他之所以能夠勝利，是因爲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與他妥協；能夠戰勝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祇有革命的無產階級。在這個新的時期中，到完全戰勝反革命，到社會革命黨及孟塞維克完全失敗（不用鬥爭）到新的高潮發生的時候爲上，還要有各個不同的階段。關於這點，祇能以後單獨講到這些階段時再說。

（此文作於一九一七年七月）

農民和工人

在八月十九日第八八號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新聞報上，登載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這篇文章，應該成爲本黨每個和農民接觸的宣傳員和煽動員，以及每個往鄉村工作或與鄉村接觸的覺悟工人的手上主要文件之一。

這篇文章，是一篇概括的指令，他是根據一九一七年出席彼得堡第一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的各地代表所得的二四二個指令，而做成的。

萬分希望農民代表蘇維埃，能夠絕頂詳盡地公佈這些指令的內容（如果已經不能把他們全部公布的話；自然能全部公佈更好）。特別需要的，是省、縣、鄉、等等的名單，指出在每地搜集了多少指令，說明提出或搜集指令的時間，至少對於其中的主要要求，要作一種分析，使之可以看到各個區域在各點上，有什麼差別。例如，分戶領有土地的以及公社領有土地的區域，大俄羅斯以及其他民族的區域，中央以及邊陲的區域，沒有農奴制的區域等等，他們在提出廢除全部農民土地私有

權，按期重新分配土地，禁止僱用勞動，沒收地主的農具牲畜等等的問題上，有什麼分別。如果沒有這些總計，那末，要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非常寶貴的農民指令的材料，是不可能的。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竭力企圖，以科學方法，研究作為我們政策基礎的那些事實。

在指令彙錄中（我們就這樣稱呼概括的指令），現在還沒有證明出裏面有什麼事實上的錯誤，因為我們沒有更好的材料，所以他就成為這種材料的唯一代表；我重複的說：這種材料，本黨每個黨員，應該各具一冊。

這種指令彙錄的第一部，講到一般的政治狀況，政治上的民主的要求；第二部：講到土地問題（我們希望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或其他人們，會彙錄農民對於戰爭問題的指令和決議）。對於第一部，我們現在不能詳細論述，祇能指出二點；在第六條上，要求全體負責人員，須經選舉。在第十一條上，要求在戰爭結束後，廢除常備軍。這幾點，使農民的政綱，和布爾塞維克的政綱最形接近。根據這幾點。我們應在全部宣傳和煽動中指出並且證明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首領，非但

是社會主義的叛賊，並且還是民主主義的叛賊，因為他們違背民意，違背民主主義的原則，為討好資本家起見，堅持保留臨時政府所批准的而非純粹選舉的政府代表的職務（例如在克龍斯坦特）。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首領，在彼得堡的區議會以及其他地方自治的機關裏，違背民主主義原則，反對布爾塞維克所提出的立刻創辦工人警察並以後轉成全民警的要求。

根據指令彙錄，農民的土地要求，首先就是在於無報償的廢除一切土地的私有財產權，甚至農民的土地，也不在例外；把生產精良的農莊，轉交政府或公社；沒收已沒收的土地上底一切活的或死的農具（小農除外），把他們轉交國家和公社；禁止僱用勞動；勞苦羣衆，平均分配土地，並且按時重新分配等等。在立憲會議未召集以前，農民要求立刻頒佈禁止土地買賣的法律，取消關於脫離公社另立小農莊的法律，頒佈保護森林漁業，及關於取消長期佃約，審查短期佃約等等的法律。

祇要稍須想一想這些要求，就可以看到，倘和資本家相聯，而不和他們完全破

裂，不和他們作階級堅決的無情的鬥爭，不推翻他們的統治，那麼這樣要求，是完全不能實現的。

社會革命黨的自欺，及欺騙農民，即在他們贊許並宣傳那種意見，以為不推翻資本家的統治，不把國家政權轉給無產階級，不由無產階級政權以最堅決和革命的政策，幫助貧農，即可以實現這種改革。「社會革命黨」中自樹一幟的左派的意義，就是在於他們指示出，他們黨中覺悟受騙的情緒，正在增加起來。

事實上，沒收全部私有主的土地即是沒收數萬萬的銀行資本，因為極大部分土地，是抵押於銀行中的。革命的階級，倘不是以革命的手段，打倒資本家的反抗，那麼這沒收土地的辦法，難道能夠發生什麼效力嗎？而且這上面正是牽涉最集中的銀行資本，他以千綫萬結，和強大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之全體重要中心相聯，祇有集中程度不較之為差的城市無產階級的力量，方能戰勝銀行資本。

再次，把生產精良的農莊，轉交政府。祇有無產階級的革命國家，才能取得這些農莊，加以經營而真正為勞苦羣衆謀利益；這難道不是很明顯的嗎？

沒收畜牧場，再進而沒收活的及死的農具，這不但是對於生產工具私有權，作當頭的打擊，這還是到社會主義去的步驟，因為如果把農具轉交政府或公社，『專為他們使用』，那末等於說應該有巨大的社會主義的農業，至少限度，也應該是對於聯合的小農經濟，建立社會主義的監督，社會主義的調劑。

『禁止』僱用動勞如何？散漫的小生產者，不知道全部資本主義工業，沒有鄉村中的勞動階級後備軍，就要停頓，不知道寬放城市的僱用勞動後，決不能不寬放鄉村裏的僱傭勞動，不知道『禁止』僱傭勞動，不是別的，正是走向社會主義去的步驟，所以這是小生產者的空話，表示出他們孤立無援沒有自覺的幼稚願望。

現在我們要轉到工農關係的根本問題了。

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運動，存在於俄國已廿餘年（倘從一八九六年的大罷工算起）。經過這個很長的時期，經過二次偉大的革命在全部俄國的政治歷史上，總是非常明顯地提出這樣的問題：工人階級領導農民前進往社會主義去呢，抑是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拖着農民向後使之和資本主義妥協呢？

社會民主黨中的機會主義派，常時遵照下面的大智大慧的公式來論斷：因為社會革命黨人是小資產者，所以我們應該拋棄他們小資產階級的烏託邦的社會主義的見解，而替資產階級去否認社會主義。馬克斯主義於是乎完美地爲斯脫魯維主義（公開的馬克斯主義）所代替了，孟塞維克主義於是一轉而成立憲民主黨的走狗，來『調和』農民和資產階級的關係了。采萊台里及斯柯皮立夫與邱爾諾夫及阿夫克生替也夫攜着手，忙着以『革命民主派』的名義，頒布立憲民主黨的反動的和地主式的訓令。

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永不放棄批評社會革命黨的小資產階級幻想；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在和他們聯合時，總是爲着反對立憲民主黨；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總是作堅決的鬥爭，使農民脫離立憲民主黨的影響；革命社會民主黨人，不是以自由主義的對於資本主義的妥協，而是以革命無產階級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來對抗小資產階級烏託邦的社會主義觀點。

現在，戰爭非常的加速了事變的進展，空前的加緊了資本主義的恐慌，而使人

民處於選擇出路的地位：死亡呢？抑是堅決走向社會主義去呢？——在現在這樣的時候，半自由主義的孟塞維克和革命無產階級的布爾塞維克主義中間的差別，格外分明地實際地成爲數千萬農民行動的問題。

孟塞維克對農民說：因爲我們現在還沒有成熟到社會主義的地步，所以和資本主義的統治協調起來罷。他們於是以籠統的「社會主義」的抽象問題，來代替具體的問題，具體問題，即在：如果不採取堅決走向社會主義去的辦法，能否醫治戰爭所引起的創傷？

因爲社會革命黨人是小資產階級的空想派，所以你們和資本主義協調起來罷——這就是孟塞維克對農民所說的話，他們和社會革命黨並肩齊進，幫助立憲民主黨的政府……。

社會革命黨，告訴農民說，他們反對一切對於資本家的妥協，他們從來不以爲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因之他們剛剛和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聯合，剛剛幫助資產階級政府；這真是自打嘴巴。社會革命黨，儘管草定怎樣空前絕後的

革命到極點的農民政綱，但他們總是把他藏諸高閣，不去實行，而用最空洞的口頭上的允許，來欺騙農民，使他們在實際上可以整幾個月的在聯合內閣中和立憲民主黨『妥協』。

社會革命黨大舉地，實際地，直接地，明白地叛賣了農民的利益，因之使情形大形改變。應該估計到這種改變。我們不應該按照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三年，及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舊方法，來作反社會革命黨的煽動。不能祇限於在理論上揭破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如『土地社會化』『平均使用土地』『禁止僱傭勞動』等等。

那時正當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或資產階級革命尙未完成時，所以整個任務，在於首先推進革命到推翻帝制的地步。

現在帝制已被推翻了。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結，因為俄羅斯已成爲民主共和國，已有立憲民主黨，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等所合組的政府。三年的戰爭，把我們推進了三十年，他在歐洲造成普遍的義務勞動，和強迫的企業的新迪加化，他

使最先進的國家，進到饑荒和空前破壞的地步，使他們不能不向社會主義走去。那時，一九〇五年，我們階級政策根本的路線是：祇有無產階級和農民能夠推翻帝制。這條路線是正確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更多一次加以證明。

現在我們階級政策的路線，却在：祇有無產階級，領導着貧農（我們政綱上稱爲半無產者），方能以民主的和平，結束戰爭，方能醫治戰爭的創傷，方能採取無條件地必需的不容或緩的走向社會主義去的辦法。

從此得到結論：反對社會革命黨的宣傳和煽動底焦點，應該轉到說明社會革命黨人叛賣農民利益的一點上。他們所代表的，不是貧農的羣衆，而是少數富裕農民。他們之領導農民，不是走向和工人聯合，而是走向和資本家聯合，即是走向服從資本家。他們爲着總長的高位肥缺，爲着和孟塞維克及立憲民主黨人聯合，所以把勞苦及被剝削羣衆的利益出賣了。

因戰爭而加速的歷史過程，前進得這麼遼遠，使舊的公式充滿了新的內容。「禁止僱傭勞動」，這句話，以前不過是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空話。但現時他在

實際生活中，就含有別的意義：千百萬貧苦的羣衆，在二百四十二個的指令中聲說他們要往前廢除僱傭勞動，但是他不知道怎樣去幹。我們知道怎樣去幹。我們知道，要做到這一步，祇有和工人相聯合，在工人領導之下，反對資本家，而不是和資本家『妥協』。

現在我們反對社會革命黨的宣傳和煽動底主要路線，我們向農民說話的主要路線，就應該變更到這樣。

農民同志，社會革命黨叛賣了你們。他叛賣了茅舍，而轉投於宮殿（倘不是皇帝的宮殿，那末，總是革命的特別是農民革命的最兇惡的敵人立憲民主黨所居的宮殿）。在一個政府內，和邱爾諾夫，帕雪洪諾夫，阿夫克生替也夫等，并肩而坐。

祇有革命的無產階級，祇有他的統一的先鋒，布爾塞維克黨方能在事實上執行敘述於二百四十二個指令上的貧農羣衆的政綱。因為革命的無產階級，不是以簡單的禁止僱傭工人的辦法，而是以唯一的正確道路，即以推翻資本主義的道路，去實實在在的廢除僱傭勞動。革命的無產階級，實實在在的沒收土地，農具，和技

術精良的農業企業，——總之就是實現農民所需要而社會革命黨所不能執行的那些改革。

工人向農民說話的主要路線，就應該變更到這樣：我們工人，能夠並且將要給你們以貧農羣衆所需要和尋覓的，而常時不知怎樣及何處去找的那些東西，我們工人，反對資本家，堅持自己的利益，但社會革命黨人和資本家聯合，却叛賣了這種利益。

我們可對讀者提起恩格斯在死前不久對於農民問題所說的話。恩格斯特別指出社會主義者不想掠奪小農，而祇要示以模範，給他們指出機器化的社會主義農業的優點。

戰爭現時使俄國在實際上遇到同樣的問題。農具很少。沒收農具，但不要把生產精良的農莊「分割」。

農民已經開始懂得這點。應該使他們了解。戰爭已使他們懂得，因為無處可得農具。應該留心農具。大的農村經濟，除了其他的節省外，還可節省工具上的勞

動。

農民要想保留小的經濟，平均分配土地，按期平分等等……讓他們這樣幹。沒有一個有理性的社會主義者，會因此而和貧農羣衆決裂。倘然地主土地被沒收，那麼就是說銀行的統治破產了，倘然農具被沒收，那麼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統治破壞了；以後在無產階級統治於中心，政權轉入無產階級手中的條件下，其餘的東西，自己會添上來，以成『模範力』所產生的結果，而為實際生活本身所證實。

基礎在於政權應歸無產階級。基礎解決以後，二百四十二個指令的政綱上所包含的一切重要的基本的切身問題，都可實現了。實際生活，將指示出，在他實現時，要有怎樣的形式上的變更。這是小事。我們不是死咬文字的人。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導。

我們並無此奢望，說馬克斯主義者，能夠知道走向社會主義去的道路上的一切具體情形。這是癡想。我們祇知道這條道路的方向，知道沿着這條道路前進的，有那些階級的力量；至於具體的實際情形，那麼祇有在千百萬羣衆起來爭鬥時，方能

在經驗上指示出來。

農民同志，相信工人呵，和資本家決裂呵！祇有和工人密切地相聯合，你們方能在事實上實現二百四十二個指令上的政綱。倘然和資本家聯合，處在社會革命黨領導之下，那麼你們永遠等不到你們政綱內所舉的堅決勇往的辦法，會有一條可以實現。

祇有與城市的工人聯合，而與資本主義作無情的鬥爭，你們方能開始實現二百四十二個指令上的政綱：那時全世界將幫助你們和我們，那時這個政綱的成功，方有保證（不是按照現在的公式，而是按照他的實質）。那時方是資本主義和僱傭奴隸制滅亡的時候。那時方才開始社會主義的統治，和平的統治，勞苦羣衆的統治。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第六號工人報）

致社會民主工黨(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書

事變迅速地簡直瞬息萬變地發展起來，所以這幾行文字，或許已經過時了。但雖然冒險，可是責之所在，不能不寫出下面的意見。

康尼洛夫的變亂，是政變中，非常出於意外的（在這個時候，在這種形勢之下是出於意外的），且簡直是絕頂急劇的轉變。

如任何急劇的轉變一樣，上述的轉變，要求我們重新審查和變更策略。我們，於任何重新的審查，應該極端小心謹慎，使之不致陷入無原則的臭泥潭中。

我深信，那些轉到祖國保衛派（如伏洛大耳斯基那樣）或轉到聯合社會革命黨幫助臨時政府（如有幾個布爾塞維克那樣）的那些人，已陷入無原則的臭泥潭了。他們行動，錯誤已極，真絲毫無原則。我們祇在政權轉到無產階級掌握中以後，在提議和平以後，在破裂祕密條約，破裂對於銀行的連繫以後，我們方能成爲保衛派，無論奪取利加或奪取彼得堡，都不能使我們成爲保衛派。在未達到上述情形之

前，我們總是主張無產階級革命，反對戰爭，而不是保衛派。

我們就是現在，也不應該幫助克倫斯基政府，這種幫助，是無原則的舉動。有人問，難道不和康尼洛夫搏戰嗎？是的，自然要的。但這兩個事件，不是一樣，中間大有界限；布爾塞維克倘超越這個界限，那麼就要陷入『妥協派』，而眩惑於政變的急流中。

我們要鬥爭，我們要和康尼洛夫鬥爭，但我們絕不幫助克倫斯基，而要揭破他的弱點。這是差別。這種差別，非常的精細，是重要到極點，並且是絕對不能忘記的。

在康尼洛夫暴動以後，我們策略上的變動何在？

變動就是在我們變更了和克倫斯基鬥爭的形式。我們對於克倫斯基的敵視，一絲一毫沒有減少；我們所說的反對他的話，一字也不收回，更不放棄推翻克倫斯基的任務，但我們說：應該估計時機，現在我們不起來推翻克倫斯基，現在我們用別種方法，去和他們鬥爭：即是向人民（和康尼洛夫作鬥爭的人民）解釋克倫斯基的

軟弱和動搖。這點我們以前也是做的，可是現在這點成爲最主要的了；變動就是在此。

其次的變動，即是在：加緊宣傳向克倫斯基提出特別的「部分要求」，這種宣傳，現在也成爲主要的了；這些要求如逮捕密留柯夫，武裝彼得堡工人，遣調克龍斯坦特，范包爾，海爾新福斯（芬蘭）等地的軍隊，到彼得堡來，解散國會。逮捕婁薦科，規定地主土地歸給農民的法律，實行工人對於麵包及工廠的管理等等。我們不但向克倫斯基，而且主要的不是向克倫斯基，提出這種要求，我們是應該向捲入反康尼洛夫爭鬥中的工農兵士，而且主要的是向着他們，提出上述要求。我們推動他們，更往前進，鼓勵他們提出拘捕那些擁護康尼洛夫的將軍和軍官底要求，勸導他們立刻提出土地轉給農民的要求，并使他們覺得逮捕婁薦科，密留柯夫，解散國會，封閉「言論」及其他資產階級報紙，加以審判等等的必要，特別應該推動左派社會革命黨到這邊來。

倘然以爲我們往後就脫離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那麼這是極大的錯誤。

不，我們恰恰是特別接近這個任務，我們不是筆直走去。而是由旁邊走去。此刻的宣傳，應該不用些直接反對克倫斯基的話，而用間接反對克倫斯基的話，即是：要求和康尼洛夫作積極的最積極的鬥爭。唯有這個戰爭的發展，能夠使我們當權，但在煽動上，應該少說這些話。（牢牢的記住，明天或許使我們當權，那時我們是絕不放手的）。據我意見，這點在致鼓動員的信上（而不是報章上），應該說明，應該把這點通告煽動員和宣傳員的隊伍，以及一般的黨員。什麼關係於保衛祖國，革命民主派統一革命戰綫，幫助臨時政府等等的空話，惟其是空話，所以應該對之作無情的爭鬥。『現在是幹的時候』這句話，你們，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先生們，早已誦得爛熟了。現在真是幹的時候，應該以革命方法，吸引羣衆，推進羣衆，煽動他們，來進行對康尼洛夫的戰爭（克倫斯基，却害怕羣衆，害怕人民），在對付德國人的戰爭中，現在也應該實實在在的幹去：即是在確定的條件上，立刻的無條件的作和平的提議。倘然這樣做，那麼或是可以獲得迅速的和平，或是可以把戰爭轉變為革命的戰爭，不然，什麼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永久是帝國主義

的傭僕。

在寫了這篇文章後，看到六期工人報，我不能不指出其中剛剛得到不約而同的符合。謹以至誠之心，歡迎其中特出的時評，以及密留金 (Milutin) 與伏洛夫爾斯基 (Volodarski) 的民報批評及文章。

(作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三十日，發表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的第二五〇號真理報)



論妥協

在政治上，因和別的政黨協商，而在幾個要求上讓步，或放棄自己一部分的要求，這種舉動，叫作妥協。

常人對於布爾塞維克的想像（謾罵布爾塞維克的報紙更對之加油調醋），總以為布爾塞維克永遠不和任何人作任何的妥協。

這種想像，是頌揚我們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的，因為他指示出來，就是敵人也不得不承認我們對於社會主義和革命的根本原則之忠實。雖是如此，總是應該說實話：這種想像，是不合真理的。恩格斯很對的，在批評巴古賓派的共產主義者的宣言（一八七三年）時，譏笑他們「毫不妥協」的聲明。他說這是空話，因為環境，常是不可避免的要逼迫鬥爭的政黨，採取妥協；所以永遠拒絕「分次收債」，是荒謬絕倫的。真是革命政黨的责任，不在提出不可能的拒絕任何妥協，而在能經過不可避免的各種妥協，盡忠於自己的主張，自己的階級，自己的革命任務，以及自己準

備革命訓練民衆以進到革命勝利的那種事業。

舉例看。參加第三屆和第四屆的國會，是一種妥協，是暫時放棄革命的要求。但這完全是無可奈何的妥協，因為那時階級力量的對比，在一定的時期內，不能使我們有羣衆的革命鬥爭，爲長期的準備這種鬥爭起見，我們應該能夠在這種「牲畜厰園」的內部工作。布爾塞維克黨對於這個問題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這點已經由歷史證明了。

現在所要講的，是不是被迫的，而是自願的妥協。

我們的黨，是如任何其他政黨一樣，要爲自己獲得政治上的統治，我們的目的，是革命無產階級的專政。半年的革命，特別顯明地，有力地，動人地說明，爲着目下革命的利益，此種要求（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避免的，因爲不然，什麼民主的和平，土地之轉給農民，完全的自由（完全的民主共和國），都是沒有希望的。我們革命中半年以來的時局的變化，階級和政黨的爭鬥，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六月九日至十日，十八日至十九日，七月三日至五日，八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

日等等的恐慌，都證明了并且指示出這點。

現在俄國革命已經達到這樣急劇這樣奇特的轉變，使我們可以用政黨的資格，向我們的最親近的敵人，居「領導地位」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而不是我們直接的主要的階級敵人——資產階級），提出自願的妥協。祇算例外，祇是因為特別的情形（這種情形，自然是存在得非常短促的），我們方能對這些政黨提出妥協，并且我以為，這是我們所應該做的。

在我們方面，妥協即在於我們回復到七月以前的要求，「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政府，對蘇維埃負責」。

現在，祇在現在，或許總共僅在幾天或一二星期的時間內，方能和平地建立這種政府而加以鞏固。他或許（絕大的或許）能夠保證全部俄國革命的和平前進，保證世界革命運動更有機會向和平及社會主義勝利的路上大踏步走去。

祇是爲着這樣的革命和平的發展的道路（他的可能，在歷史上是非常稀有的；是非常有價值的，簡直是稀有到極點的），祇是爲着他，布爾塞維克，世界革命的

擁護者，革命方法的擁護者，方能進入這種妥協，並且據我的意見，這是應該的。

妥協即在於：不企圖參加政府的布爾塞維克（在無產階級及貧農專政的條件未真正實現以前，國際主義者之參加政府，是不可能的），放棄立刻提出「政權轉給無產階級及貧農」的要求，放棄爲這些要求而鬥爭的革命方法。其交換條件是：煽動的完全自由與立憲會議的召集，其召集期限不准再有新的延宕，而甚至要在最短期間舉行，這些條件，非常明瞭，並且對於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早已不是新的了。

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在轉爲統治的同盟以後（假使妥協實現）或許就同意於組織完全對蘇維埃負責而且僅僅對蘇維埃負責的政府，把全部的以及各地的政權，轉交蘇維埃。這或許就成爲「新的」條件。我想，布爾塞維克不會再提出其他的條件，因他們設想：實際上煽動的完全自由，以及組織蘇維埃（改選蘇維埃）與蘇維埃執行工作時新的民主主義的實現，自然而然的可以保證革命和平的前進，保證蘇維埃內部政黨爭鬥的和平的消滅。

或許，這已經是不可能的了？或許。但倘然尚有百分之一的機會，那麼實現這種可能的企圖，也是值得加以實行的。

「協商」中的雙方，一方面布爾塞維克，他方面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同盟，可以從這個妥協中，得到什麼好處呢，倘然雙方不能獲得什麼好處，那麼這種妥協，顯然是不可能的，那時就用不着來說他。這個妥協，現在（在七八兩月以後；這兩個月等於「和平」及平靜時代的二十年）無論怎樣困難，但我以為總有一個很小的機會，可以希望他的實現，這個機會之所以能夠產生，即在於社會革命黨及孟塞維克決議不和立憲民主黨共同加入政府。

布爾塞維克，從這個妥協上得到這種好處，就是他們可以自由宣傳自己意見，並且在真正的完全民主主義的條件下，可以在蘇維埃內部獲得影響。口頭上，現在大家承認布爾塞維克可以有這樣的自由。但實際上，在資產階級政府，或由資產階級參加的政府，總之即是在非蘇維埃的政府的統治之下，這種自由，是不可能的。在蘇維埃政府的統治之下，這種自由，是可能的（我們不說完全得到保證，而

總是可能的)。在現在這樣困難的時候，爲着這種可能，應該和現在蘇維埃中的多數妥協。在真正民權的統治之下，我們絲毫不怕什麼，因爲實際生活，是有利於我們的，就是敵視我們的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內部派別的變化，也證實我們意見的真確。

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所得的好處，是在於他們能夠依靠蘇維埃中顯然的多數，擔保自己可以「和平地」利用蘇維埃的大多數，而立刻可以得到實現他們的「同盟」綱領的全部的可能。

自然，這個同盟，一方面正因他是同盟，所以不一致，他方面因小資產階級，不像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那樣一致，所以從這同盟中，就會分歧出二種聲音來：

一種聲音，會這樣說：我們絕對不能和布爾塞維克和革命的無產階級同道。因爲他們總是作分外的要求，並且以巧言惑衆的方法，引誘貧農羣衆。他們要求和平，要求與協約國決裂。這是不可能的。我們還是和資產階級，更親近些，忠實些，我們和他（資產階級），不是永遠分裂，而是僅僅因爲康尼洛夫的事件，而暫

時吵嘴。吵嘴過了，現在和他好起來罷。布爾塞維克對於我們，總是絲毫不「讓」的，他們的暴動企圖，總是要和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一樣的流於失敗。

但是另外一種聲音，將說道：引證巴黎公社，是非常皮相和非常愚笨的。第一，因為布爾塞維克，從一八七一年的事變中，總已學到了多少教訓，他們總不會看着銀行在旁而不把他奪到手中，他們決不會放棄對於凡爾賽的進攻，如果這樣做去，那末，就是巴黎公社，也可以獲勝。此外巴黎公社給與人民的利益，決沒有布爾塞維克（倘然奪取了政權）所立刻能夠給與人民的那麼多：例如，土地歸於農民，立刻提議和平，對於生產的真正監督，和烏克蘭人，芬蘭人等等締結誠意的和平等等。庸俗點講，布爾塞維克手中的骨牌，比較巴黎公社有的多十倍。第二，無論如何，公社總是要引起繁重的國內戰爭的，因之他就要長時期阻礙和平的文化的發展，並且促成各種麥克麥公（蹂躪巴黎公社的將軍）及康尼洛夫輩的軍事行動和詭計……此種行動，是危害我們全部資產階級社會的。冒公社之險，是否合理呢？

假使我們不奪取政權，假使政局還是處在五月六號至八月三十一號中間的那種

困苦情形下，那末，公社在俄國是不可避免的。每個革命的工人和兵士，不可避免的將紀念公社，信仰公社，而不可避免的企圖加以實現，他們將要這樣的辯論道：人民不絕地死亡，戰爭，饑荒，經濟破壞，愈趨愈烈，祇有公社能夠挽救。我們可以死可以全體死，但總想要實現公社。工人腦中，不可避免的將有這種思想，現在要戰勝公社，沒有像一八七一年時那樣容易了。俄國公社在全世界上的聯盟者，將比一八七一年強百倍——冒公社之險是否合理的呢？有人說，布爾塞維克在妥協上，實在沒有給我們以絲毫利益，對於這種意見，我是不能同意的。因為在文明的國家裏，文明的總長們在戰爭時，非常重視對於無產階級的任何妥協，甚至非常重視最小的妥協。他們非常非常的重視。他們是專講實際的人，他們是真正的總長。不管怎樣壓迫，不管布爾塞維克報章怎樣柔弱，可是布爾塞維克總是很快的強大起來。冒公社之險，是否合理的呢？

我們可以擔保有多數，等到貧農覺悟，還不知有多少時候，這個時期儘夠我們統治了。我不相信在農民的國家裏，大多數會相信極左派。在真正民主共和國家

裏，顯然反對大多數人民的暴動，是不可能的。第二種聲音，就會說上面這些話。

其實，還可以從馬爾托夫，司必烈頓諾瓦 (Spiridonova) 的信徒們的隊伍中，找出第三種聲音，他說道：『同志』，你們兩個，評論公社及其可能時，毫不搖動地採取反對者的態度，這是可以使我們發氣的。你們兩個，雖然採取不同的形式但都是站在蹂躪公社的那些人的一方面。我不去爲公社宣傳，不能像每個布爾塞維克一樣，預先允許在公社的隊伍中搏戰，可是我總不能不說：倘然不管我怎樣阻當，公社終究要爆發起來的話。那麼我還是幫助公社的擁護者，而不是幫助公社的反對者。

『同盟』中間意見的分歧，是極其大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因爲在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中，有不可勝數的派別，從完全的總長先生，完全的大有產者起，直到完全可以轉到無產階級地位的半窮人爲止。在每個時期，這種意見的分歧怎樣，他的結果如何，誰也不知道。

上面文字是九月一號（星期五）寫的，因爲偶然的原因（歷史的事變，說明在

克倫斯基之下，不是每個布爾塞維克，都能享受擇居的自由的），這篇文字在這天沒有送到編輯部裏。看了星期六星期日及今日的報紙以後，我對自己說道：妥協的提議，已經太遲了。革命還可以和平發展的那幾天，也已經過去了。真的，據各方看來，是已經過去了。無論如何，克倫斯基總是已經退出了社會革命黨，離開了社會革命黨人，并且因社會革命黨之無力，不需社會革命黨的幫助，而在資產階級援助之下，鞏固起來……真的，和平發展的道路偶然成爲可能的那幾天，已經一去不返了。祇有把這篇短文，送到編輯部裏去，請求加上『過去的思想』的題目……或許有時，閱讀過時的思想，也不是沒有興味的。

（作於九月一日至三日，登載一九一七年九月八日第三號工人之路報上）

布爾塞維克必須奪取政權

——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塞維克）莫斯科委員會彼得格勒委員會暨中央委員會書——

布爾塞維克既然在兩個首都（八月三十一日彼得格勒蘇維埃與九月六日莫斯科蘇維埃第一次採取了布爾塞維克的一般的政治決議案）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中，獲得了大多數，他們就已經能夠而且必須把國家政權，奪到自己手中。他們能夠怎樣做，因為兩個首都中大多數活動的民衆革命份子，已經很能夠吸引羣衆，征服而且撲滅敵視份子的反抗，征取而且握住政權。因為布爾塞維克提議立刻實現民主的和平，立刻把土地給予農民，立刻恢復被克倫斯基所摧殘了的自由和民治機關，所以布爾塞維克就能建設世界上無人能夠推倒的政府。

大多數民衆是擁護我們的。從五月六日至八月三十日，以至於九月十二日的這段冗長而艱難的過程，已經把這點證明給我們看了：我們在首都蘇維埃中獲得了大多數，這是民衆發展到我們方面（布爾塞維克）來的結果。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派

底搖動，與他們羣衆中的國際主義派底強大，都證實這一點。

民治會議不是代表大多數革命的民衆的，他所代表的僅僅是那些妥協的小資產階級上層份子。我們不要爲這個會議上的投票數目所欺騙，這種投票，是毫無意義的。我們可拿彼得格勒或莫斯科的市議會底選舉與蘇維埃底選舉來比較一下，我們可拿莫斯科的選舉和八月十二日的罷工來比較一下；這些才是大多數引導羣衆的革命份子的實在數量。

民治會議欺騙了農民羣衆，他既不給予他們以土地，又不實現和平。

唯有布爾塞維克的政府，才能滿足農民羣衆的要求。爲什麼布爾塞維克必須在目前下立刻奪取政權呢？因爲如果在最近的將來，彼得格勒爲敵人所陷，那麼我們的機會將更加艱難到百倍（當時在里加有德國人底進攻，後來彼得格勒亦在恐怖中了）。

在克倫斯基及其黨羽所領導的軍隊之下，我們是沒有法子使彼得格勒不陷落的。

我們不能『等待』立憲會議；因為克倫斯基及其同伴，常常能夠以放棄彼得格勒的方法，來破壞這個會議底召集。唯有我們的黨，掌握了政權以後，才能担保立憲會議召集；我們的黨掌握政權以後，必定指出別黨延遲召集該會的罪狀，證明這種罪狀是實在的。

我們應該而且可以防止英，德兩帝國主義間單獨講和的企圖，祇要我們行動的快（註：法國的軍事當局，也同樣的企圖用犧牲俄國的方法來謀局部的和平）。

民衆已經厭倦於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底動搖。唯有我們在首都中勝利，方能吸引農民羣衆到我們這方面來。

問題並不是在狹義地指出暴動的『日期』或『時間』。確實的日期與時間，能讓那般與工人兵士及羣衆接觸的人們之公意來決定。

問題在這裏，在現在的民治會議中，我們的黨，實際上有他自己底會議，我黨的會議，無論願意與否，總應該決定革命底運命。

問題是在我們必須使我們的黨，明白認識目前的任務，目前任務，即在我們必

須在彼得格勒與莫斯科實行武裝暴動（在隣近一帶也須如此）奪取政權。推翻現在政府。我們必須審慎考慮，如何可以不在報章上宣佈，而宣傳這種任務。大家必須記住，並且深深地思考馬克思關於暴動的話：「暴動是一種藝術……」

布爾塞維克黨人如果期待「形式」上的大多數，這就太傻了；從來沒有一次革命，期待這種形勢上的多數。須知克倫斯基和同黨們，並不期待，而在準備放棄彼得格勒。正是那種可憐的民治會議的動搖，應該打破並且正在打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的忍耐心。如果他們現在不起來奪取政權，歷史上是不會饒恕我們的。

我們是不是沒有機關呢？我們一種機關：就是蘇維埃和其他民治的組織。尤其是現在，在英德間局部和平將實現的前夜，國際的形勢正是有利於我們的。正當這個時候，來向民衆提出和平，我們就能勝利。

現在同時在莫斯科與彼得格勒奪取政權（在何處開始，不是重要的問題，也許可以在莫斯科先發動）我們是無條件的無疑的可以得到勝利的。

馬克思主義與暴動

——致俄國社會民主黨（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書（書於民治會議時期）——

『社會主義』的黨派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最可惡的，而且最流行的方式之一，便是一種機會主義者的謊語，說準備暴動，是『勃蘭基主義』。

機會主義派的首領倍恩思坦（Bernstein）以誣馬克思主義為『勃蘭基主義』而獲得了可恥的大名；現在高呼『勃蘭基主義』的機會主義者，也沒有一人能替倍恩思坦的枯燥的觀念，添上多少新的內容。

他們因為馬克思主義者把暴動當做藝術看待，所以誣蔑他們是勃蘭基主義者，——天下有比這個更可恥的抹煞真理的事麼？馬克思說暴動是『藝術』，他早已自己非常精確而肯定地解釋過了；他說我們必須將暴動看作像藝術一樣，我們必須獲得第一次勝利以後，利用敵人的秩序紊亂，從一個勝利，轉入別一個勝利，一刻不停地向敵進攻。

如果要使暴動獲得完全勝利，那末決不可以靠着一種祕密的結合，或是一個政黨，而必須依靠在一個先進的階級之上。這是第一點。暴動必須依靠着全體民衆革命力量之高漲，這是第二點。暴動必須在革命高漲到極頂的轉變時期，爆發起來，這就是說，必須在民衆的先鋒隊底活動力量達到了最大限度的時候，也就是說當敵人中間和那種軟弱猶疑的革命的友軍中間，發生最厲害的動搖的那個時候，暴動才可以爆發起來。這是第三點。根據這三個條件，馬克思主義對於暴動問題的立場，和勃爾基主義，大不相同。

但是如果當這些條件具備時，而還不把暴動當作一種藝術看，那末這便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革命。

爲什麼現在這個時候，剛是許多客觀事實，逼迫我黨承認暴動是目下的切身的任務，而又把暴動看作一種藝術，爲要證明這點起見，我們最好是來應用一種比較的方法，把七月三四日那幾天情形來與九月末時的情形比較一下。

對於七月三，四日的那幾天，我們很正當地可以這樣推論：在那時奪取政權，

比較很是正確，因為即使我們不奪取政權，我們的敵人，也要誣蔑我們造反謀亂，以對付叛徒的方法，對付我們。但是那時我們不能夠從這個推論當中，得出必須奪取政權的結論，須知暴動勝利底客觀條件，那時還沒有具備。

(一)當時在我們這方面，還沒有可作革命的先鋒隊的那個階級。

當時我們在兩個首都的工人和兵士裏還沒有獲得多數，而現在我們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蘇維埃內部，已經有了這樣的多數了，這個多數，祇是七八兩月的事件，『鎮壓』布爾塞維克事件和康尼洛夫的叛變底經驗所造成的。

(二)當時還沒有全體民衆的革命高潮，而現在康尼洛夫事變之後，這是已經有的了。各省所發生的事件，和許多地方的蘇維埃之奪取政權，都把這事證實了。

(三)在那時候，我們的敵人隊伍中間和不墜定的小資產階級中間，還沒有那種普遍的政治的『動搖』。現在那種動搖，已經達到極點了！我們的主要敵人，協約國的和世界的帝國主義（協約國是世界帝國主義之主腦）——現在正搖擺於求得最後

勝利的戰爭與反對俄國的局部和平二者之間。我們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呢，他們已經很明顯地丟去了多數的民衆，他們已經在那裏極厲害地動搖了。我們拒絕與立憲民主黨人聯合。

(四)因此，如果在七月三、四兩日，發生暴動，那便是一個錯誤，因為那時，我們在體力上政治上都是不能保持我們的政權的。在體力上所以不能保持政權，是因為那時彼得格勒雖然暫時落在我們的掌握中，可是，我們的工人和兵士，不會因奪取彼得格勒而甘心情願地奮鬥，而犧牲生命；當時他們還沒像現在這樣的憤激，他們當時對於克倫斯基以及采萊台理邱爾諾夫等的怨恨憤怒，還沒像現在這樣的沸騰，當時在克倫斯基政府（藉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派之助）殘酷壓迫布爾塞維克的情形之下，我們還沒有飽經鍛煉的工作人才。

在政治方面，我們在七月三、四日那個時候，也不能夠保持政權，因為在康尼洛夫的叛變之前，政府的軍隊和各省的力量，能夠而且已經開始向彼得格勒進取。

現在的形勢，就完全不同了。

在我們這方面，已經有了革命先鋒的階級（即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羣衆，已經有了能夠領導羣衆的先鋒隊的大多數羣衆。

現在我們這方面已經有了大多數民衆；因為邱爾諾夫底離職，是許多憑證中最顯明的最清楚的一個，他證明農民從社會革命黨的同盟的那方面，不能得到土地，（即使從社會革命本身方面，農民也是得不到土地的）可是革命的全民性質的要點，就在這上面。

現在我們的黨，處於優越的地位，有全部帝國主義和整個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同盟極端動搖的狀況之下，我們底黨，能夠堅決地知道自己的道路。

我們穩當地可得到勝利，因為民衆差不多近於絕望的地步，我們給全體民衆指示出「康尼洛夫事變時」我們領導的意義，這次事變以後，我們向同盟派，提議妥協，可是他們終於繼續不斷的躊躇動搖，而拒絕我們的提議。到了現在，唯有我們，給全體民衆指示出正確出路。

我們如果現在還以為我們的妥協的提議，「尚未」被拒，以為「民治會議」還

可以接受這個提議，那麼這便是一個嚴重的錯誤。這個提議，是由一個政黨向其他政黨提出的，不是這樣，便沒有別的方式可以提出這個提議。但是其他這些政黨，已經拒絕了這個提議。所謂民治會議，僅僅是一個會議而已，實際上什麼東西都沒有。我們千萬不能忘記，民治會議裏面，並沒有大多數革命民衆的代表，並沒有憤激的最窮苦的農民的代表，他是一個少數人民的會議。我們決不能忘記這個明顯的真理。如果我們以對付國會的態度，來對付這個民治會議，那末，我們便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我們便陷於極無希望的國會的狂疾之中了，因為民治會議，即使宣布自己爲國會，即使宣布自己爲革命的最高國會，他也是解決不了什麼問題的，最高的決議權，不是靠着民治會議，而是靠着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區域。

所以暴動勝利的客觀條件，都已經具備了。我們可以有許多地位上的優勢，祇要我們在暴動中獲得勝利，消滅那種摧殘民衆的動搖，消滅這個世界上最壞的東西（指動搖），祇要我們在暴動中，獲得勝利，破壞不利於革命的局部和平的鬼計，而公開建議更完美更公正的而且有利於我們革命的和平。

最後，唯有我們的黨，獲得勝利以後，才能救出彼得格勒。因為如果我們和平的提議，被敵人所拒絕，如果我們連休戰都不能得到，那末我們就會變成『保衛派』，我們就會領導主戰的黨派，那時我們就會變成最主戰的政黨，我們就將採取真正革命的方法，來進行這個戰爭。我們將要奪取資本家所有的一切麵包和鞋子。我們祇給他們（資本家）以小塊的麵包，我們祇給他們以木屐草履，我們將把所有的麵包和鞋履，都拿去送到前線上去。

我們在那時能夠固守彼得格勒。

我們在現時還依然擁有極豐富的，可以供給『真正革命戰爭用的物質上和文化上的財源，我們有九成的把握，相信德國至少會同意與我們停戰。須知在目下，能夠達到停戰這一地步，就無意於戰勝了『全世界』。

我們為挽救革命起見，為挽救國家脫出雙方同盟國的帝國主義者底『局部』瓜分起見，我們深信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的暴動，是絕對的必要。所以我們現在第一，必須在民治會議上，使我們底策略適應於正在起來的暴動底條件。第二，我們

必須證明，我們之接收馬克思的『必須把暴動當作一種藝術』的教訓，並不是僅僅在口頭上。

在民治會議中，我們必需立即鞏固我們的布爾塞維克黨團，我們不要計較數量，我們亦不要怕動搖份子，跑到動搖份子的營壘中去；他們處在『那邊』，比較處在這邊堅決的熱烈的戰士們的營壘中，更有利於革命。

我們必須做一篇簡短的布爾塞維克的宣言，在這篇宣言當中，我們要非常尖刻地指出冗長的演講，以及一般『演講』之不合時機，說明挽救革命的直接行動之必要，與資產階級完全脫離關係之絕對的必要，說明必須完全撤換現政府中的全部人員，必須與準備『局部』瓜分俄國的英、法帝國主義者，完全破裂，最後必須指出整個政權應該立刻轉入革命無產階級所引導的革命民主派手中。（九月廿二日梁尙諾夫 Krisanov 曾經代表布爾塞維克派根據這個意思，在民治會議中，發表了一次宣言。）

在這個宣言當中，我們必定要簡單，而且強有力地做出這個結論，以和我們政

綱草案相呼應：給人民以和平，給農民以土地，沒收資本家以卑鄙醜惡手段得來的利潤，制止資本家任意破壞生產。

這個宣言，能夠愈簡單愈銳利就愈妙。在這宣言中，還須指出下面的兩點，民衆因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派底動搖和躊躇，已經受盡了痛苦，而且達到了絕望的地步，我們必須堅決、果斷，和這兩個政黨破裂，因為他們背叛了革命。

我們在宣言中所必須提及的第二點：我們要立刻提議沒有併吞的和平，要與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和其他一切帝國主義者，實行斷絕關係，我們這樣立刻可以達到停戰，或是可以使全體革命的無產階級，轉過來保衛自己，並且在全體革命的民主派，在革命無產階級底領導之下，進行真正公平而革命的戰爭。

我們讀了這個宣言後，我們就要求不講廢話，不作空洞的決議案，而決定實際行動，以後我們就應該動員我們整個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向各工廠，各兵營中去活動，那些地方，正是挽救革命的源泉，也是民治會議的推動者。

在那些地方，我們應該在許多熱烈奮激演講中，說明我們的政綱，並且提出這

樣的問題，或是完全接收這個政綱，或實行暴動。折衷的路，是沒有的。等待是不許可的。革命現在正在危急中呢。

我們提出這樣的一問題：『把我們的組織集中到工廠和兵營中去』，以後，我們就能夠很正確地估定暴動爆發的時期。他們如果以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來進行暴動，換言之就是把暴動當作一種藝術來進行，那末我們應該在這個時候，不失分秒地組織暴動隊伍底總參謀部，分配我們的力量，把我們可靠的軍隊，集中到各個最重要的地點上去，包圍亞歷山大戲院 (Aleksandrinka) 佔領彼得派夫洛夫砲台 (Petrovaylevka) 逮捕總參謀部和政府人員，派我們的敢死隊去進攻士官隊 (junker) 和『野蟹的騎兵師』(這是廉尼洛夫的哥薩克騎兵軍中之一師) 不讓敵人衝到城市中心來，我們必須動員武裝的工人，號召他們作拚命的最後的決戰，同時就須立刻佔領中央電報局和電話局，把我們暴動者的總參謀部，設置在中央電話局裏，使之可以和所有的工廠，所有的軍營，以及所有的暴動鬥爭的地點等等，都用電話連絡起來。

自然這些都不過舉其大概而已；這些不過說明在現在這個時期當中，如果不把暴動當作一種藝術來進行，那麼就是不忠於馬克思主義，就是不忠於革命！

（作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三—十四日。）



革命的任務

俄羅斯是小資產階級性的國家。極大多數的人民，屬於這個階級。小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中間的動搖，是不可避免的。祇有在他和無產階級聯合時，革命事業的勝利（和平、自由、勞苦羣衆獲得土地等事業），方能輕易地、和平地、迅速地、安靖地得有保障。

我們革命的進程，在實際上把這種動搖指示給我們看。我們對於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決不會發生什麼幻想，我們將堅決地站在自己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上。貧農的窮困，戰爭的慘狀，饑荒的痛苦——這些都逐漸更鮮明地給羣衆指示出無產階級路線的正確和幫助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必要。

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聯盟」，和他「協商」「平安」地等待立憲會議的「很快」召集，小資產階級的這些希望，都被革命的進程，無情地，嚴酷地，決絕地，打破了。康尼洛夫之變，是最後的嚴酷的教訓（大規模的）而成爲千百其他小教訓

的補充，這些教訓，就是：各地資本家和地主是欺騙農民的，軍官是欺騙兵士的等等。

軍隊，農民中間的不滿，忿怒，和激昂，增長起來。口上允許，而絲毫不去實行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同盟，激怒羣衆，張開他們的眼睛，推動他們到暴動上面去。

在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內部，左派發展起來（社會革命黨中，有司必烈頓諾瓦等，孟塞維克黨中有馬爾託夫等），左派在這些黨的「委員會」「代表大會」中已佔百分之四十。在下層，在無產階級和農民尤其是貧農中，大多數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都是「左派」的。

康尼洛夫之變，教訓了民衆，康尼洛夫之變，已經給了許多教訓，不知道蘇維埃現在能否脫離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首領的羈絆而保證革命的和平的發展，或是他（蘇維埃）還是躑躅舊地而使無產階級的暴動成爲不可免。

這點不能知道。

我們的責任是，盡力幫助着去保證革命和平發展的「最後」的一個機會，幫助方法，即在於詳述我們的黨綱，說明他的普遍全國的性質，指出他是適合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

下面文字，就是敘述這個政綱的試驗。

我們帶着這政綱，更深入地到下層中去，到羣衆職員、工人、農民中去，非但到自己的羣衆中，并且還特別要到社會革命黨的、非黨的、不明白的羣衆中去。要努力提高他們的覺悟力，使之能夠自己決斷，能夠提出自己的決議案，能夠遣送自己的代表到討論會，蘇維埃及政府中去，如果這樣，那麼無論討論會的結果怎樣，我們的工作總是不能落空的。那時，這個政綱，不但適用於討論會，并且還適用於立憲會議的選舉，以及其一般的政治行動。

實際生活指示布爾塞維克政綱及策略的正確。從四月二十日至康尼洛夫之變，時間雖這樣短，可是其中的閱歷，却是多極了。

羣衆的經驗，被壓迫階級的經驗，在這個短時期內，使他們得到無限的教訓，

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首領，已經完全和羣衆脫離了。這些教訓祇有在具體的政綱上（當他的討論，可以達到羣衆時），方能正確地表現出來。

和資本家妥協是自趨滅亡

（一）如果讓資產階級代表（雖然數目不多）讓那些顯然的康尼洛夫派，如阿萊克薛也夫（Alexiev）克立姆包夫斯基（Klimovskiy）格拉替翁（Gratignon）加加林（Gagarin）等，或是讓那些表示完全無力對付資產階級，表示能夠仿效拿破侖而橫行霸道的人（克倫斯基等），留於政權之上——那麼這就等於大開門戶，一方面引入饑荒，和不可避免的經濟危機，這種危機，資本家正在故意加以促進和加重；他方面，引入軍事上的巨災，因為軍隊仇恨戰事，不能熱烈地參加帝國主義戰爭。此外留在政權上的康尼洛夫派的將軍，將無疑地故意開放戰線給德國人進來，像他們在加立利亞及利加所幹的一樣。要防止這些事件，祇有根據下述的基礎，組織新的政府。經過四月二十日以來所發生的事變以後，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對於資產階級

的任何妥協？不但是錯誤！而且直接是叛賣人民和革命。

政權歸蘇維埃

(二)全部政 應該根據一定政綱，根據向蘇維埃完全負責的原則，完全轉給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代表。應該立刻舉行蘇維埃的改選，以估計最近的特別富於革命內容的幾星期以來底人民經驗，并改去幾處地方尚未改正的顯然不公平的現象（比例的不均，選舉的不平等）。

在那些以民主主義方法選舉出來的機關尚未存在的地方，以及在軍隊中，全部政權，都應該完全轉與地方蘇維埃所選舉的代表，和其他選舉出來的機關（祇有選舉出來的機關才行）。

應該在國家全力的幫助之下，無條件地，并且到處實現工人及革命軍隊的武裝（此種軍隊在實際上已經表現出能夠鎮壓康尼洛夫派）。

給人民以和平

(三)蘇維埃政府，應該立刻同全體交戰人民（即是同時向他們政府及工農羣衆）提議在民主的條件上，立刻訂立總和平，同時應該立刻說定休戰時期（就是三個月也好）。

民主的和平之主要條件，是放棄併吞土地，這並不是說，列強都恢復他們所失去的東西（這是不正確的），而是說（這是唯一正確的意義），任何民族，無論在歐洲也好，在殖民地也好，都可獲得自由，並且自己可以決定組織單獨國家或加入任何其他國家的問題。

蘇維埃政府，提議和平條件以後，自己應該立刻在實際上加以執行；即是公佈并破裂纏縛於我們身上的祕密條約，這些條約爲沙皇所締訂，他們允許俄國資本家剝削土耳其，奧大利等。再次，我們應該立刻滿足烏克蘭人及芬蘭人的要求，擔保他們以及俄國國內其他的民族，有完全的自由，直至有分立的自由；對於全部阿美尼亞也應該如此，應該退出阿美尼亞以及我們所佔據的土耳其領土。

資本家自然不會善意的接收這些條件，在各國民衆中，將遇到這樣巨大的同情

心，引起全世界歷史上這樣偉大的熱情的爆發，引起他們對於掠奪戰爭的延宕，發生這樣普遍的憤怒，使我們極有希望地可以立刻獲得停戰及開始和平談判的允許。工人的反對戰爭的革命，不可阻遏的到處發展起來，不是口頭上空講和平（帝國主義政府，包括克倫斯基的政府，都久已用這些空話，來欺騙工人農民），而是和資本家破裂，提議和平，方能推進這個革命。

倘然實現了那條最少可能性的道路，就是說，倘然交戰國中，沒有一國接受休戰的條件，那時在我們方面看來，戰爭是無可奈何的，真正公平的自衛的戰爭了。祇要無產階級和貧農覺悟這點，俄國已經能夠在軍事上比較敵人強得多倍，特別是在和掠奪人民的資本家，完全決裂以後；此外更不要說，在我們方面，這個戰爭，將不是口頭上的而是事實上的聯合全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的戰爭。

特別應該警告人民，不要相信資本家的言論，這種言論，有時能嚇倒最膽小的俗人以及市井庸夫，這種言論即是：倘然我們和英國及其他國家資本家破裂現在的掠奪同盟，那麼他們可給俄國革命以極大的打擊。這種言論，通身都是謊言，因為

協約國的財政的幫助，「祇使銀行家發財」，他對俄國工農的「幫助」正好像絞索對於死犯的幫助一樣。俄國儘夠麵包、煤、煤油、和鐵等等，現在祇要驅逐掠奪人民的地主和資本家，使這些生產品可以有正確的分配。再次，講到俄國的現在的同盟者有和俄國發生戰爭的可能的問題。如果有人以為法國人，意大利人，能夠聯合自己軍隊來進攻提議公正和平的俄國，那麼這種假定顯然是荒謬的；即使英，美，日等國向俄國宣戰（這些國家，倘使這樣做，那麼他們本身中間的困難定要達到極點，因為這個戰爭，將使羣衆非常不滿而且在這些國家的資本家中間，爲着分割亞洲，特別是爲着掠奪中國，也存在着物質利益上的衝突），他們所能引起的損失和災難，也不及俄國對德，奧，土耳其等國的戰爭所引起的百分之一。

土地歸勞苦羣衆

（四）蘇維埃政府，應該立刻宣佈毫無報償地取消地主的土地私有權，而把這些土地轉交給農民委員會管理，直至立憲會議規定解決辦法爲止。此外還應該把地

主的農具，轉交給這些農民委員會管理，使貧農可以免費的并且無條件地首先應用。

大部份農民，在其大會的決議上和各地數百個指令上（這可以從農民代表蘇維埃新聞報所登載的二百四十二個指令的彙錄上看出來）所要求的那些辦法，是無條件地急不容緩地，必需加以實行的。「混合政府」，延宕不決，因之更使農民受到無限的困苦，往後再絕對不許有此種延宕。

任何延宕這些辦法的政府，都應該承認是「反人民」的政府，應該由工農的暴動，來加以推翻和征服。反過來說祇有實現這些辦法的政府，才是人民的政府。

對於饑荒及經濟破壞的鬥爭

（五）蘇維埃政府，應該立刻在全國實施工人對於生產及消費的監督。如果不這樣做，那麼五月六日以來的經驗，已經指示出什麼口頭上的改良的允許及改良的企圖，都是沒有效力的；饑荒和空前的大浩劫，將一星期一星期的更加迫近全國。

應該立刻把銀行國有，國有保險事業以及重要工業部門（煤油，石煤，鋼鐵，糖業等等）以外，必須無條件地廢除商務上的祕密，設立工農對於極少數資本家的嚴格的監察，這些資本家，吞佔應交的款項，并且隱藏報告，和逃避加於他們利潤及財產的公平的稅務。

這些辦法，絲毫沒有損害中農，加薩克，及小手工業者等的財產，無條件地是大家平均擔當戰爭重負的公平辦法，是和饑荒鬥爭的急切的辦法。

祇有制止資本家們的劫掠，制止他們故意停業，方能提高勞動生產力，建立普遍的義務勞動，正確地以工業交換麵包，而把富翁隱藏的數十萬萬的紙幣收歸國庫。

如果不採取這些辦法，那麼就不能無報償地廢除地主的土地私有權，因大部分的地主土地，抵押於銀行中，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是相互錯綜而不能分裂的。

全俄工兵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經濟部最近決議（第一五二號工人報），不但承認政府所取的辦法的有害（如提高麵包價格，使地主及富農發財），不但承認

政府所設的調劑經濟生活的中央機關全是尸位素餐的事實，並且還承認這個政府之破壞法律。當權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這種承認，不過更多一次的指示出和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底罪惡。

對於反革命地主和資本家的爭鬥

(六)全體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以立憲民主黨爲首（人民自由報）都是幫助康尼洛夫和加萊亭的暴動。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新聞報所發表的事實，已經完全證實了這點。

如果政權不轉給蘇維埃，那麼什麼完全壓迫反革命，就是連什麼調查反革命的事，也不能認真的進行。倘然沒有政權，那麼任何的委員會，都不能進行完全的調查，及逮捕罪犯等的工作。祇有蘇維埃政府方才能夠而且應該加以實行。祇有蘇維埃政府方能逮捕康尼洛夫派的將軍和反革命資產階級的首領（古契柯夫，密留柯夫，略步與斯基（Riapushinski）馬克拉諾夫（Maklanov）等等，解散反革命的聯合

(國會，軍官聯合會等等)，把他們的會員送交蘇維埃檢察，解散反革命的軍隊，而擔保俄國不至再遇「康尼洛夫」式的變故。

祇有蘇維埃政府方能組織那樣的委員會去澈底地光明地調查康尼洛夫及其他案件，甚至於資產階級所檢舉的案件；祇有這樣的委員會，布爾塞維克方能號召工人來對他表示完全服從並給以完全幫助。

祇有蘇維埃政府，方能勝利地和這種顯然地橫暴行爲（如資本家借助於千百萬的民脂民膏，而奪取最大的印刷所和布爾塞維克的報紙）進行爭鬥。應該封閉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報紙（言論（Speak）俄羅斯之言（Russkoe Ilva）等等），充公他們的印刷所，宣佈報章上私人的廣告，爲國家的專利；將這些報紙轉爲政府的報紙，由蘇維埃發行，用來向農民說明真理。祇有這樣才能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去毫無懲罰地來造謠謾罵欺騙人民，蠱惑農民準備反革命等等的工具。

革命的和平的發展

(七) 在俄國民民主派之前，在蘇維埃之前，在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之前，現在開始了革命歷史上極少遇到的機會，使之可以保證在規定的期間不再延宕的召集立憲會議，使之可以保證國家，脫出軍事上和經濟上的大難，使之可以保證革命的和平的發展。

倘然蘇維埃現在把國家政權，完全的整個的拿到自己手中，以實施上述的政綱，那麼蘇維埃非但穩穩當當地可以得到俄國十分之九的人民，工人階級及大多數農民的幫助，並且還一定可以有軍隊和大多數的人民的革命熱情；如果沒有這種熱情，那麼要戰勝饑荒和戰爭，是不能的。

倘然蘇維埃自己不動搖，那末現在不會有反抗蘇維埃舉動。沒有一個階級敢作反對蘇維埃的暴動，地主和資本人，已經得到康尼洛夫事變的教訓，所以爲壓迫對於蘇維埃政綱的反抗起見，祇要工人和農民監督剝削者，採取懲罰，如沒收全體財產短期拘禁等等，就儘夠了。

蘇維埃奪取政權後，現在還可以（這大概是他們最後的一個機會）保證革命的

和平發展，人民代表的和平選舉，蘇維埃內部的和平鬥爭，各黨政綱在實際上的試驗，以及政權從一黨轉到別黨的和平轉變。

倘然錯過了這個機會，那末從四月二十日起至康尼洛夫事變爲止的革命發展的過程，已經指示出，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不可避免的要有兇惡的內戰。不可避免的經濟危機，促進這個戰爭。人類腦力所能知道的事實和智識，都指示出這種戰爭的結果，一定是工人階級的完全勝利，以及貧農對於工人的幫助。他們進而實現上述的政綱；但這種戰爭，將非常繁重，將流洒很多的血，斷送數萬地主，資本家，以及同情於他們的軍官的命。無產階級，爲挽救革命，實現上述政綱起見，是不惜赴湯蹈火，作任何的犧牲的，但是倘然蘇維埃會實現最後的一個機會，使革命和平地往前發展，那麼無產階級還是用全力來加以幫助的。

(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六，二十七日第二十及二十一兩號工人之路。)

危 機 成 熟 了

無疑地，九月之末，在俄國革命的歷史上，並且一般的看來，也在全世界革命的歷史上，引起極重大的轉變。

全世界工人階級的革命，由個人的行動開始，他們以勇敢直前的力量，代表腐朽着的正式「社會主義」（實際上是社會狹隘愛國主義）政黨中之全部忠實成份。德國的李卜克內西，奧大利的安得萊，英國的麥克林，這些就是個人的英雄中最著名的人物，他們盡了艱難的世界革命先鋒的作用。

這個革命的歷史準備的第二個階段，是廣大的羣衆的騷動，此種騷動，流成正式政黨分裂的形式，流成祕密出版的形式，更流成街道上示威游行的形式。反對戰爭的抗議，更加利害，政府搜查逮捕之下的犧牲者，不絕增加。以法律甚至以自由

自傲的那些國家，如德、法、意、英等等國的監獄中，擠滿了整千百的國際主義者，戰爭的反對者，以及工人革命的擁護者。

現在已經到了第三個階段，這個階段可以叫作革命的前夜。自由的意大利的國內政黨首領之被捕，特別重要的，德國的軍事暴動之開始，——這些就是偉大轉變的無疑的表記，全世界上革命前夜的表記。

無疑的，德國以前也有兵變的事情，但這些變動，是這樣的微小，這樣的散漫，這樣的薄弱，使政府可以把他們壓制下去，抹殺下去，政府主要的就是用這種方法來消滅叛變行動的羣衆傳染性。現在這種運動在艦隊上，終究成熟了——就是在絕頂精密非常嚴格的德國軍事和刑事制度之下，他們也不能壓倒和抹殺這運動。

毫無異義的，我們正在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前夜。在所有各國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者中，祇有俄國的布爾塞維克，享受比較寬廣的自由，擁有公開的政黨及二十餘個報紙，有首都兵工代表蘇維埃的幫助，在革命的時候，更有大多數民衆的幫助，所以對於我們正可適合這句成語：所得者多，所出的力亦須多。

俄國無疑地到了革命轉變的時機。

在農民的國家中，處於革命的共和的政府之下（這個政府有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幫助，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昨天還在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中佔據統治地位），農民的暴動，竟有增無已。

這是怪事。但這是事實。

但這個事實，並不使我們布爾塞維克奇怪；我們不斷的說過，出名和資產階級「合作」的政府，是叛賣民主主義和革命的政府，是帝國主義戰爭的政府，是保護資本家地主來對抗人民的政府。

因為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欺騙了人民，所以俄國在共和國之下在革命期間，還有資本家和地主的政府，和蘇維埃同時並存。這是又酸又苦的實際情形。在帝國主義戰爭的延長及戰爭的結果，使俄國人民受到空前未聞的災之時，農民暴動

的開始和增長，又何足爲奇呢！

這何足爲奇，試看布爾塞維克的反對者，當權的社會革命黨的首領（這個政黨歷來總是擁護『合作』的，他在最近幾天或幾星期以前，還有大多數人民的擁護，他繼續譴責和謾罵那些新的革命黨人，祇因他們相信合作政策是叛賣農民利益的）在九月二十九日，他們的機關報人民事業的時評上，這樣的寫着：

『……直到現在，差不多絲毫沒有採取什麼辦法，去消滅那些奴隸式的關係，此種關係，還正統治於俄羅斯中部的鄉村中。整頓鄉村土地關係的法律，久已交給臨時政府，而且更經過司法討論會那樣的洗滌所，但這個法律，却渺茫無望地不知擱在那個辦公處裏了……我們說，我們的共和國政府，還沒有脫出沙皇統治的習慣，司託里賓的掠奪政策，還強烈地保留在革命總長手腕裏，這點難道不對嗎？』

正式的社會革命黨人，這樣的寫！試想一想看：『合作』的擁護者，不得不承認，在農民國家裏，經過七個月的革命後，『差不多絲毫沒有採取什麼辦法去消滅奴隸式的關係』，地主奴役農民的關係！這些社會革命黨人，不得不把他們的夥伴

克倫斯基以及全體縣長們的狗黨，叫作「司託里賓派」。

從我們的敵人營壘中，能否找到較此更顯著的證據，證明非但合作破產，非但容忍克倫斯基的正式社會革命黨，變成反人民反革命的政黨，而且俄國的革命，已在轉變之中？

在農民國家中，竟至發生了農民暴動，來反對社會革命黨人克倫斯基，孟塞維克，尼幾金，格服士及夫及其他代表資本家及地主利益的總長的政府！共和政府，却以軍事手段，來鎮壓這種的暴動。

在這樣事實之前，誰要是再否認危機的成熟，否認革命是在經閱最重大的轉變，否認政府對於農民的勝利是革命的最後葬禮和康尼洛夫派的最後凱旋，那麼他還能成爲無產階級的忠實的擁護者嗎？

三

很明顯的，倘在農民國家裏，經過七個月的民主共和國的統治後，會弄到農民

暴動的地步，那樣，這種事實，是在非常確定地證明出全國的革命危機，絕頂強烈的革命危機，以及反革命力量之趨於『末途』。

這是很明顯的。在農民暴動的這樣事實之前，其他和全國恐慌的成熟相反的政治現象，都差不多沒有什麼意義。

況且這些現象剛剛證明全國危機的成熟。

在俄羅斯全國的政治生活上，除土地問題外，民治問題，要算具有重大意義的，特別是對於小資產階級的民衆。我們看到，在爲采萊台里那些先生欺騙蒙蔽的民治會議上面，反對合作的票數，就百分數講，除職工會的集團外，次多的要算『民族的集體』（五十五票中，反對的有四十票），他甚至超過工兵代表蘇維埃的集團的百分數。壓迫農民暴動的克倫斯基政府，從芬蘭調出革命的軍隊，以鞏固反動的芬蘭資產階級。在烏克蘭，一般烏克蘭人和政府的衝突，以及特別的烏克蘭軍隊和政府的衝突，有加無已。

再看軍隊：在戰爭時，軍隊在全國政治生活中，具有最大的意義。我們看到芬

蘭的軍隊和波羅的海的艦隊完全脫離政府。我們聽到非布爾塞維克軍官杜白索夫的口供，他以全體艦隊的名義聲明，聲明得比較全體布爾塞維克還要革命些，他說：兵士以後不再作戰。我們看到政府的通告，說軍士的情緒，非常的「焦急」，要擔保他們遵守「秩序」（就是擔保這些軍隊參加壓迫農民暴動），是不可能的，最後我們看到莫斯科投票的結果，一萬七千兵士中，贊成布爾塞維克的有一萬四千。

莫斯科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結果，一般的講，是全國情緒上發生最深刻轉變的一個最顯著的表誌。大家都知道，莫斯科比較彼得堡更帶着小資產階級性。莫斯科的無產階級，無比地更和鄉村相連，更同情於鄉村，更接近鄉村農民的情緒——這也是經過多次證實的無可疑慮的事實。

請看，在莫斯科，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票數，在七月為百分之七十，到現在降至百分之十八。小資產階級拒絕「合作」，人民拒絕合作，這是毫無疑義的。立憲民主黨，從百分之十七增至百分之三十，他們雖有「左派」社會革命黨和「右派」孟塞維克的協助，但還是屬於少數的地位，屬於絕望的少數地位。俄羅斯新聞

策。倘然布爾塞維克陷入憲法的迷網之中，「信仰」立憲會議的召集，「等候」蘇維埃的代表大會等等，那麼毫無疑義地，這樣布爾塞維克，定成爲可憐的無產階級事業的叛徒。

因爲國際主義不在辭句上，而在團結的表現上，不在決議案上，而在實際上。因爲臨時政府（就是人民事業報，也以這個政府較之司託里賓派）之壓迫農民暴動，等於葬送全部革命，等於永遠地一往不回地葬送全部革命。首領們狂呼無政府狀態，狂呼羣衆冷淡態度之加重。其實，倘然農民已被推到暴動的地步，而所謂「革命的民主派」，又耐心地容忍壓迫農民暴動的軍事辦法，那麼羣衆又怎麼會不以冷淡態度對付選舉呢！

在這時候，如果容忍壓迫農民暴動的辦法，那末等於允許他們屢造立憲會議的選舉，像他們屢造「民治會議」及「國會預備會」一樣，而且屢造得更要醜惡和粗暴。

危機成熟了。俄國革命的全部將來，置於圖上了。世界工人革命的全部將來，

命革月十至命革月二

也置於圖上了。

危機成熟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七日第三十號工人之路)

布爾塞維克能否維持政權

——作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之末——

從言論報到新生活報 (Novoye Zin'e 高爾基等的報)，從立憲民主黨康尼洛夫派直至半布爾塞維克，總之除布爾塞維克以外，所有其他派別의 相同意見何在？

相同意見，即在他們都以爲布爾塞維克單獨不敢奪取國家政權於自己手中，或是倘然敢去奪取的話，那麼要維持政權，就在極短促的時期內，也是不可能的。

倘然有人批評，以爲布爾塞維克單獨奪取政權的問題，完全不是真實的政治問題，以爲祇有「執迷不悟的信徒」的最愚笨的偏見，方能把他看作真實的問題，那麼我們對於這種批評，可以引正最負責最有影響的政權及各「色」派別之正確聲明，來加以駁倒。

但開始先要對上述的第一個問題說幾句話，即布爾塞維克是否敢單獨奪取全部

政權於自己手中？我曾經在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當采萊台里作總長的演說時，從座下作堅決的聲明，以回答這個問題。我在報章上談話上都沒有遇到布爾塞維克方面的反對的意見，說我們不應該單獨奪取政權。我繼續保持這種意見，以為政黨，特別是先鋒階級的政黨，倘然在有獲取政權的可能時而放棄政權，那麼，他就無權可以生存，不配稱作政黨，而且從各方面看來，其作用都是祇等於零。

現在我們摘引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半布爾塞維克（我更願意稱他們為四分之三的布爾塞維克）等等對於上述問題的聲明。

九月十六日言論報的時評：

「在亞歷山大戲院的大廳中，充滿不同意和雜亂現象，社會主義者的報章，也反映這種現象。祇有布爾塞維克的意見，堅定和爽直。在會議中這是少數的意見。在蘇維埃中，這是逐日強大起來的傾向。不管布爾塞維克發表了什麼憤激的辭句，自負的空話及自信的表現，但在他們中間，除開幾個「執迷不悟的信徒」以外，其餘都祇在口頭上表示勇敢。就是根據他們自己的意思，他們也不想獲取「全部政權」。他們是非常出色的搗亂者和破壞者，

實際上膽小如鼠，他們在自己的心坎中，也很清楚地覺悟自己的愚昧及其目前勝利的短促。他們也像我們一樣明白了解，他們最後勝利的第一天，就是他們一蹶不可復振的滅亡的第一天。他們天性，是不負責任的，在方式上手段上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祇能算是政治思潮的一種，更正確點，可說是思想上的閃光之一。如果要長時期地除去和肅清布爾塞維克主義，那麼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國家的命運交給他們領袖。倘然他們不覺這種試驗的不法和危險，那麼儘可不顧一切也來試一下這種英雄之舉。可是運氣還好，這些可悲的現代英雄，實際上就是自己也不想奪取全部政權。無論在什麼條件下，他們是盡力進行建設的工作的。所以他們全部堅定和爽直的態度，祇限於政治的講台上，祇限於大會的空話中，實際上無論從那方面看來，他們的觀點都是不足注意的。但是，他們觀點上有些真實的影響，即是他們合併了一切反對社會主義的派別……」

立憲民主黨人，這樣的批評。下面是俄國最大的「統治和執政」的政黨，社會革命黨的觀點，這篇文章沒有具名，而以時評形式發表於他們正式機關報人民事業上。（九月二十一日）

……如果資產階級，不願意根據民治會議上所批准的綱領和民主派合作到立憲會議召集的時候，那麼在民治會議參加人的中間，就應該產生混合內閣。這是混合內閣擁護者的一方面的極大犧牲，可是那些宣傳政權應當採取『純潔路線』的人，也應該有這樣的犧牲。但是我們恐怕連一個協商，也是不能成立的。那時祇剩得第三種最後的辦法：就是民治會議中在原則上擁護單純政權的那一半，應該組織政府。

確定點說，布爾塞維克將應該組織內閣。他們用盡力量鼓動革命民主派來仇恨混合內閣，他們口頭上允許在取消『妥協』以後，賜給民主派以種種好處，他們應以妥協爲國內全部災難的原因。

倘然他們要實行他們煽動時所說的話，倘然他們不欺騙羣衆，那麼他們應他們所散佈的支票。

問題非常明瞭。

請他們不要空費氣力躲避於臨時編纂起來的不能奪取政權的理論之下。民主派不能接受這種理論。

同時，混合內閣的擁護者，該擔保給他們（布爾塞維克）以完全的幫助。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辦法，祇有三條道路，旁的沒有！（點畫都按人民事業報）。

社會革命黨這樣的評論，最後，還有新生活派，我們或者可以把他們企圖坐在兩椅之中的態度，稱爲「四分之一的布爾塞維克」之態度；下面文字，是從九月二十三日新生活報的時評上摘下來：

……倘然和康諾范洛夫，吉世金等，成立合作，那麼這不是別的，正是民主派的新的投降，正是取消民治會議上以八月十四日綱領爲根據的關於負責政權的決議案……

……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純粹內閣，也像混合內閣中負責的社會黨總長一樣，不能有什麼根基……這樣的政府，非但不能把革命的「活的力量」，匯集攏來，並且還不能獲得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積極的幫助。

但是，倘然組織別一種純粹的內閣，「無產階級和貧農」的政府，那麼這也不是更好的出路，而是更壞的出路，其實不是出路，而是簡單的倒霉。真的，除了工人之路報上的懼怯的並且以後不絕經過解釋的註解以外，再沒有別人提出這個口號……（負責的輿論家，竟能

「勇敢地」寫出這樣的錯誤，甚至忘記了九月二十一號人民事業報上的時評。

形式上，布爾塞維克提出了這種口號——「全部政權歸蘇維埃」。七月事變以後，當蘇

維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堅決進行積極反對布爾塞維克的政策時，這個口號已被取消。現在

「蘇維埃的路線」，不但可以說是已經糾正，並且還儘有根據可以預定在將近的蘇維埃大會上，布爾塞維克將佔據大多數。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布爾塞維克所提出的「全部政權歸蘇

維埃」的口號，將是進於無產階級及「最貧農」的專政底「策略路線」。真的，在蘇維埃之

中，還有農民蘇維埃，所以布爾塞維克的口號，祇是要求依靠於俄國大部分民主派之上的政權。但在這樣情形之下，「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就失去了獨立的意義，因為蘇維埃

在他的成份上就差不多等於民治會議中所組織的「國會籌備會」。（新生活論調，真是最無

恥的謊語，他等於說偽民權「差不多等於」民權：國會籌備會乃偽民權，他以少數人的

意志，特別是庫司柯瓦，伯根多姆，茶以柯夫斯基等的意志，當作大多數人民的意志，這是

其一。其次，就是在阿夫克生替也夫和茶以柯斯基等所贗造的農民蘇維埃中間，也有這麼多

的人，出來在民治會議上，反對混合內閣；這些人倘和工兵代表蘇維埃一起，儘可以無條件

地使混合內閣崩裂下來，其三，「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是說，農民代表蘇維埃的政權，遍佈於鄉村之中，而鄉村中貧農的統治，是可以得到保證的——（列寧註）。倘然，這兩方面是一樣的，那麼布爾塞維克的口號，應該立刻撤消。倘然「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祇是用來遮掩無產階級專政，那麼這樣的政權，等於破壞革命，毀滅革命。

假使無產階級，不但和國內其他階級隔絕，而且還和民主派內真正活的力量隔絕，那麼無產階級既不能在技術上管轄國家機關，使之能在最複雜的境況中進行工作，而且又不能抵抗敵對力量的全部攻擊，這種攻擊非但要推倒無產階級專政，並且還連累及全部的革命；這種情形，難道還用加以證明嗎？

我們摘錄得這樣冗長，應該向讀者道歉，但這是無條件地必需的。必須正確地指出各個敵視布爾塞維克的政黨的觀點。必須指出非常重要的一種情形，即是……他們都異口同聲地承認布爾塞維克單獨奪取政權的問題，不但是實在的問題，並且還是切身的目前的問題。

他們（從立憲民主黨直至「新生活派」）全「都」相信布爾塞維克不能維持政

權，現在我們來分析他們的理由。

堅實的『言論』報，簡直什麼理由，都沒有舉出來，他祇以最特出的怒氣沖沖的謾罵，加於布爾塞維克的身上。我們上面所引的一段話，更指示出，如果我們這樣想，說言論報挑動布爾塞維克奪取政權，所以『同志們應該小心，因為敵人所勸告的，一定是惡事。』那麼這種思想，顯然是非常不正確的。倘然我們不去實際地估計一般的和具體的境況，相信資產階級是向我們『挑釁』的事實，那麼我們就要為資產階級所愚，因為資產階級一定要惡意地預言布爾塞維克奪取政權後的無量數的災難，一定惡意地高呼：『倘然讓他們當權，而加以當頭痛擊，那麼可以更好的一下子打倒他們，而『長時期的』除去布爾什維克；這種呼喊，也可以說是『挑釁』，說是反方面的挑釁。立憲民主黨和資產階級並不是『勸告』並且永沒有勸告過我們奪取政權；他們祇想用那種好似不能解決的政權的任務，來恐嚇我們。

不！我們不應該為驚恐的資產階級的呼喊所嚇倒。我們應該牢牢的記住，我們永遠不知有『不能解決』的社會任務，而且現在非常困難情形下的唯一出路，即進

向社會主義去的任務，是安全可以解決的，並且祇有無產階級和貧農的羣衆，能夠加以解決。倘然俄國無產階級，現在奪取政權，那麼他的勝利，堅固的勝利，比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的勝利，更有擔保。

我們將實實在在地討論某個時機所以不利的那些具體情形；可是如果資產階級狂呼布爾塞維克奪取全部政權的問題已經急在眉睫，那麼，我們對於這樣凶惡的呼喊，就連一分鐘也不許給他們嚇倒，並且，也不會給他們嚇倒，倘然我們忘記了這點，那麼我們就要比較我們承認奪取政權尚屬「過早」的那個時候，受到更大的危險，現在，在這方面再不會有什麼「過早」的危險了，除掉一二事件外，其餘數千百萬事件，都證實這點。

關於言論報的凶惡的謾罵，我們可以而且必須背誦下面的話：

我們不在甜蜜悅耳的阿諛中，

是在粗野可畏的謾罵中，

聽到了讚許的共鳴。

資產階級這樣野蠻地仇恨我們的事實，更非常顯明的證實下述真理；就是：我們是正確地給人民指示出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道路和工具。

人民事業這一次超出例外，沒有向我們貢獻謾罵之辭，但也沒有舉出絲毫的理由。他們以間接的形式，以諷刺的形式想用「布爾塞維克將不得不組織內閣」的預言，恐嚇我們。我充分的相信社會革命黨想恐嚇我們，其實他們自己真是驚恐到極點，他們為吃驚的自由主義的怪物，嚇得要死。同樣，我也相信，在那些特別高貴特別腐敗的機關裏，假如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及與之相做的「接洽」委員會裏（即是和立憲民主黨接觸，直爽點說，即是和立憲民主黨往來的委員會），他們可以零零碎碎的嚇倒幾個布爾塞維克，因為第一，那些中央委員會及「國會籌備會」等等機關裏面的空氣，腐朽到極點，臭得令人作嘔，久處其中，無論何人，都是有害的；第二，誠實是帶有傳染性的，誠實地被別人嚇倒的俗夫，甚至能夠暫時的使別的革命者，也變成俗夫。

社會革命黨的人，不幸和立憲民主黨同據閣位，或為立憲民主黨奔走效勞，他

們底誠實的吃驚，在「常人」看來，固然很是顯明，可是我們倘然因看了這種吃驚情形，而使自己也爲之嚇倒，那麼我們就要做下極大的政治錯誤，這種錯誤，很容易的可與叛賣無產階級的罪惡爲鄰。先生們，你們實際的理由何在！不要希望我們會給你們的吃驚狀態所嚇倒呵！

這一次我們祇在新生活報中找到實際的理由。他在這次，與其說是八面討好的布爾塞維克的擁護者，毋寧說是資產階級的律師。

資產階級的律師舉出六個理由：

- 一、無產階級「和國內其他階級隔絕」；
- 二、他和「民主派內真正活的力量隔絕」；
- 三、他「在技術上不能管轄國家機關」；
- 四、他「不能使這機關進行工作」；
- 五、「境况非常的複雜」；
- 六、「他不能抵抗敵對力量的全部攻擊，這種攻擊非但要推倒無產階級專政，

並且還連累及全部的革命。」

新生活的第一個理由，真是笨拙得好笑；在資本主義及半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我們知道三個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是他主要的代表）及無產階級，在講到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和革命時，如果有人說無產階級是和其他階級隔絕，那麼這種話，含有什麼意義呢？

新生活一定是想說，無產階級和農民隔絕，因為實際上在此處決不會講到地主。但是確定地明顯地說無產階級現在和農民隔絕，也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論調的顯然錯誤，豁然在目。

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中（注意），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決不能像俄國無產階級那樣，這樣少與小資產階級相隔絕。從客觀和毫無疑義的統計上，我們得到采萊台里的「蒲列金國會」中，即名為「民主」的會議中，各個集團贊成反對與資產階級合作的票數。試看蘇維埃中的各個集團。我們得到：

贊成合作 反對的

工兵蘇維埃

八三

一九二一

農民蘇維埃

一〇二

七〇

全體蘇維埃總計

一八五

二六二

所以全體講來，大多數擁護無產階級的口號：反對與資產階級合作。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就是立憲民主黨，也不得不承認蘇維埃裏面布爾塞維克影響的增長。可是這還是蘇維埃的過去首領所召集的會議，即在中央機關中佔據多數的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所召集的會議！所以顯然的，布爾塞維克在蘇維埃中所佔據的實際的優勢，在這裏還說得過於小了。

在和資產階級合作的問題上，在立刻把地主土地轉給農民委員會的問題上布爾塞維克已經在工兵代表蘇維埃及農民代表蘇維埃裏面，獲得大多數的擁護，即獲得大多數人民大多數小資產階級的擁護。九月二十四日第十九號工人之路報上，已轉載社會革命黨機關報勞動旗幟上關於九月十八日在彼得格勒召集的各地農民代表蘇維埃聯席會議的消息。在這個會議中，贊成無限制的妥協的，祇有四個農民蘇維埃

的執行委員會（柯斯特羅姆省，莫斯科省，薩馬耳省，塔夫利取省）。主張除去立憲民主黨而其餘互相合作的有三省和兩個軍隊的執行委員會（佛蘭及密耳省，梁尙省，黑海邊省）。反對合作的有二十三省和四個軍隊的執行委員會。

所以，大多數農民反對合作。

這就是你們所謂『無產階級的孤立』。

此外，應該指出，贊成合作的省分，有三個是邊陲的，薩馬耳，塔夫利取，及黑海邊，那裏比較多於富農和大地主，他們是靠雇用工人來作工的，其餘四個工業區的省分佛蘭及密耳，梁尙，柯斯特羅姆，莫斯科），這四省的農民資產階級，也比較俄國其他大多數省分爲強。倘能搜集更詳盡的關於這個問題的材料，而考察農民最『富』的幾省中貧農的消息，那麼更有興趣。

再次有興味的，是『各民族的集團』中，反對合作的，佔絕大多數，即四十票和十五票之比。效法拿破崙的克倫斯基輩對於俄國弱小民族的併吞和暴力的政策，已收其效，被壓迫民族的廣大羣衆，即其中小資產階級羣衆，相信俄國無產階級的

程度，比較相信資產階級的程度爲高，因爲歷史事變，已使被壓迫民族反對壓迫者的解放鬥爭，成爲目前任務。資產階級已卑鄙齷齪地叛賣了被壓迫民族的自由事業，無產階級却是忠於自由事業的。

民族問題和土地問題是俄國小資產階級民衆前面的一個基本問題。這是毫無疑義的。在這兩個問題上，無產階級都是稀有地「絕對沒有孤立」。他有大多數人民的擁護。唯有他能夠在這二個問題上，進行這樣堅決的真正「革命民主主義」的政策，使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非但可以穩穩當當地有大多數人民的幫助，並且還可以有羣衆革命熱情的真正的爆發，因爲羣衆不是遇到沙皇時代地主對於農民，大俄人對於烏克蘭人等等的無情的壓迫，不是遇到共和國時期以華美辭句爲掩飾而繼續進行沙皇政策的那種企圖，不是遇到詐騙，侮辱，詭計，延宕，跪拜，和陰險手段等等（這些都是克倫斯基給與農民和被壓迫民族的獎賞）而是遇到由事實證明的政府方面的熱烈的同情，看到立刻採取反對地主的革命辦法，立刻恢復芬蘭，烏克蘭，白俄，回回人等的完全自由；這些情形是有史以來破天荒的第一次。

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先生們，很清楚地知道這點，於是就拉了半立憲民主黨的協作社的上層分子，來幫助自己的反對民主主義的反對羣衆的政策。所以他們永不敢叫各地蘇維埃對於實際政策的種種問題，作意見書或至少舉行投票：這些問題，如現時應否立刻把地主土地轉給農民委員會，應否執行芬蘭人或烏克蘭人的某種要求等等。

和平的問題，是現時最主要的問題，無產階級『與其他階級隔絕』……其實無產階級在這上面，真正是全體民衆的代表，是所有階級中活動和忠實份子的代表，是小資產階級的大多數的代表，因為祇有無產階級當權以後，方能立刻向全體交戰的人民提出公正的和平，祇有無產階級，方能採取真正革命的辦法（公佈祕密條約等等），使之可以越快越好地達到越公平越好的和平。

『新生活』派的先生們，你們高呼無產階級的孤立，這祇表現你們自身為資產階級所嚇倒。無疑的，俄國現時的客觀時局，正是說明無產階級現在剛剛沒有和大多數的小資產階級隔絕。剛是現在，經過悲慘的『合作』的經驗以後，無產階級獲

得了大多數人民的同情。布爾塞維克維持政權的這個條件，顯然是俱備了。

第二個理由在於無產階級好似「以民主派內真正活的力量相隔絕」。這是什麼意思，無從懂得。這好像法國人所說的，大概是「希臘語」罷！

新生活報上的作家，是熱望閣位的人。他們很配在立憲民主黨之下作總長。對於這些總長，祇求能作很動聽很圓活的辭句，其中可以絲毫沒有內容，但是可以遮掩任何醜惡，所以可以穩穩當當地得帝國主義者及社會帝國主義者的喝采。新生活派斷定無產階級和民主派內真正活的力量相隔絕，這種話一定可為立憲民主黨人，勃萊世柯夫斯下亞，及普列漢諾夫輩之喝采，因為這種批評間接的說出（雖不明說，但這種意思，却和已經明說一樣）立憲民主黨人，勃萊世柯夫斯下亞，普列漢諾夫，克倫斯基等，是「民主派裏面的活的力量」。

這是不對的。他們是死的力量。這話已由合作的歷史證實了。

新生活派為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環境所嚇倒，於是承認那些與立憲民主黨無重大區別的右派社會革命黨及孟塞維克，如人民意志報統一報等等，為

『活的』力量。但是我們却祇以那些和羣衆相連而非和富農相連的人民，那些受了合作教訓而脫離合作的人們，爲活的力量。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積極的活的力量』底代表，乃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左派。左派勢力的擴張，特別在七月的反革命事變以後，是最真確的證明無產階級不是孤立的表記之一。

九月二十四日邱爾諾夫聲明，他的一派，不能幫助新的對於吉世金的合作，最近以來社會革命黨中央派的這種左傾，更顯著地證明上述情形。在社會革命黨內，即在居於領導地位並在城市中特別在鄉村中集得最多票數的政黨內，中央派具有最多的代表，因之社會革命黨內的中央派的左傾，證實我們在上面所摘引的『人民事業報』的聲明，說，在某種條件之下民主派必須對於純粹布爾塞維克的政府『擔保完全的幫助』，證實這種聲明無論如何，不僅僅是些空話。

社會革命黨的中央派，拒絕幫助新的對於吉世金的合作，在高加索區孟塞維克祖國保衛派（若大尼亞等）內部反對合作的一派，佔據優勢，這些事實，都客觀上證明以前擁護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一部份的羣衆，現在是擁護純粹布爾塞維克

的政府的。

俄國無產階級現在正是和「活的」力量沒有隔絕。

第三個理由：無產階級『在技術上不能管轄國家機關』，這許是最尋常最流行的理由。他最足令我們注意，第一因為他是通行的理由，第二因為他指示出擺在勝利的無產階級面前的一個最嚴重最艱難的任務。無疑地，這種任務是非常艱難的，但是倘然自命為社會主義者的我們，在指出這種困難時，僅僅為着避免這樣任務的執行，那麼在實際上我們和資產階級走狗的區別，即等於零。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的困難，應該警惕無產階級的信徒，去更注意地更具體地研究執行這種任務的方法。國家機關，首先就是指常備軍，警察和官吏。新生活報的作家說無產階級在技術上，不能管轄這些機關，表現出他們愚昧到絕頂，表現出他們不願顧及實際的事實和布爾塞維克書報上所提出來的主張。

新生活報的作者，即使不自以為是馬克斯主義者，也一定自命為諳熟馬克斯主義的學識淵博的社會主義者。但馬克斯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我們，無產階級

不能簡單的管轄現成的國家機器，運用這種機器，以達自己目的，無產階級應該毀壞這種機器，而換以新的（關於這點，我將在已經竣稿將要出版的國家與革命，馬克斯關於國家關於革命中無產階級任務的學說一本小書內，詳細說及）。黎公巴社，已造成了這種新的國家機器，俄國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也就是這一類的「國家機關」。從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起，我不斷的指出這點，在布爾雪維克大會的決議案及布爾塞維克的書報上，也都說到。自然新生活儘可於對於馬克斯和布爾塞維克表示完全不同意，但是日常辱罵布爾塞維克，說布爾塞維克不去認真應付艱難問題的報紙，竟完全忽略了這個問題，這就等於證明自己一竅不通。

無產階級不能「管轄」「國家機關」，而使之動作。但他能夠完全毀壞舊的國家機關中一切壓迫的，冥頑的，不可救藥的資產階級的東西，而代之以自己的新的機關。這種機關，就是工農兵代表蘇維埃。

新生活報完全忘記了這個「國家機關」，這不能不說是奇怪之至。新生活派在他們理論的評判中，竟會採取這種態度；實在的講，他們正是在政治的理論上做

立憲民主黨在政治實際上所做的事情。因為，倘在事實上，無產階級和革命的民主派，不需要任何新的國家機關，那時蘇維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失去了存在的權利，那麼立憲民主黨人要想消滅蘇維埃的企圖，是真確的了。

就是孟塞維克的國際主義派（在最近的彼得格勒的市議會選舉中，『新生活』派與之聯盟），在這上面也表示和布爾塞維克有相當的接近，所以新生活的荒唐的理論上的錯誤，和政治上的昏庸，更覺離奇極了。試看孟塞維克馬爾托夫在民治會議中所宣讀的蘇維埃多數的宣言：

在革命的最初幾天內，為真正人民的創造力的迸發所建立底工農的代表蘇維埃造成了新的革命國家的組織，用來代替舊時代國家的頹廢的組織……。

這上面說得太漂亮些，即是說，在這地方，辭句上的裝飾，遮掩着政治思想上了解之不足。蘇維埃還沒有代替舊的『組織』，這個舊『組織』，並不是舊時代的國家制度，而是沙皇帝制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家制度。但無論如何，馬爾托夫在這上面，總比新生活派高出兩個頭地。

蘇維埃是新的國家機關，他（蘇維埃）（一）給我們以工農的武裝力量，這種力量，不像舊的常備軍那樣，和人民分離，而是和人民密切相連的，在軍事上講來，這個力量，比較以前一切軍隊，都無比地強大得多；在革命的觀點上講來，他不能爲任何其他力量所代替；（二）這個機關對於羣衆和大多數人民發生絕頂密切的不可間斷的易於檢察和恢復的連繫，在從前的國家機關之下，這種連繫，簡直是夢想不到的；（三）這個機關的成份，爲人民所選舉，民意而撤換，沒有官僚主義的架子，所以比以前機關，都要民主化些；（四）他和各項的職業，緊密地相連，因之他可以以不經官僚主義方法而促成各色各樣的深入民衆的改良；（五）他是一種組織形式，即是被壓迫的工農階級裏面最覺悟最堅強最先進部分的先鋒隊的組織形式，經過這種機關，被壓迫階級的先鋒隊，可以提高，教育，訓練，和領導這些階級中的廣大羣衆，這些羣衆，直到現在，總是完全處在政治生活及歷史之外的；（六）他使我們可以合併國會制度和直接民權的長處，就是說，他把立法的作用和法律的執行，合併於人民所選舉的代表身上。和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相較，這點正是在民治

主義的發展上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一種進步。

我們一九〇五年的蘇維埃，可以說祇是一種萌芽，因為他祇存在了幾個星期。很顯明的，在那時的情形下，蘇維埃決不能四方八面的發展起來。就是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也說不到這點，因為幾個月的時期很短，並且主要的是，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首領，污辱蘇維埃，使之變成清談之所，變成領導們妥協政策的附屬品。蘇維埃在里盤而 (Lilour) 但 (Dan) 采萊台里 (Tsereteli) 邱爾諾夫 (chernov) 輩的領導之下，活活的腐爛下去，崩潰下去。蘇維埃祇有在取得全體政權之後，方能完全發展他的本能和能力，因為不然，他們就無事可做，他們或是僅成簡單的胚芽（胚芽是不能存在得長久的），或是僅成玩物。『兩個政權』是蘇維埃的癱瘓症。

如果人民的創造力，沒有設立蘇維埃，那麼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或許就是絕望的事情，因為無產階級不能以舊的機關來維持政權，而新的機關，却決不能立刻成立起來。采萊台里，邱爾諾夫等污辱蘇維埃的歷史，『合作』的歷史，同時正是蘇維埃脫去小資產階級幻想的歷史，是經過『清毒所』以實際研究全部及各種資產

階級合作的卑賤醜惡等情形的歷史。我們將希望，這個「清毒所」，不至破裂蘇維埃，而祇是鍛鍊了蘇維埃。

無產階級革命最主要的困難，是在於怎樣去實現全國最確切的最忠實的計算和監督，實現工人對於生產和物品分配的監督。

新生活派反對我們，說我們提出「工人監督」的口號，好似就陷入工團主義之中，這種話是小學生式笨拙地引用「馬克斯主義」的表示，他是不經思索，而去學步斯脫盧威。工團主義或是否認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或是把這種專政和一般的政權問題，置於末位，我們却把他置於首位。倘然簡單的按照新生活派的語氣，不講工人監督而講國家監督，那麼這種話結果祇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空辭，實際上祇成純粹立憲民主黨的公式，因為立憲民主黨毫不反對工人參加國家的監督。立憲民主黨人——康尼洛夫派，很清楚的知道，這種參加是資產階級欺瞞工人的最好方法，是在政治上精密地收買什麼格服士及夫，尼既金帕羅柯怕維赤，采萊台里及其他狐羣狗黨等等的最好方法。

我們的『工人監督』的口號，總是和無產階級專政并提的，并且總是提在專政口號之後的，因之當我們說『工人監督』時，我們總要說明我們所講的是怎麼的國家。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那個階級？倘是資產階級，那麼就是立憲民主黨——康尼洛夫——克倫斯基的國家，工人在這個國家中，已被康尼洛夫，克倫斯基蹂躪了半年多了。倘然說無產階級的國家，即說到無產階級的專政，那麼工人監督，可以成爲全民的，概括一切的，遍佈的，最確切的對於生產和產物分配的計算。

主要的困難在此，無產階級革命即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任務亦如此。如果沒有蘇維埃，那末，至少在俄國，這個問題是不能解決的。蘇維埃指示了無產階級的組織工作，祇有蘇維埃的這種工作，方能解決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重要任務。

現在我們要說國家機關問題的別一方面了。除了主要的是供給『壓迫』之用的那些機關，如常備軍，警察，官吏等等以外，在近代國家中，還有和銀行，新迪加特別密切相連的機關，這種機關，執行計算與登記的工作（倘可以這樣說的話）。這種機關，不能加以毀壞，并且也不應加以毀壞。應該使他脫離對於資本家的服

從，應該從他上面，割去，裁去，切去資本家及資本家的影響，應該使他服從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應該把他擴充得更廣大，更能概括一切，更能為全民所利用。根據巨大資本主義所已實現的成績，我們可以做到這點（一般的講求，無產階級革命，也祇有根據這些成績，方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資本主義創立計算的機關，例如銀行，新迪加，郵政局，消費合作社，職員聯合會等等。沒有巨大的銀行，社會主義或許就不能實現。

巨大的銀行，就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時所需要的而我們現成地得之資本主義的機關，這上面，我們的任務，即在於裁去這種極好機關的發育上的資本主義性質，把他改造得更大，更民主化，更能概括一切。數量轉為質量。如果最大銀行中的唯一最大的國家銀行，在各區鄉區，在各個工廠中，都有支行，——那麼他已經是十分之九的社會主義的機關。這是全國的會計，全國生產和分配產物化計算，這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骨骼。

這種「國家機關」（在資本主義下，他不完全是國家的，但在我們社會主義之

下，將完全是國家的），我們可以（拿來），而一下子，一個命令，即可「使他動作」，因為實際上會計、監督、登記、計算、算帳等等工作，都是由職員來執行的，這種職員，大多數都是自己處在無產階級或半無產階級的境況之中的。

無產階級政府一道命令，就可以而且應該使這些職員，轉成國家職員的地位，好像守衛資本主義的走狗如白利安及資產階級總長，一道命令把罷工的鐵路工人，轉成國家職員的地位一樣。我們需要更多的這樣的國家職員，並且我們可以得到更多的這樣職員，因為資本主義使計算和監督的工作簡單化，使之不甚複雜，所以每個識字的人，都有能力做這種工作。

在蘇維埃監督和檢察的條件之下，銀行新迪加商店等等職員的「國家化」，是在技術上（因為資本主義及金融資本主義給我們做下了準備工作）政治上完全可以實現的事情。

很少數的高等職員，是趨向於資本家的，對於這些職員，不得不「嚴格的」用對付資本家的方法對付他們。他們也像資本家一樣，要起來反抗。應該把這種反抗

打倒。幼稚得要命的帕雪洪諾夫，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如真正的『執政的孩兒』一般，吶吶地說道：『資本家的反抗，已經打倒了』，在他們一方面，這句話祇是一種兒戲式的空話，嬰孩式的自傲，兒童式的山歌，但是無產階級對於這句話，却是要認真加以實現的。

我們可以做到這點，因為我們祇要壓倒極少數人民的反抗，而且簡直可以說是寥寥晨星的一些人的反抗：職員聯合會，職工會，消費合作社，及蘇維埃，能夠建設起這樣的監督，使每個資本家嚴密的包圍在裏面，好像法國人包圍在色當一樣。我們祇要掌握到經理，理事，大股東等的名單，就可按名知道這些資本家。他們在俄國全國中，不過數百，最多不過數千，無產階級國家，用着蘇維埃職員聯合會等等機關，可以向每個資本家，加上數十或甚至數百的監督人，所以即使不用『撲滅反抗』的方法，而應用工人監督（監督資本家），已足使任何反抗成爲不可能。

問題的『焦點』，甚至不在於資本家財產的沒收，而在於全國的概括一切的工人對於資本家及其各色走狗的監督。祇有沒收一項，還不能發生什麼效果，因爲在

沒收中間，沒有組織底原素，沒有正確分配的計算的原素。我們很容易的可以用公平的徵稅（甚至照興加力夫的稅率），代替沒收，我們祇要消滅隱藏帳目，遮掩事實，逃避法律種種的可能。祇有工人國家的工人監督，方能消滅這種可能。

強迫的新迪加化，即在政府監督之下的強迫聯合，就是資本主義替無產階級專政準備下來的東西，在德國已由貴族資產階級的政府加以實現，在俄國，蘇維埃也儘能夠加以實施，這些就是概括一切的，最新的，非官僚主義的『國家機關』給與我們的東西。

資產階級律師的第四個理由是：無產階級不能推動國家機關進行工作。這個理由和上面一個理由相較，並沒有什麼新的地方。我們自然不能管轄舊的機關，而使他動作。新的機關，蘇維埃，已爲『真正人民創造力的迸發』所推動而進行工作。我們從這個機關上，祇要除去社會民主黨和孟塞維克首領所加上的手銬足鐐就好了。這個機關，已經動作起來，我們祇要從他上面拋去那些妨礙他前進妨礙他順利前進的小資產階級的卑鄙的醜態就好了。

爲補充起見，我們還要研究兩點：第一，新的監督的工具，這種工具不是我們所造成的，而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戰爭時代所造成的；第二，民主主義的擴充，在無產階級式的國家管理上的意義。

麵包的專賣和麵包券，不是我們所造成的，而是交戰的資本主義國家所造成的。他們已經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造成普遍的強迫勞動，這是爲工人而設的軍事苦工監獄。就是在這上面，也像其他歷史的創造一般，無產階級的武器祇是從資本主義那邊奪取來的，而不是自己『臆想』出來的，『得之於空中樓閣』的。

如果麵包專賣，麵包券，普遍的強迫勞動等等，掌握在無產階級國家手中，掌握在擁有全部政權的蘇維埃手中，那麼這些辦法，可以成爲最有力的計算和監督的工具，這種辦法，也應加到資本家和一般富人的身上，應該由工人加到他們身上，這樣可以產生一種歷史上空前的『推動國家機關工作』的力量，去戰勝資本家的反抗，而使他們服從無產階級國家。這種監督和強迫勞動的工具，強過康文特（法國大革命的人民代表機關）的法律和其斷頭台。斷頭台祇能恐嚇和壓制積極的反抗。

對於我們，這些還是不夠。

我們不僅要恐嚇資本家，使他們感覺到無產階級國家的強大的力量，使他們不敢妄想積極反對無產階級國家。我們還要打倒消極的反抗（無疑地，他是更加危險，更加有害。我們不但要壓服任何的反抗，我們還應該強迫他們在新的國家組織的範圍內來工作。「趕跑」資本家還是不夠的，應該（在趕跑一錢不值的毫無希望的反抗者以後）叫他們作新的國家的工作。對於資本家，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及職員等等的一部份上層份子，都應該如此幹去。

這上面，我們儘有工具。交戰的資本主義國家，自己把工具和武器放到我們手中。這些工具，即是麵包專賣，麵包券，普遍的義務勞動等等，「誰不作工，誰不得食」，這就是工人代表蘇維埃獲取政權後可以實行並且一定要實行的基本的，緊迫的，最主要的規例。

每個工人，應有工作簿。這種文件，絕不是侮蔑工人，雖然在現時，他無疑的是資本主義僱用奴隸制度的文件，是勞動者屬於某個寄生蟲的證明書。

蘇維埃使富人也要有工作簿，以後，再把他普遍的應用於全國人口之中（在農民的國家中，對於最大多數農民，或許長時間內還不需要工作簿）。工作簿不再成爲『賤骨頭』的記號，他證明，新社會中，再沒有什麼『工人』，但是也沒有一個人不是工作者。

富人應該從他們的行動所最接近的那種工會和職員聯合會，領取工作簿。他們應該每星期或某個時期向這些工會領取證明書，說明他們是否忠實執行工作；沒有這個證明書，他們就不能獲得麵包券及一般的食品。我們要有很好的銀行事業的和企業聯合的組織爲（在這些事業上，資本家有更多的經驗；如果同有經驗的人在一起，那末工作就容易進行），我們應該具有比從前更多的工程師，農學家，技術師，及各種有科學知識的專門家。我們給那些工作者，以他們所長的及他們所習慣的勞動，我們祇能逐漸採用完全平等的報酬制度，我們對於專門家，暫時祇好付給更高的工資，但是我們要使他們處在精密的工人監督之下，我們定能完全的無條件的實現『誰不作工，誰不得食』規例。這種工作的組織形式，並不是我們臆想出來

的，而是現成地從資本主義的銀行，新迪加，很好的工廠，試驗場，專門學校等等地方得來的；我們祇是要採用先進國家裏的最好的經驗。

自然，我們絲毫不會陷入烏托邦主義，我們決不會脫離最精細的實際計算的基礎；如果整個資產階級起來作最頑強的反抗，那麼這種反抗，將為全體民衆的組織所撲滅，自然對於其中最頑強，最不服從的資本家，我們將以沒收財產及監禁的辦法懲罰之；可是無產階級的勝利，將使今日新聞報上所登載的那種事體，增加起來：

『九月二十六日，工廠委員會的中央蘇維埃裏，來了二個工程師，聲明有好幾個工程師議決組織社會主義工程師的聯合會。聯合會以為在實際上，現在正是社會革命的開始，所以他們貢獻自己，願受工人羣衆的指揮，出來保護工人的利益，并和工人的組織完全一致的行動。工廠委員會中央總蘇維埃的代表回答他們說，蘇維埃很願意在自己組織中，設立工程師部，工程師部在綱領中，應包括工廠委員會第一次大會關於工人監督生產的基本提綱。在最近幾天內，就要召集工廠委員會中央蘇維埃與社會主義工程師聯合會的發起團體兩方面代

表底聯席會議（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七號中央執行委員會新聞報）。

有人向我們說，無產階級不能推動國家機關使之動作。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以後，一三〇、〇〇〇個地主統治俄羅斯，他們以無窮盡的對於一萬五千萬人民的壓迫，以無窮盡的對於他們的凌辱，以強迫極大多數人民作苦工過半飢半餓的生活之方法，來統治俄羅斯。

據他們意見，好似布爾塞維克黨的二四〇、〇〇〇黨員站在擁護貧人利益反對富人的基礎之上，不能統治俄國。其實，這二四〇、〇〇〇黨員，現在已有一百萬以上的成年人，投票贊助。歐洲的經驗及俄國的經驗，例如八月間彼得格勒市議會的選舉的說明在黨員人數和贊成他們的投票之間，有何等的比例。請看：我們已有一百萬人，國家機關；這些人在思想上是盡忠於社會主義國家的，他們並不是爲着每月在二十號（沙皇時代，官吏每月都在二十號領薪）領取巨額的月薪。

此外，我們還有『奇異的工具』，他一下子就可以把我們國家機關，擴充十倍，這種工具，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有過，并且也不能有。這種奇異的工具，就是吸

收勞苦羣衆，吸取貧民到管理國家的日常工作來。

怎樣容易的可以利用這種奇異的工作，他的行動，怎樣不會錯誤，爲說明這點起見，我們可以舉出最顯明的例子。

國家要強迫地令某家遷出某所屋子，而使別家可以搬入。資本主義國家時常這樣幹，我們無產階級的或社會主義的國家，也是要這樣做的。

資本主義的國家，令失業的付不起房錢的工人家庭遷居。來了法庭推事和整排警察。要在工人區域中，舉行遷居，不得不調遣整隊的哥薩克。爲什麼？因爲推事和『警察』，沒有極大武裝力量的保護，就不敢去。他們知道，強迫遷居的活劇，要在附近的居民中間，要在數千輾轉失望的人民中間，引起這樣強烈的憤怒，這樣利害的對於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仇恨，使推事和整排警察，每分鐘都有粉身碎骨的危險。所以他們一定要有極大的軍事力量來保衛，一定要從遼遠的郊外，遣調幾團軍隊，這樣方便兵士不會顧念到城市貧民的生活，使他們不至受社會主義的『傳染』。

無產階級的國家，要強迫地在富人的住房中，遷入最困苦的家庭。譬如說，我們派遣一隊工人的民警，其中包含十五個人：二個海軍兵士，二個兵士，二個覺悟的工人（讓其中只要一個是本黨黨員或同情本黨的人），再次，一個知識分子，八個勞苦的貧民，其中最少一定要有五個婦女，傭人，和苦工等等。「公民，在這一個冬，請你擠緊些罷，請你擠在二間房子內，其餘二間，準備給兩個住在地窖下的家庭，讓他們遷移進來。當我們尚未得到工程師之助（你似乎也是工程師？）來給大家建設起好的住房的時候，我們應該擠緊一些。你們的電話，將歸十家應用。這樣可以節省一百點鐘奔走於各店的時間。再次，你們家裏，有兩個沒有職務的半工人，五十五歲的婦人，和十四歲的兒童，他們可以做些輕便的工作。他們每天將值日三小時。查察十家中間食品的正確的分配，并作必需的記錄。我們隊伍中的學生，立刻就把這個國家的命令寫成二份，請你們寫張字條給我們，說明你們一定會切實地執行這個命令。」

據我看來，如果用顯明的例子來說明，那末，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機關及國家管

理，和新的社會主義國家機關及國家管理中間的比較，就是如此。

我們不是烏托邦主義者。我們知道任何苦工和女廚子，都不能立刻上來管理國家。在這點上，我們是和立憲民主黨，是和勃萊世柯夫斯卡亞及采萊台里等同意的，但是我們和這些人所不同意的，即在我們要求立刻消滅那種成見，以為祇有富人和富家出身的官僚，方能管理國家，方能進行日常的每日的管理工作。我們要求，覺悟的工人和兵士，一定要學習管理國家的事宜，並且這種學習應該立刻開始；就是說應該立刻開始吸收全體勞苦羣衆，全體貧民，來學習這種事宜。

我們知道，立憲民主黨，也同意爲人民教授民主主義。立憲民主黨的令婦，答應根據英、法的最好材料，給傭人作男女平權的講演。並且在最近的音樂大會上，在廣庭數千羣衆之前，作接吻的表演；立憲民主黨的女演講家，和勃萊世柯夫斯卡亞接吻，勃氏又和前任總長采萊台里接吻；於是享福的人民，就很明白地學到什麼是民主的平等自由，和博愛……。

是的，我們同意，立憲民主黨，勃萊世柯夫斯卡亞和采萊台里是盡忠於他們自

己的民主主義，并在人民中宣傳這種主義的。但是倘然我們對於民主主義，有別的不同見解，那麼應該怎樣辦法呢？

據我們意見，爲減輕空前的戰爭的負擔和災難，以及爲醫治戰爭給與人民的最慘苦的創傷起見，應該有革命的民權，應該有上述那種站在貧民利益上的分配房屋的革命辦法。同樣的，在城市和鄉村中，對於食物，衣服，靴鞋等，在鄉村中，對於土地等等，都應該採取這種辦法。我們可以立刻吸收一千萬人（即使不是二千萬人）來建設國家機關，并在這樣的精神之下，來管理國家，這種國家機關，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不曾夢見過的。祇有我們能夠創立這種機關，因爲我們可以擔保，絕大多數人民，對於我們，是會表示堅決不拔的同情的。祇有我們能夠建設這種機關，因爲我們有受過長期資本主義「訓練」的（我們受資本主義訓練，決非無益）覺悟的和守紀律的工人，他們能夠創設民警并且逐漸地擴充成全民的民警（開始時擴充得極慢）。覺悟的工人，應該領導，但他們能夠吸收真正勞苦和被壓迫的羣衆，來做管理國家的工作。

自然，在新機關開始工作時，不可避免的要有錯誤。但是當農民脫離農奴制，獲得自由而開始自己經營農事的時候，難道他們不會有過錯誤嗎？難道除了實習的道路除了立刻採用真正人民的自治以外，還有別的道路可以教訓人民自己管理及改去錯誤嗎？現在最主要的，就是在於除去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成見，以為祇有那些在整個社會地位上，完全依靠資本主義的特別官吏，方能管理國家。最主要的，是要剷除下述的現象——即：官吏們和「社會主義者」的總長們，想以舊的資產階級的辦法，來管理國家，可是他們却沒有管理的能力，於是經過七個月的統治以後，在農民的國家裏，竟至興起農民的暴動！最主要的，即是在於使被壓迫者及勞苦的羣衆，具有信心，使他們相信自己的力量，應在實際上指出，他們能夠并且應該站在貧民的利益上，正確地嚴格地，有秩序地，有組織地分配麵包，一切食物，牛乳，衣服，及房屋等等。非此，再沒有挽救俄國出於毀滅和死亡的道路。如果管理國家的事宜，誠意地勇敢地轉入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手中，那麼可以產生這樣的歷史上所空前未有的羣衆革命的熱情，可以使人民向災難作戰的力量增加到這許多倍，

使狹隘的舊的官僚力量所完全不能實行的任務，可以完全由數百萬羣衆的力量來加以實現，這些羣衆已經開始爲自己工作，而不是在鞭策之下爲資本家爲公子爲官僚而工作。

國家機關的問題，連帶到集中主義的問題，在九月廿七日第一三八號新生活報的布爾塞維克與政權問題一篇論文中，巴扎洛夫特別用力地可是特別不行地提出這個問題。

巴扎洛夫同志這樣的辯論：『蘇維埃不是能夠應付各項國家生活的機關』，因爲七個月的經驗指出，而且『彼得堡執行委員會經濟部的無數文件證明，雖然是許多地方蘇維埃享有『全部政權』，可是在和經濟破壞鬥爭上面，他們『總不能獲得怎樣滿意的結果』，因之『必須按照產業部門而分類設立機關，他在每個部門內嚴格的集中起來，而服從於統一的全國的中央』。『這上面（仔細看）不是在於換去舊的機關，而是在於舊的機關……不論布爾塞維克怎樣嘲笑具有計劃的人。』……

巴扎洛夫同志的全部議論，簡直空洞無理到絕頂，他好像是資產階級議論的小

影，資產階級階級觀點的反映！

事實如何？說蘇維埃在某個時期，在某些地方，已經享受過『全部政權』，這簡直是笑話（如果不是重複資產階級故意造出來的階級謊語），全部政權，必須有支配全部土地，全體銀行，全體工廠的權力；素稱知道歷史經驗，素稱知道關於政治和經濟間相互聯繫的科學知識底那些人，決不會『忘記』這件『小』事情。

資產階級的欺騙方法，即在於他不把政權轉給蘇維埃，對於蘇維埃的實際辦法怠工，保持政府於自己手中，保持支配土地銀行等等的權利於自己手中，而却把全部破壞的罪惡，推諉到蘇維埃身上！這正是全部和資產階級合作的經驗。

蘇維埃從來不會有過全部政權，他們的辦法，除了暫時止痛和增加混亂以外，再不會發生過別的作用。

布爾塞維克，堅決相信集中制並且在黨綱及全部策略上都指出這點。如果有人向布爾塞維克，指示集中制的必要，那末這實在等於班門弄斧。新生活報上的作家之所以幹這種閒事，祇是因為他們完全不懂得我們嘲笑他們『全國的觀點』之

意義。新生活派之所以不懂，正因為他們只在嘴上而不是在心上承認階級鬥爭的學說。他們重複所學到的階級鬥爭的辭句，但却每秒鐘都陷入在理論上可噓的在實際上反動的那種觀點之中，而把那種為資產階級效勞的舉動，叫作『全國的計劃』。

親愛的人呵，國家是有階級性的。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別個階級的機關或機器。現在他具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機器，所以一直到現在，無產階級祇有一個口號：破壞這個國家，但當國家成為無產階級的國家時，當他成為無產階級壓迫資產階級的機器時，我們就會完全的并且無條件的擁護堅固的政權和集中制。

通俗一些講：我們并不是嘲笑『計劃』，而是嘲笑巴扎洛夫輩不知道他們否認『工人監督』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即是贊成資產階級的專政。沒有折衷的路，折衷的路，乃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空想。

沒有一個中央，沒有一個布爾塞維克，反對過蘇維埃的集中制和蘇維埃的統一。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反對各生產部門中的工廠委員會以及他們的集中。巴扎洛夫祇是無的放矢。

我們不是嘲笑『集中制』，不是嘲笑『計劃』，而是嘲笑改良主義，不但現在如此，就是過去和將來，也莫不如此。因為經過合作的經驗以後，你們的改良主義，已是可笑之極。你講：『不是換去機關，而是改良機關』，這正是說，你是在做着改良主義者，就是說你不作革命民主派，而作改良主義的民主派。改良主義不是別的，正是統治階級的讓步，不是統治階級的推翻，而是統治階級保持政權，作某種的讓步。

這剛是半年以來的合作所試驗過的情形。

我們就是取笑這些。巴扎洛夫不詳細思索階級鬥爭的學說而落入資產階級的陷阱之中，資產階級正在齊聲唱和『看，請看，我們正是不反對改良，我們主張工人參加國家的監督，這些我們完全同意』，而好心的巴扎洛夫，客觀上却成了資本家的同聲附和者。

凡在劇烈階級鬥爭的環境中佔據『折衷』地位的人，在過去與將來，都莫不蹈此覆轍。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新生活報上的作家不能懂得階級爭鬥，他們的政策，

就這樣可笑地永久搖擺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

好心的朋友，試做『計劃』罷，這不是政治，也不是階級鬥爭的事，這上面你們可以爲人民謀利益。你們報上，有好多經濟學家。請和那些預備研究生產的調劑和分配的工程師們聯合起來，把你們機關（報紙）上的增刊，用來研究俄國的生產和分配，銀行和新迪加等等的切實情形；這樣你們才是爲人民謀利益，這樣，你們居中的坐位，方才沒有什麼特別害處，這樣的『計劃』工作，方不至於引起嘲笑，而且反引起工人們的感謝。

無產階級在勝利時，將這樣的幹去：他使經濟學家，工程師，農學家等等，在工人組織監督之下，坐起來規定『計劃』，審查計劃，找出怎樣集中以節省勞動的方法，找出最簡單、低廉、利便、和普遍的監督方法，我們以高價，付與這些經濟家、統計家、技術師，但是……他們倘然不在勞動羣衆的利益上，誠意地執行這種工作，那麼我們就不給他們東西吃。

我們擁護集中制和『計劃』，但是我們擁護無產階級國家的集中制與計劃，擁

護無產階級根據貧民勞苦羣衆及被剝削者的利益以調劑生產和分配，以反對剝削者的那種集中制和計劃。祇有那種壓倒資本家的反抗，并給大多數人民即無產者和半無產者，工人與貧農以全部政權的國家，我們方纔承認是共同的國家。

第五個理由是說：布爾塞維克之所以不能維持政權，是因為其「境况非常複雜」。

呵，聰明人！他們原來祇許有那種沒有「特別複雜的環境」底革命。

這樣的革命，是不會有的，在懸望這種革命時，除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長嘆外，再沒有別的東西。即使革命開始時的環境，似乎不大複雜，但革命本身，在其發展中，一定造成非常複雜的境况，因為革命，真正的深刻的「人民」（用馬克斯的話）的革命，是極端複雜和慘酷的消滅舊的社會制度，產生新的社會制度，奠定數千萬人民的生命底過程。革命是最尖利的猛烈的，死中求生的階級鬥爭和國內戰爭。歷史上沒有一次偉大的革命，不經過國內戰爭。祇有閉在箱內的人，方以為國內戰爭可以不經「特別複雜的環境」而產生。

倘然沒有特別複雜的環境，那麼，也就不會有革命。懼怕豺狼，就不要到森林裏去。

在第五個理由之中，沒有什麼可供分析的東西，因為其中沒有什麼政治的經濟的以及一般的新的思想。其中祇有因革命而悲傷驚恐的那些人之嘆息聲，為形容這種嘆息聲起見，且舉二個很小的個人的回憶。

在七月事變以前不久，曾和一個殷實的工程師談話。這個工程師以前曾經是革命者，曾經做過社會民主黨甚至布爾塞維克黨的黨員。現在他祇是害怕，祇是怨恨狂放不羈的工人。他說（他受過很高深的教育，曾留過學）：假使我們工人，像德國那樣，那麼我自然懂得，一般的社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我們工人究竟怎樣呢？……並且戰爭更使我們工人的程度減低……這不是革命，而是陷入深淵。

倘然歷史之進入社會革命和德國快車之蒞臨車站一樣的平安、靜謐、順利和準時，那麼他（工程師）預備承認社會革命。火車到站時，穿着制服的賣票人，開放車門，高呼：「社會革命車站到了」，都下去罷。那時又為何不從資本家的工程師

的地位，轉到工人組織的工程師的地位呢？

這個人見過罷工。他知道就是在尋常太平的時期，最尋常的罷工，也要引起非常大的恐懼。他自然知道當激烈的階級鬥爭使極大國家的全體勞苦羣衆興發起來的時候，當戰爭和剝削，把數百年來爲地主所抽剝，數十年來爲資本家和沙皇官僚所掠奪和鞭策的數百萬人，推到絕望地步的時候，這個革命的波濤，將要強烈到幾百萬倍。這些，他『在理論上』都知道，他在口頭上都承認，但他祇是爲『非常複雜的環境』所嚇到了。

在七月事變以後，因克倫斯基政府的特別懇勸的照顧，所以我就不得不轉入秘密狀況中。自然，一位工人，隱藏了我們的弟兄。在彼得格勒的很遠的工人區裏，吃中飯。家婦拿了麵包進來。主人就說：『看呵，怎樣好的麵包，哈，「他們」現在不敢給我們以壞的麵包。我們可不會想到，在彼得格勒，也能得到這樣好的麵包。』

這個對於七月事變之階級的評判，深深的打擊了我。我的思潮，就旋轉於七月

事變的政治意義上，周思他在一般政治變化上的作用，分析這個歷史的轉變，是從何種形勢中產生出來的，並且他將造成何種形勢，我們應該怎樣變更我們口號和我們黨的機關，使之能夠適應已經變更的情勢。我沒有經過飢餓的境遇，所以沒有想到麵包。在我看來，麵包好像是不求而得，好像是文字工作的附屬品。根據上述情形，我的思想，經過政治的分析，非常複雜和混亂地轉到爭奪麵包的階級鬥爭上。但是被壓迫階級的代表，雖是工資很高很有知識的工人，也尖利深刻地想到這點，他們見解非常簡單和爽直，非常的堅決，非常的明瞭，我們知識份子的兄弟，與之相交，幾有霄壤之別。全世界分成兩個營壘：『我們』勞動者及『他們』剝削者。工人對於前次所發生的事變，并不吃驚；因為這個祇是勞動者和資本家長期鬥爭中之一仗。斬伐大木時，木片是要紛飛的。

這個『非常複雜的環境』，是何等慘酷的東西——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這樣的想，這樣的感覺到。

我們壓榨『他們』一點，『他們』已經不敢像從前敵對這樣耀武揚威。以後更榨

緊一點，終於把他們驅逐出去。」——工人却這樣的想，這樣的感覺到。

第六并且最後的一個理由是：無產階級『不能抵抗敵對力量的全部攻擊，這種攻擊非但要推倒無產階級專政，并且還連累及全部革命。』

先生們，不要怕，不要嚇倒。你們在康尼洛夫叛變時，已經看到了敵對的力量及其進攻（克倫斯基行動，與之絲毫沒有區別）無產階級和貧農怎樣肅清康尼洛夫，資產階級的信徒，各地方地主中特別富有特別『仇視』革命的少數代表，處在怎樣窘迫和飄搖無依的地位上；這些情形，大家都看到，人民都牢牢的記住。九月三十日的人民事業報（社會革命黨），勸工人『容忍』克倫斯基政府（即康尼洛夫派），和采萊台里的偽國會，直至立憲會議召集時為止（立憲會議，將在壓迫暴動農民的『軍事手段』的保衛之下召集）。人民事業報剛是束緊喉頭，重複新生活報上的第六個理由，而喊得喉嚨嘶啞：克倫斯基政府，無論如何，總不會服從『托洛斯基和列甯』的政權（即蘇維埃的政權，工農的政權，人民事業報要和那些蹂躪弱小民族者，反猶太派，帝制黨人，及立憲民主黨人爭勝，所以把這個政

權，稱爲「托洛斯基和列寧」的政權，請看社會革命黨人的手段，下流到如何地步！）。

但無論是新生活或是人民事業，都是不能嚇倒覺悟的工人的。你們說：「克倫斯基政府，無論如何，不會服從」，簡單些，爽直些，清楚些說：就是他（克倫斯基政府）要重演康尼洛夫的事變。「人民事業」的先生們，竟敢說這是「國內戰爭」，這是「最慘酷的前途」！

不是，先生們，你們欺騙不了工人。這不是國內戰爭，而是幾個康尼洛夫信徒自趨末路的暴亂。倘然他們「不服從」人民，而要盡其所能來向人民挑釁，以大規模地重演前次在范保爾地方所發生的對付康尼洛夫派的事變，倘然社會革命黨需要這樣，倘然社會革命黨的克倫斯基，需要這樣，那麼他可以使人民進到拚命的地步。但是先生們，你們可是不能以此嚇倒工人和兵士。

試看他們無恥到何等地步：他們利用僞物，膺造了新的布列金國會，他們集合了反動的合作社負責人及鄉村的富農，拉攏資本家和地主（所謂顯赫之輩）等，來

幫助自己，他們想和這些狐羣狗黨一起，來破壞人民的意志，工農的意志。

在農民國家中，竟做到遍地爆發農民暴動的地步！祇要想一想：在農民佔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的民主共和國，做到農民暴動的地步！……在九月三十日厚顏無恥地勸告工農『忍耐』的人民事業報，邱爾諾夫的報，『社會革命黨』的機關報，在九月二十九日的時評上，不得不自己承認：

『直到現在，差不多絲毫沒有做過什麼工作，以消滅統治於俄羅斯中部的鄉村中的那些奴隸關係。』

這個人民事業報，在同一九月的二十九日的時評上說道：『在革命總長手段上面，更強烈地表現出司托里賓的強佔政策』，換一句話說，明白些簡單些說，這個報紙，正是把克倫斯基，尼基金，基世金等，稱為司托里賓派。

司托里賓派的克倫斯基等等，把農民推到暴動的地步，現在又採用『軍事辦法』來鎮壓農民，以立憲會議的召集，來慰藉人民（雖然克倫斯基和采萊台里，已經欺騙過人民一次，他們在七月八日宣佈，立憲會議將在九月十七日召集，可是以後

自失其言，以致不管孟塞維克的勸告，而把立憲會議延期，並且不照那時孟塞維克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意見，延至十月末，而竟延至十一月末。司托里賓派的克倫斯基輩，以將近的立憲會議的召集，來慰藉人民，好似人民就會因此而相信在這件事情上已經說過一次謊的那種人，好似人民相信政府會正直地召集立憲會議；其實這個政府就是在窮鄉僻壤地方，也採取了『軍事辦法』，即是說這個政府顯然袒護那種任意逮捕覺悟農民，偽造選舉的舉動。

他們把農民推到暴動的地步後，還有這樣的厚顏來對農民說：應該『忍耐』，應該等待，應該信任那個以『軍事辦法』鎮壓農民的政府！

他們在六月十九日以後，繼續進攻政策，而使數十萬俄國的兵士，死於戰場上，他們使戰事拖延下去，使德國的海軍兵士暴動起來，把官長擲於大海之中，他們使事情進到這樣的地步，而卻不斷地還在口頭上空說和平，還不向全體交戰國家提議公正的和平——這種人還有這樣的厚顏來向工農說，來向困頓死亡的兵士說：『應該忍耐』，相信司托里賓派克倫斯基的政府，再相信康尼洛夫式的將軍一個月

或許一個月中，他們還能把數萬的兵士置入死地……『應該忍耐』。

這豈不是厚顏無恥之極？

不！社會革命黨的先生們，克倫斯基的同黨們，你們欺騙不了兵士。

工人和兵士知道蘇維埃政府一定會立刻向全體交戰人民提議公正的和平，一定可以給他們立刻的休戰，和迅速的和平，所以他們就是連多一天，多一點鐘，不能容忍克倫斯基的政府。

他們的農民軍隊，就是多一天，多一點鐘，不能容忍反對蘇維埃意志，而以軍事辦法鎮壓農民暴動的克倫斯基政府之存在。

不！社會革命黨的先生們，克倫斯基的同黨們，你們再也不能欺騙工人和農民了。

在敵對力量進攻的問題上（怕得要命的新生活報，相信這種進攻會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更有一個離奇的，邏輯上和政治上的錯誤，祇有嚇得不知去向的那些人，方才不能看到這點。

你們說：『敵對力量的攻擊，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好。但，夥計們，你們都是經濟學家和學識優長的人。你們都知道，把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二者并舉起來，是無謂的愚蠢的事，這等於把尺寸和斗升并舉起來。因為有民主的資產階級，也有非民主的小資產階級的成份（能作反對革命專政的舉動，好像法國大革命時范台地方小資產階級反對巴黎的革命專政一樣）。

『敵對的力量』，是句空話。他的階級意義，即是資產階級（受地主的幫助）。其一，資產階級以及地主；其二，無產階級；其三，小資產階級，小生產者，首先是農民；這就是俄國及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內所分成的三種主要『力量』。這三種力量，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中（并且在俄國），非但經科學的經濟分析，指示出來，并且還經全部近代世界歷史上的政治經驗，十八世紀以來全部歐洲革命的經驗，俄國一九〇五年及一九一七年兩次革命的經驗，指示出來了。

因此，你們恐嚇無產階級，說他們的政權，要為資產階級的攻擊所推倒？你們的恐嚇在此，并且僅僅在此，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內容。

好。假使說資產階級可以推翻工人和貧農的政權，那麼等於說，小資產階級會和資產階級「合作」聯合或協商；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法子。而且別的，也簡直無從想起！

但合作已經試驗了半年，結果破產，就是你們自己新生活報上好心的而不會思想的先生們，也拒絕合作了。

那麼結果如何呢？

新生活上的先生們呀，你們神經竟錯亂到這樣地步，使你們在最簡單的辯論中，非但不能計算五以下的數目，而且就是連三以下的數目，也都算不清楚。

或是資產階級的全部政權。對於這個政權，你們久已不爲他辯護了，就是資產階級，也不敢提出這點，因爲他們看到，在四月二十一——二十一日的时候，祇要人民肩上一動，這種政權，就已經倒坍，現在再來時，人民一定要把他拋擲更加堅決無情。其次，或是小資產階級的政權，即是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合作（聯合，聯盟），因爲小資產階級不願並且不能單獨的獨立的奪取政權，所有的革命的經驗

及經濟科學，都證明這點，經濟科學說明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祇能擁護資本主義或是擁護勞動階級，折衷地位是沒有的。這種合作，在俄國已經不知用幾十種方法試驗過，但其結果却都是完全失敗。

最後，全部政權，或是歸於無產階級和貧農，以反對資產階級以壓倒資產階級的反抗。這還沒有試驗過。你們，新生活報上的先生們，勸告人民不要這樣幹，用你們自己對於資產階級的恐懼態度，來恐嚇人民。

第四種政權，簡直臆想不出來。

所以，如果新生活報懼怕無產階級專政，並且因為無產階級政權有被資產階級戰敗的可能，所以拒絕這種政權；那麼這就等於祕密地回到和資產階級妥協的地位上去！這是明顯到極點的；誰要是害怕敵人的反抗，誰要是不相信有壓倒這種反抗的可能，誰要是教訓人民說：害怕資本家的反抗罷，你們是沒有能力來處置他們的——誰就是以此號召重新和資本家聯盟。

新生活報窘迫地可憐地錯亂起來，全部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都是這樣的錯亂，

他們看到合作的破產，不敢公開給他辯護，但同時爲資產階級袒護，而懼怕無產階級和貧農的全部政權。

害怕資產階級的反抗，而同時又自命爲革命者，想自列於社會主義者之中，——這是何等的恥辱！受機會主義茶毒的全世界社會主義，要在思想上墮落到如何地步，方能說出這種的話！

我們已經看到，全體民衆也已經看到，資本家的反抗的力量如何：資本家比較其他階級爲覺悟，他們立刻懂得蘇維埃的意義，立刻聚精會神地用盡最後的力量，運用全部可能的手段，動員全部的工具，直至空前未聞的造謠謾罵的方法，直至軍事陰謀，來破壞蘇維埃，來消磨蘇維埃，來淫污蘇維埃（因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之助），把蘇維埃轉爲清談之所，整幾月地用最空洞的辭句，用那種以革命爲兒戲的舉動，來消磨工農的精力。

但是無產階級和貧農的抵禦力，我們却還沒有見過；祇有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祇有被窮苦的環境及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所壓制的數千萬羣衆，在實際經驗上見到

感覺到，政權是握在被壓迫階級的手中，政權是在幫助貧民去和地主及資本家鬥爭，撲滅他們的抵抗，祇在這個時候，無產階級及貧農的抵禦力量，方能騰躍飛漲起來。祇在這個時候，我們方能看到在民衆中還蘊蓄着何等大的抵抗資本家的潛力，祇在那個時候，方才發現恩格斯所稱的『隱藏的社會主義』，祇在那個時候，方有整百萬的新戰士，起來對付數萬公開的或隱藏的積極行動的或消極抵抗的工人階級政權的敵人；這些新戰士，直到如今，在政治上可說是沈睡未醒，他們在貧困和絕望的痛苦中成長起來，不相信自己是人，不相信自己有生存的權利，不相信近代集中國家的所有力量，可以用來爲自己謀利益，不相信自己無產階級民衆的隊伍，可以赤誠相與地號召起來，直接地親熱地參加日常管理國家的事宜。

資本家以及地主，獲得了普列漢諾夫，勃萊世柯夫，斯卡亞，采萊台里，邱爾諾夫等善意的參加，用盡全力來玷污民主共和國，他們効忠於富者，把共和國玷污到這種地步，使冷淡無情之感覺，充滿於人民的心中，使人民對於共和國不置可否，因爲餓殍不能區別共和國和帝制國，身凍足裂，叫苦連天的兵士，爲他們（指富者

譯者）利益而犧牲，他們決不能愛共和國。

但當最後的一個苦工，每個失業工人，每個女傭，每個窮落的農民，都看到（不是從報紙上看到而是親眼看到）無產階級的政權，不是爲富人效勞，而是來幫助貧民；看到這個政權，不怕採取任何革命的辦法，去奪取寄生分子所餘的物品，而把他分給餓殍，看到他們強迫手段，使無處可歸的苦人，遷入富者的華廈中，看到他強迫富人償付牛乳的價錢，且當全體貧家的子女尙未得到充分牛乳的時候，就連一滴也不給富人，看到土地轉給勞苦羣衆，而工廠及銀行受工人的監督，看到富翁倘然藏匿財富，就立刻要受嚴酷的懲罰——當貧民看到這些情形而深刻地感覺到時候，那末任何資本家和富農的力量，任何剽竊數千萬萬財富的全世界財政資本的力量都不能戰勝民衆的革命，反過來，民衆的革命，將戰勝全世界，因爲在全世界上，社會主義的革命，已在成熟中了。

倘然我們革命，自己毫不懼怕，倘然他把全部政權，轉給無產階級手中，那麼我們的革命，是勝利無敵的，因爲幫助我們的，還有更偉大的，更有組織的全世界

無產階級的力量，這個力量雖然暫時爲戰爭所壓倒，但是他沒有消滅，非但沒有消滅，並且還擴大起來。

害怕資本家的老爺們，會『推倒』布爾塞維克的政權，會推倒穩穩當當地可得貧農堅決幫助的無產階級的政權！這是何等的近視，何等可恥的懼怕羣衆，何等的虛僞！表示這樣恐懼的人，正是屬於那種『上等』的『社會』（根據資本的尺度來說，但實際上他們是腐朽下去的），這種社會，嘴說『公平』，但自己先就不相信這種話；按照通例，這祇是一句空話，沒有什麼內容。

舉例說：

帕雪洪諾夫是著名的半民主立憲黨人。再找不出比他更穩健的勞動派，更穩健的勃萊世柯夫斯卡亞與普列漢諾夫的信徒。再沒有比他更鞠躬盡瘁地爲資產階級效勞的總長。世界上再沒有人比他更熱烈地擁護『合作』以及對於資本家的聯盟。

請看這位先生在『民治』會議中（應看作布列金會議——布列金乃一九〇五年受沙皇之命而召集國會的一位總長——譯者註）演說時，不得不這樣的承認（據新

聲的轉達)：

「有兩個政綱。一個是小團體的要求及階級和民族的要求政綱。布爾塞維克最公開地擁護這種政綱。但民主派中其他部分，也絕不輕易地放棄這個政綱。因為這是勞動羣衆的主張，這是困苦顛連的和被壓迫的民族的要求。所以民主派絕不輕易地和布爾塞維克決裂和放棄這個階級的要求，而且這些要求，首先在本身講來很公平的。在革命以前，我們爲着這個政綱而奮鬥，爲了他而完成革命，倘在別種條件下，我們一定會很和協地完全擁護這個政綱，可是在現在的情況之下，這種政綱，却是極大的危險。現時危險更形利害，因爲這種要求，倘在目前提出來，那麼國家決不能加以滿足。應該首先保障國家，挽救國家出於死地。要達到這個目的，祇有一條路：無論這些要求怎樣公平和有力，都不能給以滿足，各方應該限制，應該犧牲。(九月十七號蘇維埃中央委員會的新聞報)」

帕雪洪諾夫君不懂得，當資本家當政時，他不是保障全體的利益，而是俄國和『協約』國帝國主義資本的貪婪的利益。帕氏不懂，祇在和資本家，和他們的祕密條約，和他們的吞併政策(強奪別國土地)，和他們財政上的詐欺行爲等等決裂以後，

戰爭方纔不再是掠奪的帝國主義的強盜的戰爭。帕氏不懂得，祇在我們這樣幹了以後，而敵人拒絕正式向他們提出的公正和平之時，戰爭方是防衛的公正的戰爭。帕氏不懂得一個國家，如果推翻資本主義壓迫，把土地轉給農民，把銀行工廠置於工人監督之下，那麼他的保衛力量，比較資本主義國家的保衛力量，要高出數倍。最主要的，是帕氏不懂得，既然他不得不承認布爾塞維克主張的公平，承認他們的要求，是「勞動羣衆」的大多數人民的要求，那麼他就是放棄了他的全部陣地，放棄了整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全部陣地。

我們的力量，就是在此。這就是我們的政府，爲什麼勝利無敵的原因：因爲就是敵人，也不得不承認布爾塞維克的政綱是「勞動羣衆」和「被壓迫民族」的政綱。

可是帕雪洪諾夫乃立憲民主黨的政治朋友，乃統一報，和人民事業，勃萊世柯夫，斯卡亞及普列漢諾夫等一類的人物，這是富農和大人先生們的代表，這些大人先生們的令妻和姊妹們，在明天，當布爾塞維克爲康尼洛夫或克倫斯基（這完全是一

樣的)的軍隊所敗時，可以用傘柄概出還未全死的布爾塞維克的眼珠。

但這樣的一位先生，也不得不承認布爾塞維克要求的「公平」。

在他看來，「公平不過是句空話」。但是半無產者的羣衆，城市中鄉村中爲戰爭所破壞割裂而備受痛苦的大多數小資產階級看來，這不是空話，而是最急切的最重大的餓死問題，麵包問題。這就是爲什麼絕對不能採取任何「合作」的政策，不能採取把餓殍和窮人的利益和剝削者利益「聯盟」的政策。這就是爲什麼布爾塞維克的政府，可以擔保有這些羣衆中最大多數的幫助。

公平是句空話，說這種話的，是知識份子和奸巧之徒，這些人有雙料的論據，他們以爲觀察了「經濟唯物論」的臀部，就可以宣佈自己爲馬克斯主義者。

在思想統治了羣衆的時候，思想就成爲一種力量。現在，布爾塞維克，即革命國際主義的代表，正是在政策上表現出全世界上推動無量數勞苦羣衆前進的那種思想。

祇有公平，祇有痛恨剝削的羣衆底感覺，還不能進到正確的向社會主義走去的

道路。但在資本主義下，當巨大銀行，新迪嘉，鐵路等等的物質機關興發起來，當最先進國家的最豐富的經驗，蒐集了奇異的技術的資料，可是他們的應用，却受資本主義的阻礙，當覺悟的工人，團結成二十五萬人的政黨，使之能夠在全體勞苦的及被剝削的羣衆的協助之下，有計劃地奪取上述資本主義的機關，而加以運用——當這些條件具備時，如果布爾塞維克能夠不爲別人嚇倒而去奪取政權，那麼在全地球上，再找不出一種力量，可以妨礙布爾塞維克維持政權，直到全世界社會革命完全勝利時爲止。

書 後

上面文字寫好後九月一日的新生活報，又發表了新的笨拙的言論，他對我們更爲危險，因爲他遮掩在同情於布爾塞維克的旗幟之下，隱藏於庸夫俗子的大智大慧的評論底外殼之中；他說『不要受人挑釁』（就是不要墮入挑釁的陷阱中，這種聲音，是在恐嚇布爾塞維克，引動他們不去奪取政權）。

請看他們的言論：

「一方面，像七月三日——五日那樣的運動的教訓，他方面康尼洛夫事變的教訓，都明白白地指示出，如果民主派（他擁有在民衆中最有影響的機關報）在國內戰爭中，佔據防禦的地位，那麼他是勝利無敵的；但是如果他作進攻的主動者而失去居中的動搖的份子，那麼他是要失敗的。」

倘然布爾塞維克對於這種庸夫俗子的蠢話（表現於上述的評論中），無論在什麼形式之下，表示任何的退讓，那麼他們就要葬送自己的黨和革命。

這個評論的作者，在講到國內戰爭時（這個題目，正適合於八面如意的姑娘的口齒），把這個問題上面的歷史教訓，改頭換面得滑稽之極。

試看無產階級革命政策的代表和創造者，馬克思，對這些教訓，這些歷史的教訓，怎樣的批評：

暴動是一種藝術，與戰爭及其他的藝術一樣。他要受某種規律的裁制，若是忽略了這種規律，那麼犯忽略之罪的政黨，必致毀滅。這些規律，是政黨的實質及目前所處環境的實質

所產生的邏輯上底演繹，他們是這樣的明瞭和簡單，使一八四八年的短期經驗，儘够使德國人熟知他們：第一，倘然沒有鬥爭到底之決心，那麼無論何時不許以暴動爲兒戲（直爽點說：要顧到這種玩意兒所產生的全部結果），暴動是非常不固定的容量的對比，這種容量的價值，是每日可以變更的。暴動者所對抗的勢力，擁有種種組織上紀律上以及歷來威權上的優勢（馬克思是指暴動的最難之點：即是反對「堅強的舊政權」，反對還未因革命的影響和政府的搖動而渙散的軍隊）；倘然暴動者不能匯集巨大的力量，來反對他們的敵人，那麼他們必遭失敗而滅亡。第二，暴動一經開始，就要以最大的決心去幹，而採取攻勢。凡武裝暴動而取守勢，乃死亡之路；如果防守，那麼，在未和敵人較量勢力以前，便先已敗亡。當敵人的軍隊還是分散時，應乘其不備而襲擊之，應該設法每日獲得勝利，不論勝利如何之小都好；暴動羣衆在第一次得到勝利以後，應把所得的雄壯的士氣，保持起來；應該吸引那些搖動分子到自己方面來，這些分子總是跟着強大的那方面跑的，總是跟着可靠的那方面走的；在敵人未集合他們的軍隊以攻擊你們之先，你們就要迫之退却；總之，你們要按照自古以來革命戰術上最大名家但頓（Danton）的話做去：勇敢，勇敢，還要勇敢。（德國的革命與反革

新生活上的「亦名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們，儘可以對自己這樣說：我們已經把這些全部改過了，我們有兩種長處，來代替三個勇敢：「我們有二個長處：穩當和精密」。對於「我們」，全世界歷史的經驗，法國大革命的經驗，是無足輕重的。對於「我們」，主要的是一九一七年兩次運動的經驗，這些經驗已爲莫耳創令斯基的眼鏡，改頭換面過了。

試脫去這可愛的眼鏡，來觀察上述的經驗。

你們以爲七月三日至五日的事變，是「國內戰爭」，這是因爲你們相信了阿萊克新斯基 (Alexinsky) 配來范耳食夫 (Porevsev) 之輩。新生活的先生們，竟會相信這種人，這正可以作爲他們的特點（不管他們有巨大的每日出版的大機關報，來收集七月三——五日事變的新聞，可是獨立的見解，却可以說絲毫沒有）。

但是，暫時的就算七月三——五日的事變，不是國內戰爭的開始（因布爾塞維克的制止，而祇限於開始的地步，而是真正的國內戰爭，就算如此）。

就算如此，這個教訓，究竟指示些什麼呢？

第一，布爾塞維克，沒有採取攻勢，因為毫無疑義的，倘然他們在三日夜或四日夜採取攻勢，那麼他們或許已奪得了很多地位。如果講國內戰爭，那麼防禦是他們弱點（如果照新生活這樣評論，而不照事實上的情形。事實上說明七月事變，祇是自然的爆發所形成的像四月二〇——二一日那樣的示威遊行）。

所以，『事變的教訓』正是和新生活報上聰明人所說明的相反。

第二，爲何布爾塞維克在七月三日——四日，甚至不以暴動爲目的，爲何沒有一個布爾塞維克的黨部，提出這個問題，這上面的原因，已超出我們與新生活爭論的範圍之外。因爲我們所爭論的，是『國內戰爭』即暴動的教訓，而不是爲什麼布爾塞維克在顯然沒有得到大多數人民的贊助時不存暴動念頭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祇在經過一九一七年七月事變好久以後，布爾塞維克方在首都及國內的蘇維埃中，獲得大多數（在莫斯科，得到百分之四九的票數）因之，所得的『教訓』，又絕對不是像八面討好的新生活姑娘所要看到的那個樣子。

新生活上的先生們呵！不，還是不要談政治罷！

倘然革命的政黨，在革命階級的先進隊伍中，沒有得到多數，那麼決說不上暴動。在得到革命階級先進隊伍以後，他就應該使：（一）革命蔓延於全國；（二）使舊的政府，例如『混合』的政府在精神上政治上完全破產；（三）使中立份子，即現在不完全贊成政府（雖然昨天還完全贊成政府）的那種份子的營壘中，發生極大的動搖。

爲什麼新生活大講九月三——五日事變的教訓，而對於這個非常重要的教訓，却甚至沒有顧到？此中原因，即在於談論這個政治問題的，不是政治家，而是爲資產階級所嚇倒的一團知識的份子。

再次，第三，事實證明，剛在七月三——四號以後，恰因采萊台里輩的七月政策揭破了這些先生們自己，恰是因爲羣衆看到布爾塞維克是他們自己的先鋒戰士，看到『社會聯盟派』是其叛徒；恰是因爲如此，所以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就開始崩裂，這種崩裂在康尼洛夫事變以前，已由四月二十號彼得格勒的選舉，完全指示出來了，選舉結果，布爾塞維克獲得勝利，『社會聯盟派』一敗塗地（人民事業

報，隱匿全體政黨所得票數的統計，企圖推翻這種事實；但是祇是自欺和欺騙讀者；根據八月二十四號每日報（*Dien*）上僅僅關於城市的統計，贊成立憲民主黨的票數，從百分之二十二增至二十三，贊成他們的絕對票數，減少百分之四十；贊成布爾塞維克的票數從百分之二十增至三十三，贊成他們的絕對票數，祇減少百分之二十一，贊成全部『居中』成份的票數，從百分之五十八減至四十四，而贊成他們的絕對票數，却減少百分之六十二）

在七月事變與康尼洛夫事變之間，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崩裂，更可以由這兩黨內部『左』派的興發來證明，左派差不多佔了百分之四十；這就是對於克倫斯基輩逮捕布爾塞維克的『復仇』。

無產階級政黨，雖然『失了』數百黨員，但七月三——四日以後，都獲得了極大勝利，因為正在這些艱苦的日子中，羣衆懂得並且見到他的忠心，以及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叛變。所以，所得的『教訓』，完全不是新生活報所說的那樣，而是別一個樣子，即：不要脫離沸騰的羣衆，而遷就『虛偽的民主派』，如果起來

暴動，那麼應該採取攻勢，乘敵人勢力分散時而襲擊之。

新生活的「自命馬克斯主義者」們，是否如此呢？

或許「馬克斯主義」，在於不把客觀情形的正確估計，作為策略的基礎，而毫無意義地模模糊糊地把「國內戰爭」，「蘇維埃大會，立憲會議的召集」，攪成一團？

但是，先生們，這簡直是可笑之至，這簡直是放蕩地取笑馬克斯主義及任何的邏輯！

如果在客觀的實際情形中，沒有一些根據使階級鬥爭加厲而成國內戰爭，那麼，你在說到「蘇維埃大會和立憲會議時」（我們所批評的新生活報上的時評，即以此為題），為何娓娓不絕的亂說「國內戰爭」呢？那是應該明顯的告訴讀者，并向他們證明：在客觀的條件下，沒有國內戰爭的基礎，所以應該以和平的，憲法上公開的司法的及國會的簡直的方法如蘇維埃大會及立憲會議之類，來作策略上的基礎。那時方能採取這種意見，以為這種大會，這種會議，實實在在可以解決難

題。

如果在目前的客觀條件下，國內戰爭的必然性或至少國內戰爭的可能性，正在醞釀成熟，如果你們關於國內戰爭不是信口胡說，而是清楚地看到，覺到，觸到國內戰爭的環境的存在；那麼這是你們怎麼可以把蘇維埃大會立憲會議，作為要事呢？這簡直是向饑餓困憊的羣衆開玩笑！難道，饑餓的羣衆，會答應『等待』兩個月嗎？或是經濟的破壞（連你們自己也每天指出破壞的擴大）會答應『等待』到蘇維埃大會或立憲會議召集的時候嗎？或是在我們毫不採取正當辦法以求和平的情形之下（即沒有正式向全體交戰人民，提議和平），德國人的進攻，會答應『等待』到蘇維埃大會或立憲會議召集的時候嗎？或是你們有這樣的事實，使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二月二十八日與九月三十日間，洶湧沸騰一日千里地發展起來的俄國革命，在十一月以後，直至十一月二十九號，一定會絕頂安靖地，和平地，規規矩矩地前進，而不會發生劇烈的爆發，突然的變動，軍事的失敗和經濟的恐慌？或是非布爾塞維克軍官杜巴索夫，以前敵名義正式聲明『不再作戰』的那種軍隊，會安定

受餓，吃苦到『規定』的日期？或是你們稱爲『無政府狀態』及『蹂躪行爲』的農民暴動，會因克倫斯基派遣『軍事力量』鎮壓農民，而不再成爲國內戰爭的原素？或是在農民國家裏，政府在壓迫農民暴動以後，能夠進行安靜的正直的非贗造的召集立憲會議的工作，而且，進行得有意義？

先生們，不要笑『斯摩爾尼學院』（卽是布爾塞維克中央所在地——譯者註）的慌張。你們的慌張，不較爲次。你們以慌張的辭句和窘迫的憲法的幻想，來回答可怕的國內戰爭的問題。這就是爲什麼我說：倘然布爾塞維克，陷入這種情緒中，那麼他們就要葬送自己的黨以及自己的革命。

本文作於九月之末；書後作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初。登載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二日的第一二兩號訓導
(Prosviashenie) 雜誌上。

論「全部政權歸於蘇維埃」的口號

一、半年以來布爾塞維克在革命中的全部工作，布爾塞維克的全部批評工作，（布爾塞維克批評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妥協行動，批評他們把蘇維埃轉為清談之所的行動），都要求布爾塞維克誠懇地按照馬克斯主義遵守這個口號；不幸在黨的上層份子中，表現出動搖情形，似乎「害怕」征取政權的爭鬥，而想以決議，抗議大會等等，來替這個鬥爭。

二、一九〇五年及一九一七年兩次革命的全部經驗，以及布爾塞維克黨的全部決議案與每年以來的政治聲明，都指示出，真正的工兵代表蘇維埃，祇是暴動的機關，祇是革命政權的機關。如無此種任務，則蘇維埃祇是空虛的玩物，不可避免的要引起羣衆的蔑視冷淡與絕望；重複無窮的決議和抗議，自然要使羣衆發生厭惡。

三、特別是現在，當國內興發農民暴動，而克倫斯基以精選的軍隊鎮壓他們之際，當鄉村中的軍事行動使立憲會議的選舉有被贗造的危險之際，當德國甚至發生

艦隊暴動之際，——當現在這樣的時候，布爾塞維克如果拒絕把蘇維埃轉為暴動的機關，那末他們就是叛賣農民，叛賣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事業。

四、蘇維埃奪取政權的任務，是勝利地進行暴動的任務。所以黨內最好的力量，都應該派到工廠中去軍營中去，向羣衆解釋其本身的任務，正確地估計他們的情緒，選擇推翻克倫斯基政府的正確的時機。

如果一定把這個任務和蘇維埃大會連絡起來，使這個任務，服從於蘇維埃大會，那麼這就是以暴動為兒戲，因為這樣就是預先規定暴動的日期，使政府可作軍事的準備，使羣衆陷入幻想之中，以為蘇維埃大會的決議案，可以解決那種祇有無產階級武力可以解決的問題。

五、應該向立憲的幻想以及對於蘇維埃大會的希望，進行爭鬥，應該放棄預存於心的『等待』蘇維埃大會的意見，應該集中全部力量向羣衆解釋暴動之必不可免，以及準備暴動的必要。在布爾塞維克手中，已有兩個首都的蘇維埃，現在布爾塞維克，如果放棄上述的任務，而允許克倫斯基政府召集立憲會議（即贗造立憲會議）

那麼，他們就要自己關於『政權歸於蘇維埃』口號的全部宣傳，都變成空辭，而在政治上使自己丟臉，使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丟臉。

六、現在布爾塞維克在莫斯科的選舉中獲得百分之四十九又二分之一的票數之時，當布爾塞維克因左派社會革命黨之助（此種幫助，事實上久已實現了）沒有困難地獲得大會多數人民的擁護之時，上述的話，尤其正確。

『政權歸蘇維埃』的決議案的附註：

『政權歸蘇維埃』的提綱，可以不必完全登載；但是如果拒絕在黨內討論，拒絕向羣衆解釋這樣急切和重要的問題（現在沒有完全出版的自由，可以討論這樣的問題，並且現在不能把這些問題提到敵人眼前），那麼這就等於喪失黨和無產階級先鋒的連繫。

作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初（一日至六日）

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彼

得格勒委員會及莫斯科委員會書

親愛的同志們：——

事實已經這樣明顯地把我們底任務告訴我們，使我們的遲延等待，等於「罪惡」。

農民運動正在發展起來，政府加緊野蠻的壓迫。軍隊對於我們的同情，正在增加（莫斯科百分之九十九的士兵是贊成我們的，芬蘭的軍隊和海軍，也是反對政府的；而杜伯索夫的宣言，也表示軍隊不願繼續戰爭）。

在德意志一方面呢，特別是從屠殺水手以後，革命的發動，已經是很明顯的了。在莫斯科底選舉中，百分之四十四的票數是屬於布爾塞維克黨人的，這是一個極大的勝利。要是和左派的社會革命黨人一起，那末，我們顯然是佔全國大多數。

鐵路和郵政局的職員和工人們，也在那裏同政府起衝突了。對於全俄蘇維埃代

表大會『李比爾，坦』們（即孟塞維克們，李比爾，坦是兩個孟塞維克派人，李比爾，坦合稱，即是孟塞維克派）已經不說十二月二十日的代表大會，而在說『二十日的代表大會』了（即是說沒有一定的月份）。

在這些情形之下如果再遲延等待，那便是一種罪惡了。

布爾塞維克黨人是沒有權利可以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他們必須立即奪取政權。唯有這樣去做，他們才能夠去挽救世界革命（因為不然，世界帝國主義者，特別是在德意志發生屠殺之後，就會聯合起來，一致向我們進攻）。唯有這樣去做，才能挽救俄國革命（因為不然，真正是無政府狀態的高潮，會比我們還要強大），唯有這樣才能救得前線上數十萬人民的性命。

等待更是罪惡。等待蘇維埃大會祇是幼稚的拘泥於虛禮的兒戲，也是空講禮節的兒戲。實際上這祇是背叛革命的行爲。

如果不經暴動，已不能奪取政權，那末，我們必須立刻開始暴動。但是如果此時莫斯科蘇維埃（同彼得格勒蘇維埃一致動作）立即獲取政權，宣佈自己爲政府，

那末很可能的我們或可以不經暴動而取得政權。在莫斯科方面，勝利是可以保證的，那邊不用對誰鬥爭。在彼得格勒方面，我們是能夠等待的。因為此時政府已無能為力，他已經是無可挽救，他總是要投降的。

莫斯科蘇維埃奪取了政權，佔領了銀行，工廠和俄國新聞（一種報紙）之後，他就得到極廣大的基礎和極強固的力量，他就可以煽動全俄羅斯，而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拿破崙式的克倫斯基退讓了（但是如果他不退讓，我們就要推翻他），那麼我們就立刻在明天提議和平。我們就可以立刻把土地交給農民，立刻可以對鐵路工人和郵務職員讓步……等等。

我們並不是一定要在彼得格勒『開始發動』。要是莫斯科一點不流血地『發動』起來，那末第一，前線上的軍隊一定會以同情來援助他，第二，各地農民也一定會起來影響他，第三，海軍及芬蘭的軍隊，將向彼得格勒進攻。

即使克倫斯基在彼得格勒附近還有一二個騎兵隊可供指揮，但他也是不得不服於我們的。彼得格勒的蘇維埃，可以等待，他可以為莫斯科的蘇維埃政府做暴動

工作。我們的口號是：政權歸蘇維埃；土地歸農民，給人民以和平；給餓殍以麵包。

勝利是有保障的，而且我們有十分之九的把握，可以滴血不流地獲得這個勝利。

如果遲延等待，那便是一種背叛革命的罪惡。

作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二十之間（舊曆三日至十七日）

列寧致敬

局外人的建議

我寫這幾行文字時，是在十月八號，要九號到彼得格勒同志的手中，恐怕是很難的，北方蘇維埃大會，在十月十號是要開的，所以我的文字，儘有遲到的可能。但是無論怎樣，我希望，在彼得格勒及別處工人兵士將要動作而尙未動作的時候，把我局外人的建議提出。

全部政權，應該轉給蘇維埃，這已是毫無問題，至於革命的無產階級政權（或布爾塞維克的政權——因為現在他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能夠得到全世界被剝削的勞苦羣衆極大的同情與堅決的幫助（特別是在交戰國中，尤其是在俄國農民中），這點在每個布爾塞維克看來，都是絲毫沒有疑慮的，關於這些，大家都知道，這是久已證明過的真理，不值得多說。

我所要說的，是同志還不完全明瞭的問題：即，現在要使政權轉入蘇維埃手中，就要在實際上實行武裝暴動，這好像是很明顯的，但是好些同志對於這點沒有

用心想過，而且現在還不用心去想。現在如果忘掉武裝暴動，那麼等於忘掉布爾塞維克主義最主要的口號（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等於忘掉整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

但是武裝暴動，是政治鬥爭的一種特殊形式，受一定的特殊規律的支配，我們對於這些規律，應該可以深思熟慮。關於這個道理，馬克思說得非常透澈明白。他說：『武裝暴動和戰爭一樣，是種藝術。』

此種藝術的主要法則，馬克思提出以下幾項：

一、無論何時，不要以暴動爲兒戲，應該堅決的知道，一旦暴動開始，就要做到盡頭（一不做，二不休）。

二、在千鈞一髮之際，一定要多集精銳於要塞，不然，組織較好訓練較良的敵軍，便會把暴動者消滅。

三、一旦暴動開始，就要採取最堅決的行動，要馬上毫不猶豫地採取攻勢。『守勢是武裝暴動的死亡』。

四、應乘敵人之不備而襲擊之，在敵軍尚未集中之時，乘機猛進。

五、軍事上每天應有進展，雖小不妨（如在城市中則每點鐘應有進展）。無論如何，一定要鼓勵士氣。

馬克思用歷史上革命戰略的大家但頓的話，來綜結一切革命武裝暴動的教訓：這便是「勇敢，勇敢，還要勇敢」。

如果把他應用到俄國，引用到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時候，那麼就是：最火速地最出其不意地來進攻彼得格勒，一定要內外同時夾攻，工人從工人區域中打出來，外面要從芬蘭，從利佛爾（Revel）從克龍斯坦特（Cronstadt）打進去；●再加上全體艦隊之進攻，並集中大批精銳，來撲滅一萬五千到二萬（或多些）的「資產階級自衛軍」（哥薩克之一部）等等。①

要善於運用我們三部主力：艦隊、工人、及軍隊。不管犧牲幾多，一定要先佔

① 參看彼得堡附近形勢圖。

② 凡台軍是法國革命時反革命的軍隊。

據電話局，電報局，火車站與橋梁。

挑選最堅決的分子（如我們的敢死隊的青年工人，以及海軍兵士）組織小的隊伍，去佔據最扼要的地點，參加各處緊要的軍事行動。例如：

要使艦隊、工人、及軍隊聯合攻擊彼得格勒，加以圍困，並截斷外援，以奪取城市——這個任務，需要藝術及三倍的勇敢。

要把最好的工人，組成小隊，帶着槍枝及炸彈，去圍攻敵人之「中心地」。

（如士官學校，電報局，電話局及其他。）

我們的口號是：我們寧可死完，但不能放走敵人。如果決定暴動，那麼我們希望暴動的指導者，能把但頓，馬克思兩人偉大的指示，好好的應用。俄國及全世界革命的成功與失敗，就要取決於這兩三天的鬥爭中。

作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八號

致同志書

同志們：現在我們所處的時期，這樣的緊急，事變的進行，這樣的迅速，使爲境遇所迫而不得不離開歷史事變的主要軌道底輿論家，常有過時與消息不靈的危險，特別是他的作品遲些發表的時候。我明知這點，雖然我的信有完全不在報上發表的危險，可是我總不能不以此信致布爾塞維克黨人，因爲某些同志的搖動，真是罕見罕聞，他可以給黨、給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給革命以致命的打擊；所以我（以爲我的責任）卽在於用最堅決的態度，反對此種搖動。至於適時與否，那麼我爲預防起見，將指出我所應指是那一天那一種的消息。

僅在十月十六日，星期一早晨，我方才遇到曾經在彼得堡參加過非常重要的布爾塞維克會議的那一位同志，他極詳盡地把討論的情形，告訴了我。在這會議上面，也討論了各派報紙在星期日所討論的那個暴動問題。在會議上，到了首都各方面工人上的最有影響的布爾塞維克代表。祇有極小的少數，就是說祇有兩位同志

（即齊諾維也夫與卡米尼夫——譯者註），對於暴動問題採取反對的態度。他們所舉的理由，極不充足，這些理由，祇顯明地表現出他們喪失了布爾塞維克的基本思想及革命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而進退維谷，驚慌失措；不然，就無從解釋這樣可恥的動搖。

但是事實擺在目前；革命的政黨，在這樣嚴重的問題上，絕對不能容忍動搖，這兩個喪失原則的同志，可以引起某種紛擾，所以就應該考究這些理由，顯露他們的動搖，指出這些動搖是何等的可恥。以下文字即在企圖完成這個任務。

「……我們沒有大多數人民的擁護，如果沒有這個條件，那末暴動是沒有希望的。」

能說這樣話的人，或是曲解真理，或是像學究先生那樣絲毫不顧革命的實際狀況，而無論如何總想預先得擔保，使布爾塞維克黨剛剛在全國得到百分之五十一的票數。在歷史上，無論在那個革命中，都不會有這樣的擔保。而且也不能有這樣的擔保。提出這種要求，等於嘲笑聽衆，這正是想遮掩自己與實際情形「背道而馳」的行動。

實際情形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大多數人民正是在七月事變以後，方迅速地轉到布爾塞維克一方面來。康尼洛夫叛變以後八月二十號的彼得堡的選舉，說明這點在這次選舉中，布爾塞維克票數的百分數，不算城外，祇算城內，就已從百分之二十增至百分之三十三；莫斯科區會議的選舉，也證明這點，布爾塞維克票數的百分比，從百分之十一增至百分之四十九又三分之一（日前所遇到的一位莫斯科同志，告訴我正確的統計是百分之五十一）蘇維埃的選舉證明這點。大多數農民蘇維埃掉首不顧「阿夫克生且也夫」的中央委員會的意見，而起來反對合作政策。反對合作政策，就是實際上贊成布爾塞維克。再次，前線上的消息，更不絕地確定地指示出兵士羣衆，不管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首領、軍官、代表等等，如何刻毒地謾罵攻擊，總是更加堅決地轉到布爾塞維克一方面來。

最後，近來俄國國內最大的事變，是農民的暴動。這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事實上指示出人民轉到布爾塞維克一方面來，無論資產階級報紙怎樣造謠，無論他的附和者「搖擺不定」的新生活派先生們，怎樣高呼蹂躪運動和無政府狀態，但是事實

擺在目前。但包夫省的農民運動，不僅是具有外表的暴動，而且還是含有政治意義的暴動，這暴動產生非常重大的政治效果，例如第一，他們得到了土地轉交農民的允許。無怪爲暴動所嚇怕的社會革命飯桶，直至人民事業報爲止，現在哀呼土地必須轉交農民！這就是在實際上已經證實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正確，及其勝利。所以我們看到除了暴動以外，再不能有別的方法，可以「教訓」拿破崙之徒及其國會預備會中的走狗。

這是事實，事實是再爽直不過的東西。這種事實上的贊成暴動的理由，勝於驚惶失措進退維谷的政客數千句「悲觀」論調。

如果農民暴動，不是含有全國政治意義的事變，那麼國會預備會中的社會革命黨走狗，或許就不會高呼土地轉與農民的必要。

農民暴動的另一個極好的政治與革命的結果，如工人之路報所說的，是轉運麵包到但包夫省的火車站上來。請看，驚惶失措的先生們，這就是另一個理由，贊成暴動的理由，指出暴動是挽救國家出於已在目前的空前飢荒與經濟危機底唯一辦

法。當叛賣人民的社會主義黨及孟塞維克，呻吟，恐嚇，起草決議案，空口允許以召集立憲會議的方法來果俄殍之腹的時候，民衆已經起來按照布爾塞維克路線，用反對地主，資本家，投機商等等的暴動，來解決麵包問題了。

就是資產階級報紙，甚至俄羅斯民意報，也不得不承認這樣解決問題的辦法（唯一的實際解決辦法）產生極好的效果，俄羅斯民意報登載這樣消息，說在農民暴動起來以後，但包夫省車站堆滿了麵包。

現在如果還懷疑大多數人民是否贊成布爾塞維克，那麼等於可恥地動搖不定，而在實際上拋棄一切無產階級革命的原則，完全脫離布爾塞維克主義。

『……我們的力量，還不够奪取政權，資產階級力量還不够破壞立憲……』

這個理由的第一部僅是重複上述的理由。這個理由，並不有力，並不可信，他們對於資產階級的慌張與驚恐，致使他們對於無產階級採取悲觀態度，而對於資產階級却採取了樂觀態度，假使貴族軍官與哥薩克兵說他們將反對布爾塞維克到最後一滴血為止。那麼這話是可以完全相信的；倘然工人兵士在成千成百的會議上，對

擺在目前。但包夫省的農民運動，不僅是具有外表的暴動，而且還是含有政治意義的暴動，這暴動產生非常重大的政治效果，例如第一，他們得到了土地轉交農民的允許。無怪為暴動所嚇怕的社會革命飯桶，直至人民事業報為止，現在哀呼土地必須轉交農民！這就是在實際上已經證實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正確，及其勝利。所以我們看到除了暴動以外，再不能有別的方法，可以『教訓』拿破崙之徒及其國會預備會中的走狗。

這是事實，事實是再爽直不過的東西。這種事實上的贊成暴動的理由，勝於驚惶失措進退維谷的政客數千句『悲觀』論調。

如果農民暴動，不是含有全國政治意義的事變，那麼國會預備會中的社會革命黨走狗，或許就不會高呼土地轉與農民的必要。

農民暴動的另一個極好的政治與革命的結果，如工人之路報所說的，是轉運麵包到但包夫省的火車站上來。請看，驚惶失措的先生們，這就是另一個理由，贊成暴動的理由，指出暴動是挽救國家出於已在目前的空前飢荒與經濟危機底唯一辦

法。當叛賣人民的社會主義黨及孟塞維克，呻吟，恐嚇，起草決議案，空口允許以召集立憲會議的方法來果餓殍之腹的時候，民衆已經起來按照布爾塞維克路線，用反對地主，資本家，投機商等等的暴動，來解決麵包問題了。

就是資產階級報紙，甚至俄羅斯民意報，也不得不承認這樣解決問題的辦法（唯一的實際解決辦法）產生極好的效果，俄羅斯民意報登載這樣消息，說在農民暴動起來以後，但包夫省車站堆滿了麵包。

現在如果還懷疑大多數人民是否贊成布爾塞維克，那麼等於可恥地動搖不定，而在實際上拋棄一切無產階級革命的原則，完全脫離布爾塞維克主義。

『……我們的力量，還不够奪取政權，資產階級力量還不够破壞立憲……』

這個理由的第一部僅是重複上述的理由。這個理由，並不有力，並不可信，他們對於資產階級的慌張與驚恐，致使他們對於無產階級採取悲觀態度，而對於資產階級却採取了樂觀態度，假使貴族軍官與哥薩克兵說他們將反對布爾塞維克到最後一滴血為止。那麼這話是可以完全相信的；倘然工人兵士在成千成百的會議上，對

他不得不說到這個地步，因為拒絕暴動，就是拒絕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自然，口號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爲什麼沒有一個人提起變更這個口號的問題（像我在七月事變後提出這個問題一樣）？爲什麼害怕公開的說；雖然自九月以來，黨內已討論暴動的問題，因暴動已是實施『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時所不可避免的辦法了。

我們可憐的悲觀主義者，永不能有轉圓的餘地了。拒絕暴動就是拒絕把政權轉交蘇維埃，就是把全部希望，付諸『允許』召集立憲會議的好意的資產階級。

在蘇維埃政權之下，立憲會議是有保證的，他的成功，也是有保證的，這難道是難懂的事嗎？布爾塞維克，已經千百次的說到這點。沒有一人企圖過推翻這點。大家都承認了這個『混合的形式』，但是現時在『混合形式』的名詞下，隱藏着拒絕爲蘇維埃獲得政權的行動。祕密的隱藏着這種行動，而害怕公開脫離我們的口號，——這是一個什麼樣子呢？可否搜羅國會內的辭句，來形容他呢？

我們可以確定的給我們的悲觀主義者，以下的回答：你們所說的手槍，是不

是沒有子彈的呢？

如果是沒有子彈的，那麼你們就簡直投奔於李比爾，坦等等的麾下，因為他們也千百次地宣佈蘇維埃爲『手槍』，而千百次地欺騙了羣衆，因為在他們統治之下，蘇維埃的作用僅等於零。

倘然手槍要『有子彈』，那麼這就是說要在技術上準備暴動，因為子彈要設法獲得，手槍應該裝藥，而且一個子彈是絕對不夠。

或是投奔李比爾，坦，而公開放棄『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或是暴動。折衷的地位是沒有的。

『……雖然羅薦科想放棄彼得堡給德國人，可是資產階級無力幹這種事，因為作戰的不是資產階級，而是我們英勇的海軍士兵……』

這個理由，又是表現對於資產階級太抱樂觀了，悲觀主義者在講到革命力量與無產階級能力時，對於資產階級總是抱這樣樂觀主義的。

作戰是英勇的海軍士兵，可是這點並不妨礙兩個海軍上將在奪取愛才兒之前，

逃避藏匿！

這是事實，事實是再爽直不過的東西。事實證明將軍們之善於叛賣，不亞於康尼洛夫。軍營還是照舊，軍官還是康尼洛夫之徒，這是無疑的事實。

假使康尼洛夫之徒（以克倫斯基爲首，因克倫斯基也是康尼洛夫派），要放棄彼得堡，那麼他們能夠以兩種方法甚至以「三種方法」來幹這件事情。

第一，康尼洛夫派的軍官，可以叛賣，而放開北方的陸路的戰線。

第二，他們可以進行讓德國全部艦隊自由行動的談判，德國艦隊，是強過我們的；他們可以和德國和英國的帝國主義者商量。此外，「逃避的上將」，又可以把軍事計劃奉送德人。

第三，他們關閉工廠，他們在運送麵包上怠工，他們以此方法可以使我們的軍隊達到完全絕望完全無力的地步。

在這三條道路之中，沒有一條可以否認。事實已經證明，俄國資產階級的哥薩克式的政黨，已經敲過這三頭門，他想敲開這些門。

所以？所以我們不能等待資產階級來壓倒革命。

羅薦科的『志願』，不是空話，他已由經驗證明。羅薦科是實實在在做事的人。在羅薦科後面，站着資產階級。這是毫無疑義的。在無產階級還未獲取政權時，資本是種力量。羅薦科深信不疑地進行資產階級的政策，已經十數年了。

所以？所以在唯一挽救革命的辦法上，暴動的問題上發生動搖，就是一半陷入李比爾，坦，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等等膽小如鼠的對於資產階級的信仰之中，他一半陷入『鄉農』的不自覺的信仰之中；布爾塞維克是堅決地反對這種信仰的。

或是把無用之手，置於空虛的胸，虔誠禱告立憲會議，而等待羅薦科放棄彼得堡，鎮壓革命，——或是暴動。折衷的地位是沒有的。

就是召集立憲會議，單獨召集立憲會議，也不能產生任何的變更，就是任何最有權力的會議的任何法令與任何表決，也都不能補救饑荒，抵禦德皇威廉。立憲會議的召集及其成功，依靠於政權是否轉入蘇維埃手中；這個舊的布爾塞維克的真理，已經更明顯地尖刻地由實際情形證明了。

「我們力量逐日增加，我們在立憲會議中，可成有力的反對派，這是易如反掌的。」這是庸夫俗子的理由，他們看到，立憲會議將要召集，於是就在最公開的，忠耿的，立憲的道路上，安靜下來了。

僅僅可惜，等候立憲會議，不能解決麵包問題，也不能解決放棄彼得堡的問題。幼稚的慌張失措的或是飽受驚恐的人，正是忘記了這點。

饑荒是不等候的。農民暴動，不會等候。戰爭也是不等候的。逃匿的上將，也同樣不會等候。

如果我們布爾塞維克宣佈相信立憲會議的召集，難道饑荒就會因此而答應等待嗎？難道逃匿的上將們就會因此而答應等待嗎？難道馬克拉哭夫與羅薦科之徒，就會因之而答應停止閉廠，停止對運送麵包怠工，停止和英、德帝國主義者進行秘密的談判嗎？

傳染「立憲幻想」患着「國會白癡病」的英雄們的意見，就是如此。於是靈動的生活，被丟去了，所剩下的，祇是召集立憲會議的空紙，及選舉。

盲目的人，還以為餓俄的民衆以及被軍官及上將們叛賣的士兵，這樣冷淡地對付選舉，是令人奇怪！啊，真是怪物！

『……假使康尼洛夫之流再起來時，那麼我們就可表顯我們的好身手！我們何必自己動手，我們何必冒這種險呢？……』

這點看來好似非常可信，非常革命。歷史不再重複；假使我們回溯一下，觀察第一次康尼洛夫事變，而堅定地說：『康尼洛夫派假使再起來，請看……』，如果我們這樣的做法，這是何等超羣絕倫的革命戰略！此種戰略，何其像『看罷，總有法子想的罷』這句老話！或許康尼洛夫派仍舊不在適當的時候發動。這是何等有力的理由呵，這是何等嚴重的無產階級政策的根據？

倘然第二批的康尼洛夫派，得到了一些教訓呢？倘然他們等到餓殍騷亂，前線衝破，彼得格勒放棄以後，才發動呢？那時怎樣呢？

那些人向我們提議把無產階級政黨的策略建築在可能的康尼洛夫輩重犯舊時錯誤的觀察之上！

忘了布爾塞維克千百次地所指出和證明的話，忘了我們革命的半年歷史所證明的話：就是除了康尼洛夫輩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以外，再沒有別的道路，客觀上沒有而且也不會有別的道路，忘了這點，完全遺棄這點，而往前等候！等候什麼？等候怪事：怪事即在於四月二十日至八月二十九日間的洶湧險惡的奔流前進的事變，（在延長戰爭，增長饑荒的條件！）將由和平的安靜的順利的公開的立憲會議的召集來代替，將由立憲會議實行最合法的決議案的情形來代替：看，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策略。餓殍們，等候着罷，克倫斯基允許召集立憲會議！

『……實在說來，在國際形勢上，沒有逼迫我們立刻起來發動的條件，假使我們開頭衝鋒，那麼我們還是妨礙西歐社會主義革命的事業……』

這個理由，實在妙極了：就是謝德曼（德國社會民主黨首領）萊諾台爾（法國社會民主黨首領）自己，也不能比較他們更加巧妙地來『利用』工人對於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情！

試想一下：德國人在絕頂困難的條件下，祇有一個李卜克內西（而且他還在作

苦工），沒有報紙沒有集會自由，沒有蘇維埃，在全體階級，直至最後一個殷實農民，都對國際主義思想恨入骨髓的條件之下，在帝國主義大小中資產階級的嚴格組織之下，而德國的國際主義革命者，穿着海軍制服的工人，尙且在艦隊上發生暴動。——其勝利機會實祇千百分之一。

我們呢？我們有數十報紙，集會自由，在蘇維埃中占據大多數，我們是世界上境遇最好的國際主義者，而我們却拒絕用我們的暴動，來幫助德國的革命者。我們將如謝德曼與萊諾台爾那樣，空空的辯論，最好是不要暴動，因為倘然我們死於槍下，那末世界就失去這樣好的這樣智慧的這樣合於理想的國際主義者！

證明自己的智慧。通過對於德國暴動者表示同情的決議案，而拒絕在俄國舉行暴動。這算是真正的智慧的國際主義。假使這種稀奇的政策，到處得到勝利，那麼國際主義，將蓬勃滋長到什麼地步……

戰爭使各國的工人顛連死亡，使其痛苦達於極點。意大利，德國及奧大利等國內的亂事，接踵而起。唯有我們有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如果我們枯待，那末我

們就要叛賣德國國際主義者，遂像我們要叛賣俄國農民一樣；我們不是在口頭上，而是應該事實上，以反對地主的暴動，以反對克倫斯基政府的暴動……（文句未完——譯者）

讓帝國主義資本家們的陰謀的雲翳，匯集起來罷，他們正在準備撲滅俄國的革命——而我們却鎮靜地等待着，使盧布的力量，能夠撲滅我們。不起來求兵工蘇維埃的勝利，以進攻陰謀犯，衝破他們的隊伍，而希望克倫斯基及羅薦科誠實地召集立憲會議，等候憲法會議，使在其中，可以用投票的方法，戰勝國際的陰謀。我們有否權利，可以懷疑克倫斯基及羅薦科輩之誠實？

『「全體」都反對我們！我們處孤立地位。蘇維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那時蘇維埃中央，尚為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占據）孟塞維克的國際主義派，新生活派，及左派革命黨都發表過並且正在發表宣言。反對我們。……』

何其有力的理由。我們直到現在總是殘酷地攻擊動搖者的動搖態度。我們在這上面，獲得了民衆的同情。我們在這上面征取蘇維埃；沒有蘇維埃，暴動是不能希

望地迅速地，確定地進行的。現在我們利用已經取得的蘇維埃，而自己轉到動搖的營壘中去。這是何等超羣的布爾塞維克的履歷啊！

李比爾，坦，邱爾諾夫，左派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等等的政策的實質，即是在於動搖。左派社會革命黨及孟塞維克國際主義者，指出羣衆的左傾，在這點上，他們是有巨大的政治意義的。一方面百分之四十的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轉到左派方面來，他方面有農民的暴動，這二件事實，是無疑地顯明地互相連繫着的。

這種連繫的性質，揭破他們的不堪言狀的毫無氣節，他們看到腐朽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與動搖的左派社會革命黨，反對我們，於是就想涕泣起來。我們應該把農民的暴動與小資產階級首領馬爾托夫，肯柯夫，蘇漢諾夫流的動搖對照起來。這是實際的政治的對照。和那個一塊兒前進呢？少數彼得堡首領祇是間接地表現羣衆的左傾，他們在每個政治的轉變上，總是可恥地涕泣，動搖，奔着向李比爾，坦，及柯夫克生替也夫之輩討饒；現在我們應和這些動搖的少數彼得堡領袖一起呢，還是和這些左傾的羣衆一起呢？

問題祇是如此。

當馬爾托夫，肯柯夫，蘇漢諾夫之輩叛賣農民暴動時，有人向我們革命國際主義者的工人政黨提議，說我們也要去叛賣農民暴動。看，對左派社會革命黨及孟塞維克國際主義派『垂首低頭』的政策，會得何種結果。

我們說過，要幫助動搖的人，先要自己不搖動。這些『親愛的』左派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動搖起來而贊成合作政策！我們因自己不動搖，所以結果能夠帶住他們走。

實際的生活，已給我們證明。

這些先生們的動搖，能永遠的斷送革命。祇有我們救起了他們。現在當饑荒已在彼得堡門外，羅薦科之徒準備放棄彼得堡的時候，我們是否也要挽救他們？

『……但是我們甚至對於鐵路工人和郵務工人，也沒有堅固的連繫。他們的正式代表——是拍拉松之流（妥協派）。沒有郵政和鐵路，能否勝利呢？……』

是的，是的，此處是拍拉松，這邊又是李比爾，坦，羣衆給他們以何種信仰

呢？不是我們常時證明這些首領，叛賣羣衆嗎？在莫斯科的選舉及蘇維埃的選舉中，羣衆不是脫離這些首領而轉向我們方面來嗎？難道鐵路及郵務上的工人羣衆不在受餓，不在舉行反對克倫斯基之流的罷工？

一位悲觀主義的同志問道：在二月二十八號以前，我們對於這些工會有無連繫呢？在回答時，有人指出二個革命不能相比。但是這種回答，祇加強問者的地位。因為布爾塞維克千百次地說過，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該應有長期的準備（說了以後，不應在緊急關頭之前夜，加以遺忘）郵務電政工會及鐵路工會的政治經濟生活底特點，即是在於無產階級等羣衆，與上層小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分子脫離開來。事情并不在於預先一定要準備好對於某個工會的連繫，而是在於祇有無產階級及農民暴動的勝利，方能使鐵路及郵務電政的工人羣衆，得到滿足。

『……在彼得堡麵包祇够二三天之用。我們能否給暴動者以麵包呢？……』

這是千百種疑惑不定的意見之一（疑心家永是『懷疑』，除經驗以外再無別的東西，可以推翻他們的意見），這種意見，從有病的頭腦裏，傳染到健康的頭腦中

來了。

正是羅薦科之輩，正是資產階級，準備着饑荒，企圖以饑荒撲滅革命。除了鄉村中農民反對地主的暴動，及城市中首都裏工人對於資本家的勝利以外，再沒有，而且也不會有別的補救饑荒的辦法。不是如此，就決不能從富人那裏獲得麵包，就決不能打倒他們的怠工，而輸出麵包，就決不能壓倒被收買的職員與坐獲重利的資本家們之反抗。糧食機關及『民主派』的食糧恐慌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點，民主派已幾百萬次的埋怨資本家的怠工，涕泣着，哀求着。

在世界上。除了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力量以外，再沒有別的力量，可以不用埋怨、哀求、和涕泣的方法，而直接進行革命的事業。無產階級革命，拖延得愈久，革命的事變，延期得愈久，動搖者慌張失措者的動搖，延長得愈久，那麼他的犧牲，也將愈多，轉運及分配麵包問題的解決，也將愈加困難。

延宕暴動，等於就死，——這就是我們對於那些人的回答，這些人居然有這樣可憐的（勁力），看着饑荒的蒞臨而勸告工人不要暴動（就是說勸告他們等待着，

而且希望着資產階級)。

『……在前敵上，也沒有什麼危險。假使兵士自己互相休戰起來，那末這也不是什麼壞事……』

但是士兵，不能講和，要講和就必須有國家的政權；可是不經暴動，政權是不能獲得的。兵士祇是簡單的逃奔（開小差）。前敵的報告，說到這點。假使不願幫助羅薦科與德皇威廉之間的陰謀的談判，不願促成經濟上的完全破壞與兵士的四散奔逃，那末就絕對不許等候下去；因為兵士如果到了完全絕望（已近於絕望了）一切付之天命之際，那末他們是要四散奔逃的。

『……如果我們獲取政權，而得不到休戰與民主的和平，那末兵士或許不願作革命的鬥爭，那時怎麼辦呢？』

這個理由，使我們記起一句成語：一個呆子所提的問題，能夠比較十個聰明人

可能答覆的還要多。

我們永沒有否認過帝國主義戰爭時期掌握政權的困難，可是我們總是宣傳無產階級與貧農的專政。難道當行動的時期來到之時，我們就引身迴避麼？

我們當時說過，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國際形勢，國內經濟，軍隊狀況，兵士情緒等等上面，都引起非常大的變更——現在我們却害怕革命的『困難』，而完全忘記這些？

*

*

*

「在羣衆中，沒有像許多人所說的要衝出到街道上來的那種情緒。鼓吹蹂躪運動的黑幫的報章，銷行更廣，這點也是可爲悲觀主義辯護的事實……」

當那些人爲資產階級所嚇倒時，那麼自然在他們看來，什麼東西與現象，都裝上了黃的顏色。第一，他們以知識分子映象主義的標準，來代替馬克斯主義的活動的標準，他們以主觀的對於情緒的映象，來代替對於國內及世界上全部階級鬥爭變化的政治分析；黨的堅定的路線，他的不屈不撓的決心，也是情緒中的一個原素，

特別是在最緊張的革命時期，關於這點，他們簡直遺忘了。有時那些人「簡直」忘記，負責的領導者的動搖與退讓，將毀滅他們以前所敬禮的事業，並在某部分羣衆中引起最不好的動搖。

第二，（在現時，這是最主要的）在講到羣衆的情緒時，毫無氣節的人，忘記了補充：

——「大家」都說羣衆的情緒是集中的，是取期待的形勢的；

——「大家」都說，在蘇維埃的號召之下，爲保護蘇維埃的起見，工人同聲一致，有如一人的，出來行動；

——大家都同意於這種意見，即，工人非常不滿意「最後堅決戰爭」的問題上中央所取的不堅決態度，此種戰爭之不可避免，已明顯地感覺到了；

——「大家」都同聲一致地說廣大羣衆的情緒，近於絕望，並且指出，因此發生無政府現象的事實；

——「大家」也都承認，在覺悟的工人中，有些不願意僅爲遊行，僅爲部分的

爭鬥，出到街道上來，因為在大空之中已高懸着將要來到的整個的而非部分的戰爭，他們已經充分經過充分覺悟到單獨罷工和遊行之無望。

諸如此類等等。

假使我們根據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全部發展以及半年以來我們革命事變的全部進程，去分析這種羣衆情緒的特點，那麼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那些爲資產階級所嚇倒的人，怎樣把事實說得改頭換面。現在事情，不像四月二十一——二十一號，六月九號，七月三號等日以前的那樣，因為那時祇有自發的衝動，我們的黨，對於這種衝動，或是沒有掌握住（四月二十），或是可以約束而把他轉成和平的遊行（六月九號，及七月三號）。因為那時我們知道得很清楚，蘇維埃那時還不是我們的，農民還相信李比爾，坦，邱爾諾夫等的路線，而不相信布爾塞維克的路綫（暴動），所以布爾塞維克不能有大多數人民的贊助，所以暴動過早。

那時在大多數覺悟的工人中，甚至還沒有發生作最後堅決的鬥爭底問題；在黨的機關中，還沒有一處提出這個問題。少有覺悟的廣大的羣衆，還沒有拚死命的決

心，那時祇有自發的衝動，那時還幼稚地希望以簡單的『示威運動』，簡單的遊行，來影響克倫斯基與資產階級。

暴動所需要的不是這些；暴動在一方面需要覺悟的成份，應有不屈不撓的鬥爭到底的決心；在他方面需要廣大羣衆中間的集中的與拚命的情緒，他們感覺到半途中止的辦法，不能挽救現狀，感覺到去影響當局，影響不了；感覺到布爾塞維克如果不能在堅決的鬥爭中，領導他們，那麼餓殍甚至能以無政府的方法，扯碎一切，打破一切。

革命的發展，就是在實際上使工人及農民進到那種地步，即是：一方面，覺悟成份，受經驗的教訓而集中起來，他方面廣大羣衆對於閉廠的廠主，及資本家，發生近於拚命的仇恨情緒；革命的發展，使這兩種情形，連結起來了。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方才可以明了爲什麼黑幫報章上假冒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混蛋，能有這樣大的成功。黑幫反動派在看到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堅決鬥爭即將瀕臨之時，幸災樂禍的了不得，這點從來就是如此，這點在無論那種革命中，都可

以看到，這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如果讓自己爲這種情形所嚇倒，那麼不但應該放棄暴動，並且應該一般的放棄無產階級革命。因爲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無不引起黑幫的幸災樂禍之心，無不引起他們殺氣騰騰的希望。

覺悟的工人很清楚的知道，黑幫是和資產階級手攜手地工作着的，工人的堅決勝利（小資產階級份子，不相信這種勝利，資本家害怕這種勝利，而黑幫則有時因幸災樂禍之故，反希望這種勝利，因他們相信，布爾塞維克不能維持政權），這種工人的堅決勝利，將把黑幫撲滅淨盡。布爾塞維克將能堅固地保持政權，而爲全體受戰爭的痛苦與殘殺的人類，謀最大的利益。

實在說來，那一個沒有發狂的人，還會懷疑羅薦科和蘇伏林是在一起工作，還會懷疑他們是在分工合作？

事實不是已經說明克倫斯基按照羅薦科的號令而行動，而『俄羅斯共和國的國家印刷處』（不說笑話），却由國家出費，來印刷『國會』中黑幫的反動演說。甚至爲走狗作走狗的人民事業報，不是他揭破了這件事實嗎？難道全部選舉的經

驗，不是證明新時代報，賣身的費紙，以及爲沙皇地主利益所指揮的報紙，完全擁護立憲民主黨的候補名單嗎？

難道我們昨天沒有看到，工商業資產階級（自然是無黨派的呵，顯然是無黨派的，因爲維黑諒也夫，拉幾特尼柯夫，格服士及夫，尼幾金之流，不是和立憲民主黨聯合，而是與無黨派的工商業界聯合呵）給了立憲民主黨三十萬盧布？

假使不從情感的觀點上去看，而從階級的觀點去看，那麼全部黑幫的報紙，都是『諒步與斯基，密留柯夫公司』的支店，資產階級一方面收買密留柯夫，斯拉夫斯基，波特列索夫等等，他方面收買黑幫。

除了無產階級的勝利以外，再沒有別種辦法，可以清除這種毒害人民的黑幫的廉價毒藥。

因饑荒及戰爭的延長而顛連死亡的羣衆，『追蹤』於黑幫的毒藥之後，這難道是可以奇怪的嗎？難道在資本主義社會瀕臨末日之際，被壓迫羣衆之中沒有失望的情緒嗎？在羣衆之中，不少昏闇的成分，羣衆的失望，能否不表現於任何毒藥的銷

路的增加呢？

這些人在講到羣衆的情緒時，把自己個人的毫無氣節的心理，推到羣衆身上。將羣衆分爲二部分，一部分自覺地採取等候的態度，他部分不自覺地準備陷入失望的情緒之中；可是被壓迫和受餓的羣衆，決不是沒有氣節的。

*

*

*

『從他方面說來，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不能把暴動的問題，看作軍事陰謀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是非常深刻的各方面的學說。所以脫離馬克思主義的人，常可摘引馬克思書籍中的斷章片義（特別是無頭無腦地摘引他），作爲自己的理由。假使舉行軍事陰謀的，不是一定的階級的政黨，使假他的（軍事陰謀的）學行者，一般的沒有估計到政治的現狀，特別是國際的政治現狀，假使在這個政黨一方面，沒有經過客觀事實證明的大多數人民的同情，假使革命事變的發展，沒有在實際上消滅小資產階級的妥協派的幻想，假使大部分公認其有『全權』的或採取其他形式的革命鬥爭機關，如『蘇維埃』之類，沒有被這個政黨所征取，假使在軍隊中（當事變發

生於戰爭之時）還沒有充分成熟的反對政府的情緒（政府反對人民意志，延宕不公平的戰爭），假使暴動的口號（如『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土地歸農民』『立刻取消祕密條約及祕密外交，同時并立刻向交戰國提議民主的和平』等等）不爲人們所共知共聞，假使先進的工人，不相信羣衆的絕望情形及鄉村的幫助（此種幫助，由農民運動，或反對地主反對保護地主的政府底暴動證明出來了），假使國內的經濟狀況，可以產生嚴重的希望，希望恐慌可由和平的國會制度的方法，來滿意地解決；假使如上述那樣，那麼軍事的陰謀，確是布朗基主義。

或許夠了罷？

在我的布爾塞維克能否維持政權？的小冊子上（我希望他不日可以出版），我摘引了馬克思的話，這話真正說及暴動問題并且規定暴動的表記，是種『藝術』。

我可以打賭：假使讓那些現時在俄國高呼軍事陰謀的胡說者，放開嘴巴，去解釋武裝暴動的藝術與值得痛駁的軍事陰謀二者之間的區別，那麼他們是或是重複上面所說的話，或是在自己面上，塗上鬼臉而引起工人的大笑。可愛的有名馬克思主

義者的先生們，請試一試罷！請給我們唱一曲反對『軍事陰謀』的好歌。

書後

在上述文字已經寫好後，我方在星期二晚八時收到彼得堡的早晨的報紙，在新生活報上，登載着巴札洛夫的文章。巴札洛夫君確定的說，『城市中正在散發抄寫的傳單，該傳單以兩個出名的布爾塞維克的名義，反對暴動。』

倘然這是真確的話，那麼我請求接到此信的同志（他們最早，僅能在星期三早晨接到）趕快把他發表。

這封信並不是爲報館而作的，他僅是爲着和黨內同志們在信札上討論而作的。但是假使不屬於我黨的而其毫無氣節的態度又千百次地受我黨嘲笑的那些新生活報底英雄們（他們大前天舉手贊成布爾塞維克，昨天又贊成孟塞維克，並且在全球有名的統一大會上，幾乎聯合了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假使這些人物，接到我黨黨員宣傳反對暴動的傳單，那末我們再不能緘口不言了。讓匿名的人，完全顯露於

光天化日之下，而領受他們在可恥的動搖之後所應受的處罰，至少也要受全體覺悟工人的訕笑。在此信未發出到彼得堡去以前，我還有一點鐘的時間，所以祇以兩句話指出可憐的沒有頭腦的『新生活派』英雄底一種『手段』。梁尚諾夫同志，說得正確到一千分，他說：『正是那些在羣衆中造成失望與冷淡心理的人們，給暴動作了準備』，而巴札洛夫君，却想與梁尚諾夫同志爭辯。

可憐事業中可憐英雄，『反對』道：

『難道失望與冷淡，曾經得到勝利嗎？』

哈，新生活報上的傲慢的呆子！他們在歷史上有否看到過這樣的暴動的份子，說被壓迫階級的羣衆，在未被長期的痛苦及各種極端緊張的恐慌弄到絕望地方之際，就能在拚命的鬥爭中，獲得勝利，或者說這些羣衆，沒有對走狗式的國會準備會，沒有對空虛的以革命爲兒戲的舉動，沒有對李比爾，坦等把蘇維埃從政權的機關降爲清談之所底舉動，採取冷淡的態度。

或許新生活報上的傲慢的呆子，發現羣衆對於麵包問題，延宕戰爭的問題，土

地歸於農民的問題，採取冷淡的態度呢。

列寧

作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十七、二日。發表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的工人之路報
上（第四〇，四一，四二，三號）。



論十月革命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彼得堡工兵代表蘇維埃之演辭——

同志們！布爾塞維克黨所不斷鼓吹，認為非常必要的工農的革命，現在已經完成了。

這個工農的革命，到底有什麼意義呢？這次革命的最大的意義，首先就在於我們組織了蘇維埃政府，這是我們自己的政權機關，沒有資產階級的任何參加。被壓迫的羣衆自己創造政權。一切舊的國家機關，都要徹底剷除，我們建立蘇維埃的組織，來作管理國家的新工具。

從今以後，在俄國歷史上展開了一個新時代，這第三次革命的結果，一定能得到社會主義的利勝。

趕快消滅戰爭，是我們切身的任務之一。但是此種戰爭，是密切地和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相連的，因此要消滅戰爭，一定要克服資本主義本身。

在這件事業上，全世界的工人的運動，將會幫助我們，此種運動，已在英德意各國中開始發展。

我們對於國際民主派所提的迅速的公正的和平，將在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羣衆中，到處得到熱烈的響應。爲鞏固無產階級的這種信仰起見，我們必須立刻公佈一切祕密條約。

俄國大部分農民都說：夠了，和資本家玩得夠了，以後我們將和工人一塊兒前進。我們以一道命令取消地主的私產之後，便可以在農民中獲得信仰。農民將懂得，祇有和工人聯合，他們方能得救。我們創立工人對於生產的真正監督權。現在我們學會了怎樣子和睦地工作。剛在發生的革命，可以證明上述各點。我們有羣衆組織底力量，這力量可以征服一切，可以引導無產階級走上世界革命。

在俄國，我們現在應該立刻開始建設無產階級社會的國家。

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論和平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蘇維埃第二次大會上的演說辭——

和平問題：是目前的焦急的問題，癥結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說得很多，寫得很多，大概你們對於這個問題，也討論了不少。所以現在且讓我來誦讀你們所選的政府將要發表的宣言：（讀和平宣言）

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的革命所產生的基於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之上的工農政府，必須立刻開始和平的談判。我們必須同時向人民與政府建議，我們不能抹殺政府，因為不然便可以延宕和約的締訂，而人民的政府，是決不能延宕和約的締訂的，但同時我們絕對沒有權力不向人民建議。無論何處，政府與人民總是互相分歧，所以，我們必須幫助人民來干預戰爭與和平的問題。自然，我們將用全力，擁護我們的『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的綱領。我們不能放棄這種綱領，但我們必須使我們的敵人不能說他們因有另外的條件，不能同我們談判。不，我們必須剝奪他們

這種優勝的形勢，我們應該不把我們的條件，當作最後的通牒。所以必須包含這樣的原則，說，我們答應審查一切和平的條件與提議，把他們交給立憲會議去討論，立憲會議可以全權的決定，什麼可以退讓，什麼不可以退讓。我們反對嘴上高談和平公理，實際上大幹掠奪戰爭底政府的欺騙，沒有一個政府，會把它所想的全都說出來。我們反對祕密外交，我們將在全體人民面前公開的行動。我們未曾抹殺過，也不會抹殺我們的困難。簡單的拒絕，是不能結束戰爭的，祇有一方面，也是不能結束戰爭的。我們提議休戰三月，就是期限更短些，我們也不拒絕。我們要使困憊的軍隊，能得一刻自由的休息，此外，在各文明國內，必須召集人民會議來討論和平的條件。

我們提議休戰三月，同時通告一切在無產階級運動的發展上做了很多工作底國家的覺悟工人。我們通告曾經幹過憲章運動的英國工人，通告曾在暴動中屢次表示出自己階級自覺力的法國工人，通告曾經對於反對社會主義者的法律，作過堅苦的鬥爭，並且創立了強固的組織底德國工人。

在三月十四日的宣言中，我們向各國工人提議推翻一切的銀行家，但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不但沒有推翻本國的銀行家，而且反和他們聯合。現在我們已經推倒了銀行家的政府。

政府與資產階級，用盡全力，以求能夠聯合起來，撲滅工農的革命。但是三年的戰爭，已使羣衆受到充分的教訓。我們看到別的國家內的蘇維埃運動，看到爲威廉軍官所克服的德國軍艦的暴動，最後必須記着，我們不是住在非洲閉塞之處，而是住在風信傳佈得非常迅速的歐洲。

工人運動將佔上風，而奠定引向和平與社會主義去的道路。

和平宣言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號在第二次蘇維埃大會上通過——

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的革命所產生的基於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之上的工農政府，向全體交戰人民及其政府提議，立刻開始關於公正的民主的和平之談判。

公正的或民主的和平，即是憔悴死亡於戰爭之中的各國工人及勞動階級所渴望底和平，亦即俄國工農在推翻沙皇帝制以後所堅決要求的和平，蘇維埃政府以爲此種和平，祇有毫無併吞（即不掠奪別國土地，不以武力合併異族）毫無賠款的立刻實行的和平。

俄國政府向全體交戰人民提議立刻締訂此種和平，并表示願意毫不遲延地立刻採取各種堅決的辦法，直至各國各民族人民代表的全權會議最後批准此種和平的全部條件時爲止。

如果弱小民族，沒有正確地明白地自願地表示同意與希望，而強大的國家，合

併了這個民族，那些不管此種強力的合併，發生於什麼時候，不管此種爲武力所合併的，或爲武力所壓制而存在於某國國界之內的民族，如何先進或落後，并且更不管這種民族，是否處於歐洲或遼遠的海外國家，蘇維埃政府根據一般的民主的法律觀念，以及特殊的勞動階級的法律觀念，總認爲此種合併，是併吞或掠奪他國土地。

如果某個民族爲武力壓迫而存留於某國疆界之內，如果違反他（這個民族）所表示的意志（此種意志，無論表現在報章上，或是在國民大會上，或是在政黨的決議案上，或是在反對外族壓迫的公憤與暴動上，都是一樣的），而不給他與那種權利，使他可以在併吞的民族或比較強大的民族底軍隊完全撤退的條件下，用自由投票的方法，毫無強迫地，解決自己民族的國家形式的問題，如果這樣，那麼上述民族之歸併，就是一種併吞，即是一種掠奪或暴舉。

蘇維埃政府以爲，如果爲着富強的民族怎樣瓜分他們所侵佔的弱小民族之問題，而繼續戰爭，那麼這是反對人類的最大罪惡，蘇維埃政府鄭重地宣佈自己的決

心，準備立刻根據上述的對於全體民族一律平等的條件，來簽訂和平條件並停止這個戰爭。

同時，蘇維埃政府宣佈，他並不把上述條件當作哀的美敦書（最後通牒）一般，就是說，他同意於討論任何其他和平條件。而祇是堅決地要求任何交戰國家，迅速加以討論，要求明白的清楚的表示，要求在提出和平條件時消滅任何含糊雙關的意義以及任何的祕密。

蘇維埃政府，取消祕密的外交，表示出自己堅決的意志，要在全體民族之前，完全公開地進行各種談判，他立刻開始公佈地主及資本家政府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二十五日之間所追認或訂立的一切祕密條約。這些條約內容，大部分都是爲俄國的地主和資本家謀利益與特權，保留和增加大俄人的併吞；蘇維埃政府宣佈這些內容，並且無條件地立刻地一概加以取消。

蘇維埃政府，向各國政府與人民提議，立刻開始締訂和平的談判，同時在本身方面，表示願以公文來往及交換電報的方法，或以各國代表的談判，或在這些代表

的會議上，來進行上述的談判。爲使這些談判更加便利起見，蘇維埃政府任命全權代表駐紮中立國家。

蘇維埃政府向全體交戰國家的民族提議立刻訂立休戰條約，同時希望休戰期間，至少要有三月，就是說在這個期間，全體參加戰爭或被壓迫加入戰爭的民族底代表，儘可以完成和平的談判，同時各國人民代表最後批准和平條件的全體會議，也儘可以召集。

俄國臨時工農政府向全體交戰國家的政府與人民，作上述和平的提議，同時他更要特別向最先進的參加大戰的激烈的三個國家（英、法、德）的覺悟工人，作上述的提議。這些國家的工人，對於進步和社會主義的事業，盡力最多，他們作了許多偉大的模範，如英國的憲章運動，法國無產階級所完成的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多次革命，最後德國無產階級在反對特別法律的英勇鬥爭中，更有建立德國無產階級之羣衆組織，不屈不撓，嚴守紀律，可作全世界工人模範的那些工作。這些無產階級英勇氣概的及歷史的創造能力的模範，可給我們保證這些國家的工人，將僅得他

們所負擔的解放人類出於戰爭慘狀及其結果的任務，這些工人將以堅決的勇往直前的行動，幫助我們，勝利地澈底完成和平的事業，同時更完成解放勞動及被剝削羣衆出於任何奴役制度與任何剝削的偉大事業。

(一九一八年工農政府法令及命令彙集)



結 論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結論——

我不講宣言的一般的性質。你們大會所創立的政府，可以在次要的地方，加以修改。

我堅決反對把我們的和平要求，看作好像哀的美敦書（最後通牒）。如哀的美敦書那樣的堅決態度，可以葬送我們的全部事業。我們不能要求得這樣，使帝國主義者不能向我們要求變通一些，這樣將使帝國主義政府可以藉口說我們太過固執，所以不能進行和平的談判。

我們將我們的通告，貼遍各處，使盡人皆知。如此，就決不能隱瞞我們工農政府所提出來的條件。

他們決不能隱瞞我他推翻銀行家與地主政府的工農革命。

如果採取像哀的美敦書那樣的堅決態度，別政府，或許不來答覆，如果我們

容納變通辦法，那麼他們就一定要回答。讓每個人都知道他們政府所想的是什麼。我們不要祕密。我們要使政府總是處在本國輿論的監督之下。

如果因為我們的祕密，農民不知道別個政府所要的是什麼，那麼偏僻省分的農民，將怎樣說呢？他們說道：同志們，為什麼你們使別人不能提出任何其他和平條件呢？如果讓人提出，那麼我或許就拿他們（別國的和平條件）來討論來研究，而指示我們的立憲會議代表，怎樣對付他們。倘使有些政府不同意，那麼我準備以革命手段，爭取公正的條件，但是某某幾個國家或許有這種條件，那我就不得不請這些政府自己去繼續鬥爭（指為這種條件而鬥爭——譯者）。祇在完全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時，我們的思想，方能完全實現。農民將對我們這樣的說，他將責咎我們對於小事太過堅持，因為我們主要的任務，是要揭破資產階級及當權的和不當權的劊子手的下流醜態。

我們不敢並且不應當使其他政府，可以藉口於我們堅持不讓的態度，而對他們的人民隱瞞為何遣送人民自相殘殺的原因。這僅是一潮之水，但我們不敢，并且不

應該放棄這一滴滴破資產階級併吞政策的大石之水。堅決不讓的態度，加強我們反對者的地位。我們指示全部條件給人民看。我們把我們的要求，提出於各國政府，讓他們答覆他們的人民。我們把全部和平的提議，提交立憲會議解決。

還有一點，你們要加以嚴重的注意。祕密條約，應該公佈。關於割地和賠款的條文，應該取消。同志們，條文各有不同，強盜的政府，不但訂立劫掠的條約，而且即此以外，他們還有經濟的條約以及其他關於友邦關係的條文。

我們不受條約的拘束。我們不受條約的連累。我們取消全部關於劫掠和武力壓迫的條文。但是關於友邦關係和經濟關係的條文，我們當懇切地接受，我們不能夠加以推翻。我們提議休戰三月，我們擇取較長的時期，因為民衆憔悴不堪，民衆渴望延長到四年的流血戰爭之停止而得休息。我們應該知道，應該使民衆討論和平的條件，應該使他們發表自己的意見，更要使國會（指他國的國會——譯者）參加；但是這樣做去，需要較長的時間。所以我們要求長期的休戰，使軍隊可在戰壕中休息，而停止不斷屠殺的慘劇，但是我們并不拒絕休戰較短的提議，就是向我們提議

休戰一月或一年，我們也可以討論，應該加以接受。我們的休戰的提議，也不應當是堅決不讓的，因為我們不讓我們敵人藉口於我們的堅決態度，而對於人民隱瞞真理。休戰的提議，不應當是堅決不讓的，因為不願休戰的政府，是犯罪的。假使我們不把我們休戰的提議，做得堅決不讓，那樣我們就可以使他國政府在其人民的眼前，成爲罪犯，人民對於這種犯罪，是不會講客氣的。有人反對我們，說我們不取堅決不讓的態度，卽表示我們的懦弱。可是我說，我們現在說到人民的力量時，應該拋棄全部資產階級的假話。根據資產階級意見，力量就是在於羣衆服從帝國主義政府的命令，而盲目地互相殘殺。祇有在國家能以全部國家機關的力量，驅策人民到資產階級統治者所需要的那些地方時，資產階級方認國家爲有力，我們對於力量的意見，可就不同。根據我們的意見，國家力量，在於羣衆的覺悟力。在羣衆知道一切，能夠判斷一切，自覺地去幹一切事情的時候，國家方能算做強大。我們絲毫不怕說真話，不怕說人民的疲倦，因為那個國家的不疲倦，那個人民不是公開這樣說的？試舉意大利，在意大利國內，因為這種疲倦，發生長期的革命運動，要求停

止屠殺。難道在德國沒有發生工人的羣衆示威運動，散布停止戰爭的口號？德國艦隊上的暴動，備極慘酷地爲凶手威廉及其走狗所壓倒，難道這個暴動，不是疲倦所引起的嗎？如果在這樣有紀律的國家，如德國，能有這種現象，而開始說疲倦，說停止戰爭，這樣我們盡可公開說出這點，而絲毫不必害怕，因爲這個真理，對於我們對於交戰國，甚至對於非交戰國，都同樣的是正確的。

（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及其初步設施）

論土地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在蘇維埃第二大會上的演說辭——

我們以為革命已經充分地證明并且指出，土地問題的明白的解決，是如何的重要。十月革命武裝暴動之發生，顯然的證明，土地應該轉給農民。罪惡是由過去的已被推翻的政府和妥協的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等等鑄成的。他們利用各種口實，將土地問題遷延不決，使全國崩潰，農民暴動。他們高呼農村中的破壞與紛亂，這種呼聲，祇是他們的狡詐的表現和怯懦的欺騙。試問何時何地，曾經因為應用合理的方法，而引起這樣的破壞與紛亂呢？若政府能用合理的方法去迎合貧農的需要，農民羣衆又何須紛擾乎？但政府一切的設施（經阿夫克生替也夫〔社會革命黨人〕與坦〔孟維塞克〕的蘇維埃的贊同）都是反對農民，逼迫農民暴動的。

政府引起了暴動後，就高呼破壞與紛亂，其實這種紛亂，原來是他自己造成的。政府欲以鐵與血，來撲滅暴動，但是他自己却被革命的兵士，海軍，工人等的

武裝暴動所推倒了。工農的革命的政府，首先應該解決土地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可以安慰和滿足廣大的貧農羣衆。我把這個命令中的各項，向你們念一遍，這是你們蘇維埃政府所應該頒佈的命令。這個命令中有一點是對於土地委員會底指令。此指令是根據二百四十二個地方農民蘇維埃的指令而製成的。

此間有人說，這個命令與指令，原是社會革命黨所草定的。讓他如此罷！無論是誰草定，豈不是一樣的嗎？民主的政府，雖是對於下層人民的決議，不能同意，可是他總不能忽略這個決議。只有應用之於實際，在各地方的實行以後，農民方在生活的火燄中，領會真理在什麼地方。即使農民依然跟着社會革命黨前進，在立憲會議上社會革命黨仍佔多數，我們還是說：——讓他們如此罷。生活是最好的教師，他能夠指示出誰是對的。讓農民從那方面解決問題，我們將從另外一方面來解決這個問題。實際生活，使我們逼近革命的潮流，並且造成新的國家形式。我們應該緊隨着實際生活，我們應該給人民羣衆以完全的創造的自由。已爲武裝暴動所推倒的舊政府，想借陳舊不堪的沙皇時代官僚的助力，來解決土地問題。舊

官僚不但沒有解決問題，而且還拚命的反對農民。農民在八個月的革命的時期中，多少學到了教訓，他們現在自己起來解決全部土地問題。因此我們反對對於這個『法律草案』，作任何的修正，我們不必說得極其詳盡，因為我們是在起草命令，不是編輯實際行動的政綱。俄羅斯幅員廣大，各地情形不一，我們相信農民自己將比我們更正確的知道應該如何解決問題。他們解決問題，是按照我們黨綱的精神呢，抑是按照社會革命黨黨綱的精神呢——這點並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在農民能獲得堅決的信仰，相信在鄉村中，再不會有地主的存在。讓農民自己去解決一切問題，讓他們自己去創造自己的生活。

土地令

——十月二十六號晚二時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

一、毫無報價地立刻廢除地主的地產。

二、地主底采邑，一切貴族的封地，僧侶和教堂的土地以及他們的牲畜，農具，房屋，及其他一切附屬品等，概歸鄉村土地委員會和縣農民代表蘇維埃管理，直至立憲會議為止。

三、沒收的財產，為全體人民所有，如引起任何破壞，當認為重大罪犯，應受革命法庭之懲罰。各地農民代表蘇維埃，在沒收地主的采邑時，應當採取各種必要的方法，維持一切秩序，決定何者應該沒收，并且沒收幾多，正確地統計所有沒收的財產，并設法以革命手段，保護移交人民的全部地產（包括一切建築，農具，牲畜，儲藏的物品等）。

四、根據二百四十二個地方農民蘇維埃的指令而編成的農民指令（這個指令是

官僚不但沒有解決問題，而且還拚命的反對農民。農民在八個月的革命的時期中，多少學到了教訓，他們現在自己起來解決全部土地問題。因此我們反對對於這個『法律草案』，作任何的修正，我們不必說得極其詳盡，因為我們是在起草命令，不是編輯實際行動的政綱。俄羅斯幅員廣大，各地情形不一，我們相信農民自己將比我們更正確的知道應該如何解決問題。他們解決問題，是按照我們黨綱的精神呢，抑是按照社會革命黨黨綱的精神呢——這點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在農民能獲得堅決的信仰，相信在鄉村中，再不會有地主的存在。讓農民自己去解決一切問題，讓他們自己去創造自己的生活。

土地令

——十月二十六號晚二時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

一、毫無報價地立刻廢除地主的地產。

二、地主底采邑，一切貴族的封地，僧侶和教堂的土地以及他們的牲畜，農具，房屋，及其他一切附屬品等，概歸鄉村土地委員會和縣農民代表蘇維埃管理，直至立憲會議為止。

三、沒收的財產，為全體人民所有，如引起任何破壞，當認為重大罪犯，應受革命法庭之懲罰。各地農民代表蘇維埃，在沒收地主的采邑時，應當採取各種必要的方法，維持一切秩序，決定何者應該沒收，并且沒收幾多，正確地統計所有沒收的財產，并設法以革命手段，保護移交人民的全部地產（包括一切建築，農具，牲畜，儲藏的物品等）。

四、根據二百四十二個地方農民蘇維埃的指令而編成的農民指令（這個指令是

退去。有人向我們說，在我們的革命中，有新鮮的地方。自然，我們之所以有新鮮的地方，是因為我們向社會主義走去。當社會革命黨人，在第一屆及第二屆國會發表意見時，他人亦對之訕笑，這是因為他們說了些新的東西。

應該把私人廣告，作為壟斷事業。印刷工會會員，是根據飯碗的觀點來爭論的。我們給他們麵包吃，可是所取的形式不同。我們不讓資產階級來謾罵我們。應該立刻指派委員會去調查資產階級報紙對於銀行的依賴情形。這些報紙究竟需要何種自由呢？我們應該脫離依賴於資本的那種自由。這個問題，具有原則上的意義。如果我們向社會主義革命走去，我們絕對不允許在卡萊丁的炸彈以外，再有造謠惑眾的炸彈。

在我們的法令中，缺點自然是有的。但是各地蘇維埃，將依照本地情形去實行……我們不是官僚，我們不須要像舊時公事房一樣，按字按句的去實行。我記起社會革命黨人這樣說過『在農村中，對於時事，真是知道得少得不堪。他們還是向俄羅斯輿論報去搜尋新聞』。我們讓報紙留在資產階級手裏，這是我們犯了錯誤。

我們應該向前走，向新社會走去，我們對付資產階級報紙，應該像我們在二月至三月時對付黑幫的報紙一樣。



通告大衆的無線電

給一切團的，師的，軍的，軍團的與其他的委員會。

給一切革命軍隊的兵士與革命艦隊的水兵。

人民委員會在十一月七日晚上，拍電給前敵總司令杜霍甯，要他立刻並且正式的向一切交戰國家（不論是聯盟國或是我們的敵人），提議休戰。

這個電報在十一月八日晨五時五分由值日收到。人民委員會，命令杜霍甯不斷的將談判經過，報告人民委員會，並且只有在人民委員蘇維埃批准之後，才能簽訂休戰條約。同時這種提議（休戰的提議）還正式的向協約國駐彼得堡的全權代表提出。

人民委員會因在十一月八日晚沒有得到杜霍甯的回電，即派列甯，史達林與科羅倫科用長途電話向杜霍甯質問延擱的原因。

談判從十一月九日晨二時起，到四時半爲止。杜霍甯總是想用種種方法，來躲

避關於他自己的行動底說明；他對於政府的命令，也不給確切的回答，但當政府代表很堅決的命令杜霍甯立刻并正式提出休戰的提議時，他答覆拒絕服從這個命令。那時即以俄羅斯共和國政府的名義，受人民委員會的托付，通告杜霍甯，因他不服從政府的命令，而使全世界的勞苦羣衆，尤其是兵士們羣衆，繼續受空前的苦難，所以撤消他的職務。同時，還命令杜霍甯在新的總司令尙未接任以前，繼續工作。科羅倫科少尉被任命爲新的總司令。

兵士們，和平的事業，是在你們的手裏！你們不要使反革命的軍官破壞和平的偉大事業，你們要嚴格的監視他們，你們要避免革命軍隊所不應有的自動的審判（卽下層羣衆無組織的自動的不經革命法庭而審判官長），但你們要使他們不能逃避革命法庭的審判。你們要維持最嚴格的革命的與軍事的秩序。

請前敵各師團立刻選舉全權代表正式和敵人開始休戰的談判。人民委員會給你們以這樣的權力。談判的一切經過，請用種種方法來告訴我們。最後簽訂休戰條約之權，祇操於人民委員會的手中。

兵士們，和平的事業是在你們的手裏！謹慎，堅定，努力，和平的事業，一定可以獲得勝利。

俄羅斯政府的代表簽字：

人民委員蘇維埃主席：列寧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與最高總司令：科羅倫科

十一月十日，一九一七年。



工人和勞苦的及被剝削的農民之聯合

——致說理報編輯部書——

今天星期六，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八號，當我出席於農民代表大會時，他們當場向我提出問題，我當時立刻回答了這個問題。應該公佈這個問題和我的回答，給全體讀者們知道，因為在形式上我雖以個人的名義說話，但在實際上我是代表整個布爾塞維克黨說話的。

事情是這樣的：

在講到工人布爾塞維克與左派社會革命黨聯合問題的時候（許多農民，還相信左派社會革命黨）我在自己的演說中，證明這種聯合，可以成爲『忠實的合作』，忠實的聯合，因為在僱傭工人與勞苦被及剝削的農民之間，沒有根本的利益上的衝突。社會主義能夠滿足工人，也能夠滿足農民。祇有社會主義，能夠滿足他們的利益，因此無產階級與勞苦及被剝削農民之間的『忠實合作』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

的。反之，在勞苦的及被剝削的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是不能有「忠實的合作」的，因為他們的利益，是根本相衝突的。

我說道，設使在政府裏，布爾塞維克佔大多數，而左派社會革命黨佔少數，假定他們祇有一個農業委員，那麼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布爾塞維克能否實現忠實的合
作呢！

能夠的，因為布爾塞維克堅決地和反革命份子（包括右派社會革命黨與祖國保衛派）進行鬥爭，他們在表決土地政綱上的（此政綱已由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會通過）純粹社會革命黨的主張時，應該不參加表決。此種社會革命黨的主張，可舉平均使用土地及小農重分土地等等為例。

布爾塞維克在表決此種主張時，雖不參加，但他們絲毫沒有改變自己的綱領。因為在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之下（工人監督工廠，再後，工廠的奪取，銀行的國有，調劑全部國民經濟的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設立），在這種條件之下，工人應該同意於勞苦的及被剝削的農民的過渡辦法，如果這種辦法，不貽害於社會主義，

我說，考茨基在他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一八九九——一九〇九年），不斷的承認過，進到社會主義去的過渡辦法，在大農及小農的國家裏，是不能一樣的。

我們布爾塞維克在人民委員會或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表決這些主張時，應該不參加表決，因為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以及贊成他們的農民）同意於工人監督，銀行國有等等之時，平均使用土地，不過是進到完全的社會主義去的過渡辦法之一。如果無產階級壓制這樣辦法，那是愚蠢已極，無產階級爲着社會主義勝利的利益，應該在採取這些辦法時，對勞苦的及被壓迫的農民讓步，因為這些辦法，是不會貽害社會主義事業的。

一位左派社會革命黨員（我記得是非奧非拉托夫同志）向我提出下面的問題：假使在立憲會議中，農民要通過平均使用土地的法律，而資產階級則反對農民，那時決定之權，落在布爾塞維克身上，布爾塞維克在這種狀況下將怎樣辦呢？

我回答道：當工人管理生產，及銀行國有等等，可以擔保社會主義的事業之時，工人與勞苦的及被剝削的農民之聯合，使無產階級的政黨舉手贊成農民，反對

資產階級。在那個時候，據我意見，布爾塞維克可以有權提出自己的聲明書，說明自己同意的條件等等，但是如果在那時不參加表決，那麼這就等於爲了枝節的異議，而叛賣其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同盟者。在這樣情形之下，布爾塞維克是永不至於叛賣農民的。如果政權握在工人政府手中，如果實行工人監督生產，國有銀行，設立調劑全部國民經濟的最高機關等等，那麼平均使用土地等等辦法，是永不會貽害於社會主義的。

我的答覆如此。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論銀行的國有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全俄中央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所發表的意見——

前一個發言人（阿維洛夫 Avilov）想恐嚇我們，說我們定要滅亡，定要崩裂。這種恐嚇，對於我們已不是新鮮的了。表示上述發言者一派意見的報紙（新生活）在十月革命前已經說過，在我們革命中，除了蹂躪的舉動與無政府狀態的騷亂以外，再不會發生其他效果。所以如果有人說我們走着錯誤的道路，那麼這話只是反映資產階級的心理，就是和資產階級無關的人，現在也還不能脫去這種心理（國際主義派插言道：「巧言惑眾」）不，這不是巧言惑眾，你們常說什麼斧頭等等的話，這才是巧言惑眾。

命令上所提出的全部辦法，僅是真正的監督權的保證。

你們說機關的複雜，說他的軟弱，和問題的紊亂，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初步真理。如果利用此種真理，妨礙全部社會主義的設施，那麼我們說，這樣幹去的人，

正是巧言惑衆之徒，正是極有害的巧言惑衆之徒。

我們想開始清查保險箱，但是有人用着學問淵博的專門家的名義，向我們說，在保險箱裏面，除了文件與名單以外，再沒有什麼東西。假使人民代表，要監督他們，這有什麼壞處呢？

假使如此，那麼發表上述批評的學問淵博的專門家，又爲什麼逃避呢？在蘇維埃的全部討論中，他們聲明同意於我們，但祇在原則上同意。這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全部妥協派的慣技，他們永是在原則上同意，在實際上不同意，他們以此手段，葬送一切。

假使你們各方面聰明，並且有經驗，那麼，爲什麼不來幫助我們，爲什麼我們在困難的路上，僅僅遇到你們怠工而不見其他。

你們根據正確的科學的理論，但在我們看來，理論祇是行動的根基，他使我們相信這種行動，而不是使我們像死一般的害怕。自然，開頭是困難的，我們當時遇到軟弱的東西，我們無論在過去現在與將來，總是能夠加以應付的。

假使書籍除了妨礙新的辦法以及永是害怕新的辦法以外，再不發生其他作用，那麼這種書籍是沒有價值的。

除了空想社會主義者以外，再無人說不經抵抗，不經無產階級專政，不對舊世界下鐵手，就可以獲得勝利。

你們在原則上接受這個專政，但這個字（專政）翻成俄文成爲『鐵手』，在實際上應用之時，你們則以事業的軟弱和紊亂相警告了。

你們固執地不想知道這隻鐵手，非但會破壞，并且還會建設。假使我們已從原則轉到實際，那末這是我們的毫無疑義的成績。

爲實行監督起見，我們召集銀行事業家，和他們一塊兒規定辦法，他們同意，銀行要在完全由政府監督向政府報告的條件之下，獲得借款。但在銀行的職員裏面，也有接近人民利益的份子，他們說道『他們在欺騙你們，趕快消滅直接損害你們的罪惡的舉動呵』。我們就趕緊的做了。

我們知道，這是複雜的辦法。在我們中間，就是有經濟學識的人，也不敢說能

夠實行，但是祇有鑰匙握於我們手中的時候，我們方能僱用那些經營此種事業的專門家。那時我們還能聘請以前的富翁，來作顧問。誰願意作工，請來吧，我們祇要不把任何革命的創造，變成死的文字，——這是我們所不幹的。專政一字，我們說得非常鄭重并且要加以實現。

我們想和銀行妥協前進，我們供給他們借款，以接濟企業機關，可是他們舉行政大怠工，使我們不能不以別個辦法，實行監督。

一位左派社會革命黨同志說，他們在原則上，贊成立刻把銀行國有，以便在最短的時期內，規定實際的辦法，但這是錯誤，因為我們的命令，除了原則以外，再無其他。在討論之際，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正急不容緩地等着，如果這個命令，不經批准，那麼銀行將立刻採取各種辦法，以嚴重地破壞經濟。

此令之實行，不能稍緩，不然反對我們的舉動及怠工，將葬送我們。

(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會議記錄)

立憲會議提綱

(一)立憲會議召集的要求，歸入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政綱中，是完全應當的，因為在資產階級共和國內的立憲會議，是民主主義的最高形式，因為以克倫斯基為首的帝國主義的共和國，有召集國會時，正準備作破壞民主主義的偽選。

(二)提出召集立憲會議的要求時，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從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最初時起，就不止一次地鄭重地說，蘇維埃共和國，與尋常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相比較，是更高的民主主義的形式。

(三)對於從資產階級制度進到社會主義制度的轉變，對於無產階級的專政，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不但是更高的民主機關的形式（同平常以立憲會議為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比較），而且還是能夠保證最健全地轉到社會主義去的唯一形式。

(四)在我們的革命內，如果根據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所提出的名單，而選舉立憲會議的代表，那末這個立憲會議的召集，不能正確的表現出一般民衆的意志，尤

其是勞苦羣衆的意志。

(五)第一，祇有在各黨的名單，真正能適合這些名單所反映出來的真正民衆的派別時，比例選舉制，才能正確的表現出民衆的意志。在我們國內，大家都知道，從五月到十月，在民衆中間尤其在農民中間擁有大多數同情者的政黨，社會革命黨，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提出統一的立憲會議代表的候補名單的，但在立憲會議選舉之後，召集之前，這個政權分裂了。

因此，選民羣衆的意志，與被選爲立憲會議代表的成份二者之間，就是連形式上的符合，也是沒有而且是不能有的。

(六)第二，民衆的尤其是勞動階級的意志與立憲會議的成份中間之不相符合，還有一個更重要的，非形式的，非法律的而是社會經濟的階級的來源，這就是立憲會議選舉的舉行，是在大多數民衆還不能知道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所發生的，就是在立憲會議候補名單提出之後方才開始的，蘇維埃工農十月革命之全部範圍與意義。

(七)十月革命爲蘇維埃獲得了政權，他將政治的統治從資產階級的手裏交給無產階級與貧農，這個革命在我們的眼前，經過了他的發展上的連續的階段。

(八)這個革命，開始於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的首都的勝利，那時在全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代表大會中，即在無產階級與政治上最活動的一部份農民之中，布爾塞維克黨獲得大多數，布爾塞維克，因之就握到了政權。

(九)以後，在十一月與十二月內，革命擴張到全部士兵與農民之中，這點首先表現在舊的上層組織（士兵委員會，省的農民委員會，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等）的解散與改選，這些上層組織，祇反映出革命發展上過去的與妥協的階段，即反映出資產階級的而非無產階級的階段，所以這些上層組織，在更深刻的與更廣大的羣衆的壓迫之下，必然是要消滅的。

(十)被壓迫民衆改組他們組織的領導機關之有力的運動，直到現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中旬，還沒有終結，那還沒有結束的鐵路工人代表大會，就是它的階段中之一。

(十一)所以，在實際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與十二月間俄國階級力量的重新配合，和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立憲會議的候補人的名單上所表示出來的，是根本不同的。

(十二)最近烏克蘭的（以及芬蘭白俄羅斯的一部，與高加索）事件，都指出鬥爭中階級力量的重新配合，在這種鬥爭中，一方面有烏克蘭的會議（Rada）芬蘭的議會（Diet）等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另外一方面，有這些民族共和國中工農革命，蘇維埃政權。

(十三)最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反對工農政府的立憲民主黨人與卡萊丁黨徒的反革命暴動，開始了國內戰爭，這個國內戰爭，使階級鬥爭更爲緊張，以至用形式的民主的方法，再也不能解決那些被歷史放在俄國民衆前面，尤其是俄國工人階級與農民前面的最急切的問題。

(十四)祇有工人澈底地征服資產階級與地主的暴動（卡萊丁黨徒的運動，即是此種暴動）祇有工農無情地以軍事辦法撲滅這些奴隸主的暴動，方能在實際上保證

工農革命的勝利。革命中事變的經過與階級鬥爭的發展，使『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的口號（這個口號，完全不顧蘇維埃政權的勝利，不顧第二次全俄工兵蘇維埃代表大會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等的決議）實際上變了立憲民主黨卡萊丁派的口號。全體民衆很明瞭，這一口號實際上就是爲消滅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口號，如果立憲會議與蘇維埃政權分歧，那末立憲會議的政治的死亡，是必不可免的事。

（十五）和平問題是全民生活中最緊張的問題之一。在俄國真正的擁護和平的革命鬥爭，祇在十月二十五日革命勝利之後，方才開始，這次勝利的第一結果，就是祕密條件的公佈，休戰條約的締訂，以及關於不割地不賠款的總和平的談判之開始。

廣大的民衆，祇到現在，才真正的完全的公開的得到了這種可能，使他們能夠觀察那種擁護和平的革命鬥爭底政策，並且研究鬥爭的結果。

在立憲會議選舉的時候，民衆沒有這種可能。

可見，在結束戰爭的問題上被選到立憲會議去的代表的成份，和民衆的真正意

志，是不相符合的。

(十六)上述許多情形的綜合，產生這樣的結果：依照工農革命以前的，即資產階級統治時期所存在的黨派的名單而召集之立憲會議，必然要和十月二十五日開始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底勞動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意志與利益相衝突。自然，社會主義革命的利益，比立憲會議形式上的權利，要高得多，即使在關於立憲會議的法律上，不承認人民在任何時候有撤換與改選他們代表的權利，即使立憲會議的形式上的權利，因此沒有受到破壞。即使如此，社會主義革命的利益，也是高出於立憲會議的形式上的權利的。

(十七)如果企圖祇從形式方面，法律方面，祇根據平常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圍，而不估計階級鬥爭與國內戰爭的事實，去觀察立憲會議的問題，那麼這種企圖，不論是直接的或間接的，都無異於叛賣無產階級事業，投奔到資產階級的觀點上去。布爾塞維克的少數上層分子，因為不能估計十月革命與無產階級的任務而犯了錯誤；我們應該警告每個革命者，不要再犯這種錯誤，這實是革命社會民主主義

者的一個切身的責任。

(十八)因立憲會議的選舉，與人民意志即勞動與被剝削階級之利益不相符合，所以產生了政治的危機，唯一的能夠健全地解決這個危機的社會，就是在於人民要很普遍地迅速地起來實現改選立憲會議的代表的權利，要立憲會議自己贊助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這種改選的法律，要立憲會議聲明無條件的承認蘇維埃政權蘇維埃革命以及蘇維埃政權關於和平，土地，工人監督生產等等問題的政策，要立憲會議堅決的成爲反革命立憲民主黨與卡萊丁派底敵人。

(十九)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立憲會議所產生的危機，祇有用革命的方法來解決，就是說，由蘇維埃政權採取最有力的最迅速的最堅決的革命的方法來撲滅立憲民主黨與卡萊丁派的反革命（不論這反革命用來遮蓋自己的口號與機關——立憲會議的代表也罷——是什麼）。在這個鬥爭中，一切束縛蘇維埃政權的企圖，都無異於幫助反革命。

勞動的和被剝削的人民之權利宣言

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下述要則：

立憲會議決定：

一、俄羅斯宣佈爲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中央以及地方的全部政權，盡歸這些蘇維埃。

二、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於自由民族的自由聯合底基礎上，而爲各民族蘇維埃國家的聯盟。

二

立憲會議以消滅任何人對人的剝削，完全消滅社會內階級的劃分，殘酷無情地壓倒剝削者，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促成全世界上社會主義的勝利等等爲目的，并決定下述各項：

一、爲實行土地的社會化起見，土地上的私有財產權宣佈取消，全部土地，宣佈爲全民的財產，并在平均使用土地的原則上，毫無報償地轉交勞苦羣衆。

全部具有全國意義的森林，礦產，水流，以及全部活的和死的農具，全部采邑及農業企業，都宣佈爲國家的產業。

二、爲保證勞苦羣衆政權，以統治剝削者起見，批准蘇維埃關於工人監督生產以及關於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法令，並把他們作爲工廠，作坊，礦山，鐵路以及其他生產及交通工具完全轉爲蘇維埃工農共和國財產的初步辦法。

三、批准把全部銀行轉爲工農國有財產的辦法，這是解放勞苦羣衆出於資本主義壓迫的條件之一。

四、爲消滅社會中的產生階級等以及建設經濟起見，實施全民強迫勞動制。

五、爲保證全部政權屬於勞苦羣衆，及消滅剝削者恢復政權的任何可能起見，訓令武裝勞苦羣衆，組織社會主義的工農紅軍，完全解除有產階級的武裝。

一、立憲會議表示不屈不撓的決心要挽救人類出於金融資本帝國主義的虎口，此種金融資本及帝國主義，在目下空前未有的罪惡的戰爭中，使全地球滿染血腥，所以立憲會議完全同意於蘇維埃政權所採取的政策，破裂祕密條約；和現時交戰的軍隊中的工農舉行廣大的聯歡，并且盡一切可能的力量，以革命的辦法，來達到各民族間沒有併吞和賠款而以民族自由自決為基礎的和平。

二、立憲會議為着同樣目的，堅持要完全與資產階級文明的政策決裂，此種政策，在奴役亞洲以及一般殖民地與弱小國家的數萬萬人民底基礎上，造成少數超等國家裏剝削者的幸福。

立憲會議歡迎人民委員會宣佈芬蘭完全獨立，開始從波斯撤退軍隊，宣佈阿美尼亞有民族自決的自由等等底政策。

三、蘇維埃通過法令，取消沙皇地主資產階級等政府所訂的債務，立憲會議，以為此種法令，是對於國際銀行資本金融資本的第一次的打擊，同時相信，蘇維埃政權能夠不屈不撓地依照這條路線走去，直至國際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羈絆的暴

動完全勝利爲止。

在十月革命以前，人民還不知道剝削者在保持他們階級特權時所用的全部抵抗力量，他們（人民）還不能全部起來舉行反對剝削者之暴動，還沒有在實際上擔負起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事業；立憲會議，是根據十月革命以前的各黨的名單，選舉出來的；立憲會議以爲，如果把立憲會議與蘇維埃政權相對抗，那末這種行動，就是從形式上的觀點看來，也是完全不對的。

就實質講，立憲會議以爲，現在當人民與剝削者作堅決鬥爭的時候，剝削者不能留足於任何政權的機關裏。政權應該完全的整個的屬於勞動羣衆及其全權政府——工農兵代表蘇維埃。

立憲會議擁護蘇維埃政府及人民委員會的命令，並且以爲自己的任務，僅限於製定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造底基本原則。

同時，立憲會議企圖造成俄羅斯各民族的勞動階級中間的真正自由和自願的聯合，也就是更完滿更鞏固的聯合；立憲會議祇限於規定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同盟的

基本原則。他向俄羅斯工農及每個民族的工農建議，請他們自己的全權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通過單獨的決議案；說明：『他們是否同意，並且在何種條件之下同意於參加聯邦政府及其他聯邦蘇維埃機關。』

上述基本原則，應該立刻公布，並由宣佈立憲會議開會的蘇維埃政權的代表，宣讀於立憲會議的會場上，而把他作為立憲會議行動的基礎。

(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第三號真理報)

社會民主工黨(布爾塞維克)黨團的宣言

——宣讀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五號立憲會議的會場上——

俄羅斯大多數勞動羣衆，工人，農民，兵士等，要求立憲會議承認偉大十月革命所獲得的勝利，承認蘇維埃政權關於土地，和平，工人監督生產等等的法令，並且首先應該承認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政權。

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俄羅斯勞動階級中最大多數的意見，向立憲會議提議，要他們服從這個意志，但立憲會議內的大多數，順從資產階級的要求，推翻了這個提議，而向俄國勞苦羣衆宣戰。

在立憲會議，右派社會革命黨，克倫斯基、阿夫克生且也夫、邱爾諾夫輩之政黨，佔據大多數。這個政黨，自命爲社會主義的革命的政黨，實際上領導着資產階級份子的鬥爭，來反對工農革命，所以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政黨。

包含現在這樣成份的立憲會議，是偉大十月革命以前的勢力分配所形成的結

果。現在立憲會議中的反革命的大多數，是依照陳舊的政黨名單，選舉出來的，他們表現革命以前的情形，他們橫斷工農運動的道路。

整天以來的討論，明白地指示出，右派社會革命黨，如在克倫斯基時代一樣，給人民下圈套，他們在口頭上允許給人民一切東西，實際上都是決定反對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政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政策，反對毫無報償地把土地及一切農具，轉給農民，反對國有銀行，反對取消國債。

我們一分鐘也不願意遮掩人民公敵的罪惡，我們宣布退出立憲會議，把怎樣對付立憲會議中反革命的一部分的問題，提交蘇維埃政權作最後的解決。

(一九一八年「立憲會議」記錄)

關於解散立憲會議的演說

——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六日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

同志們！俄國革命，負擔着空前絕後的遵循社會主義路線來改造社會的任務，俄國革命的全部歷史，準備好蘇維埃政黨與立憲會議之間的衝突。在一九〇五年的事變以後，毫無疑義的沙皇帝制是在苟延殘喘，祇是因為鄉村的落後與黑暗，他方才能夠脫離危崖。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產生這樣的現象，就是：一方面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政黨，因受事變的影響，轉成了共和黨，他方面，發生了民主組織——蘇維埃，它在一九〇五年時已經組織起來，因為那個時候社會主義者已經知道這些蘇維埃的組織，將在世界革命史上造成偉大的新的空前未有的事業。民衆所獨立創設的蘇維埃，是民主主義的形式，世界各國內，沒有一種形式，可以與之比擬。

革命推出這兩種力量——統一羣衆以推翻沙皇帝制，以及組織勞苦民衆。當我聽到十月革命反對者高呼社會主義不能實現僅是空想等等的時候，我當時給他們以

一個簡單明瞭的問題：蘇維埃是一種什麼現象？這些世界革命發展史上所從來未有的民衆組織（蘇維埃）的產生，是何種現象的結果呢？在這個問題上，我沒有并且也不能得到任何人的確定的回答。爲着頑固地擁護資本主義制度起見，他們就出來反對世界任何革命中所從未有過的那種強大的民衆組織，誰要是反對地主，他就擁護蘇維埃。任何不顧空閑而願出力工作的人，都可包容於蘇維埃之中。蘇維埃的綫索，普遍於全國，人民蘇維埃的綫索，愈是緊密，對於勞動民衆的剝削，愈難進行，因爲蘇維埃的存在是和資本制度的發展，勢不兩立的；這就是資產階級代表的全部反抗的來源，這些資產階級代表，完全是爲着本身的利益，而進行反對我們蘇維埃的鬥爭的。

由資本主義進於社會主義制度的轉變，引起了長久的堅決的爭鬥。俄國革命，在推翻沙皇以後，不應該限於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而應該繼續前進，因爲戰爭，以及戰爭所引起的民衆憔悴困頓的空前苦況，造成爆發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所以有人說，革命的往前的發展，羣衆進一步的憤慨，是爲個別政黨，個人，或像他們

所呼喊的，由「狄克推多」（專政者）的意志所引起的，這種話，真是再可笑沒有的了。革命火燄的發揚，完全是俄羅斯的黑暗與不堪的痛苦，以及戰爭所造成的全部條件等所引起的，這個戰爭向勞苦民衆直截地堅決地提出這樣問題：或是採取勇敢的拚命之不怕一切的辦法，或是滅亡，餓死……。

革命火燄的表現，即是在於蘇維埃（勞動階級革命的柱石）的成立。俄羅斯民族，翻了一個極大的筋斗，從沙皇帝制進到蘇維埃。這是不能推翻的而且無論什麼地方所沒有的事實。全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的國會，束縛於資本主義及私有財產的圈套之中，他們沒有在一個時候沒有在一處地方給革命運動以絲毫的幫助；可是蘇維埃却放起革命的火燄，以命令形式指揮民衆；鬥爭，掌握一切，組織起來。無疑的，蘇維埃力量所引起的革命發展的過程，會遇到各色各樣的許多錯誤與失策，可是大家都明白的知道：任何革命運動，都一定要暫時引起混亂，破壞及不寧等等現象……資產階級社會，也是同樣的進行戰爭，同樣的進行搏戰；但是上述這種現象，却更加厲了立憲會議與蘇維埃中間衝突；有些人對我們說，我們以前曾經擁護

過立憲會議，現在却要『趕走』他；說這種話的人，沒有一些思想，而祇有華美的空虛的辭句；因為以前沙皇帝制及克倫斯基共和國之下，立憲會議在我們看來自然是比較高貴的政權機關。但在蘇維埃發生以後，全體民衆的革命組織，蘇維埃，自然無可比較地高出全世界的任何國會，這種現象我在四月間，已經指示出來了。

蘇維埃澈底地破壞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財產制，促進最後的掃除一切資本制度殘餘的革命；他把我們推到這樣的路上，使人民可以建設自己的生活。我們已經擔負起偉大的建設，我們幹得很好，因為我們擔負了這種建設。無疑的，人民不能立刻得到純潔光滑毫無錯處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不能不引起國內戰爭與怠工反抗等等現象。要是誰給你們作相反的證明，那麼他不是說謊便是一竅不通。四月二十號，民衆絲毫沒有得到『狄克推多』和政黨方面的指示，而獨立地挺身出來反對妥協派的政府，這個事變，這種現象，在那時已經證明資產階級統治的柔弱和不穩。羣衆覺到自己的力量；爲討好羣衆起見，於是就開始了有名的變更總長的玩意兒，以求欺騙民衆，但民衆不久即覺悟了，特別是在克倫斯基兩隻衣袋滿裝掠奪的

祕密條約，調動軍隊向前敵進攻的時候，民衆看得更加清楚了。受騙的民衆，逐漸懂得妥協派的行動，民衆的忍耐心，開始完結了，這些情形，引起十月革命。民衆嘗過刑罰，死刑和屠殺等等，已在經驗上學得了教訓；所以如果劊子手向他們說，在勞苦羣衆的暴動中，罪人是布爾塞維克或某種『狄克推多』，那麼這祇是徒費口舌。民衆中以及各種會議上的分裂，證明這點。民衆對於十月革命還沒有十分領會。這個革命在實際上指示出人民應該怎樣去奪取土地，怎樣把交通及生產工具的國富，轉交工農國家。我們提倡，全部政權歸蘇維埃，我們就爲此而鬪爭。人民要召集立憲會議，我們就召集。但是現在民衆已經感覺到這個高貴之立憲會議，是個什麼東西。現在我們就執行人民的意志，這意志是說：全部政權應歸蘇維埃。我們打倒一切怠工者。當我從熙攘來往滿含生氣的斯慕爾尼（那時蘇維埃政府所在地）來到塔夫利赤宮（立憲會議會址）的時候，我感覺到好像處在死屍和無生氣的木乃伊之中。他們採用各種可能的辦法，來作反對社會主義的鬥爭，他們利用武力，怠工等等方法，他們甚至把人類的寶貝（智識），轉爲剝削勞苦人民的工具，雖然他

們以此方法，使社會主義革命的步驟，遇到一些妨害，可是他們不能而且永遠不能破壞社會主義革命，因為蘇維埃的力量，這樣的偉大，使他可以開始用無產階級農民的手段（而不是用地主的手段）去搗毀資本制度的陳舊的腐朽的基礎。

如把政權轉交立憲會議，那麼等於和兇狠的資產階級妥協。俄國蘇維埃，視勞苦羣衆的利益，遠高出叛賣的妥協的利益之上，此種妥協，現在不過改換新的服裝罷了。從邱爾諾夫，采萊台里及其他過去人物的演辭中，放出陳舊，霉腐的臭味，他們還繼續呻吟停止國內戰爭。但是如果卡萊丁繼續存在，如果在『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的口號下，隱藏着『打倒蘇維埃政權』的口號，那麼我們不能避免國內戰爭，因為我們祇要一息尚存，總無論如何不放棄蘇維埃政權……當立憲會議準備把蘇維埃所提交的急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和任務，延宕下去時，我們回答道：不能有一分鐘的延宕。根據蘇維埃政權的意志，不承認人民政權的立憲會議，被宣佈解散。涼步與斯基輩的陰謀，已經失敗，他們的反抗僅僅加重與引起國內戰爭的新的爆發。

立憲會議，被宣佈解散；蘇維埃革命共和國將奮勇直前，不顧一切，以獲勝利……。



(一九一八年一月九日第六號眞理報)

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解散立憲會議令

——一九一八年一月七號夜一點三十分鐘在維蘇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

俄羅斯革命，一開始就產生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他是全部勞動的及被剝削的階級的羣衆組織，唯有他能夠引導勞動階級及被剝削階級的爭鬥，而爲他們謀政治上經濟上的完全解放。在俄羅斯革命的整個第一時期中，蘇維埃增多了，發展了，鞏固了，他在自己的經驗上，消滅了和資產階級妥協的幻想，懂得資產階級民主的國會主義形式的騙人性質，在實際上得出結論，即是不與這些形式決裂，如果不放棄任何妥協，那麼被壓迫階級，是不能得到解放的。由此發生十月革命，政權轉入蘇維埃的手中。

立憲會議，是根據十月革命前所定的名單而選舉出來的，他表示舊時妥協派及立憲民主黨當權的政治力量的關係。那時，人民在贊成社會革命黨的候選人時，不能辨別右派（資產階級的贊助者）和左派（社會主義的贊助者）。所以這個立憲會

議，本來就應該是資產階級國會制度共和國的冠冕，到了現在，他就不能不橫斷十月革命及蘇維埃政權的道路。十月革命把政權給與蘇維埃，經過蘇維埃給與勞動的及被剝削的羣衆。十月革命引起了剝削者的反抗，在鎮壓這種反抗上，十月革命完全表現出他是社會主義革命之開始。

勞苦羣衆，在經驗上相信舊的資產階級的國會已經過了時，相信此種國會制度完全不能與實行社會主義的任務，同時并存，相信不是全民的機關，而祇有階級的機關（如蘇維埃）方能戰勝有產階級的反抗，奠定社會主義的基礎。

任何放棄政權的完璧，放棄人民所爭得的蘇維埃共和國，以造益於國會制度及立憲會議底那種舉動，都是叛賣整個工農十月革命的行為。

在一月五日開會的立憲會議，因上述那些原因，使右派社會革命黨，克倫斯基、阿夫克生替也夫，邱爾諾夫一輩人的政黨，佔據多數。蘇維埃政權的最高機關（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向他們作極其正確，明白，不容有絲毫曲解的提議，要求他們承認蘇維埃政權的政綱，承認勞動的及被剝削的人民權利的宣言，承認十月

革命與蘇維埃政權，可是社會革命黨，天然的拒絕討論上述提議。因此，立憲會議就完全破裂了他和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中間的任何連繫。在蘇維埃當中，顯然佔據多數而得工人及大多數農民信仰的，是布爾塞維克及左派社會革命黨，他們黨團之退出立憲會議，是不能避免的。

在立憲會議中佔據大多數的政黨（右派社會革命黨及孟塞維克）正在立憲會議之外，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公開的鬥爭，在他們機關報上號召推翻蘇維埃政權，客觀上，這些行動，是種幫助剝削者的反抗，用來阻礙土地與工廠之轉入勞動羣衆手中的。

很明顯的，因上述情形，立憲會議內留下來的一部分的作用，祇是在於庇護資產階級的鬥爭，以圖推翻蘇維埃政權。

所以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

解散立憲會議。

（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第五號真理報）

和平提綱

一、目前俄國革命的形勢是這樣的，差不多全體工人及極大多數農民，都贊成蘇維埃政權及他所開頭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所以俄國社會主義革命之成功，是有保障的。

二、同時，有產階級，明白地知道他們不能不作最後的堅決的鬥爭，來保護土地及生產手段上的私有財產權；他們的拚命的反抗所引起底國內戰爭，還沒有達到他的頂點。在這個戰爭中，蘇維埃政權可以擔保勝利，可是要撲滅資產階級的反抗，不可免的要經過多少時候，不可免的要不少的力量，不可免的在國內（因為戰爭的特別是國內戰爭的關係），要有某種嚴重破壞及混亂的時期。

三、除此以外，資產階級還採取比較不積極的非軍事的反抗；如怠工，收買流氓，收買資產階級走狗，鑽進社會主義隊伍，以圖葬送他們事業等等；此種反抗，是這樣的頑強，他能夠採取這樣複雜的形式，使對於他們的鬥爭，不可免的要拖延

一些時候，或許要經過幾個月，才能結束其中最主要的反抗形式。如果不堅決地戰勝資產階級及其走狗的消極的與隱藏的反抗，那麼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四、最後，以社會主義來改造俄國的組織的任務，是非常的巨大與困難；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帶滿小資產階級旅伴，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文化程度不高的條件之下，要解決這些組織任務，也要經過極長的時間。

五、把上述情形，總結起來，那麼可以看到俄國爲要獲取社會主義的成功起見，必須有一定的至少要有幾個月的休息時期，在這時期中，社會主義的政府，應該有空閒的手，首先去戰勝本國資產階級，并整頓廣大的深刻的組織工作。

六、在大戰的第四年，國際形勢，已經變到了這個地步，使爆發革命及推翻某些歐洲帝國主義政府（德國也在其中）的時機，近在目前；全部新的蘇維埃政權，應該根據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狀況去決定一切國際的任務。無疑的，社會主義革命，一定會在歐洲發生，并且將要發生。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全部希望，

都是根據於這種信心與這種科學的預察之上的。我們一般的宣傳工作，特別是組織交戰國士兵聯歡的工作，應該加緊，應該擴大。可是，如果企圖決定歐洲的革命，特別是德國的革命，是否能在最近半年來（或類似的極短時期）爆發，而在這點上面建立俄國社會主義政府的策略，那麼這就是一種錯誤。因為這點是無論如何不能決定的，此種企圖，客觀上祇成盲目的賭博。

七、布列斯脫·立托夫斯克的和平談判，到現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七號，已經明白地指出：在德國政府內（德國政府，正拖着其他四個同盟的國家前進）當權的是軍人的黨，他在實際上，已經向俄國下哀的美敦書（我們應該日夕等着，應該等候他正式提出），這個哀的美敦書是如此：或是繼續戰爭，或是締訂割地的和平，這個和平帶着這樣的條件：即我們應該放棄全部我們所佔據的土地，而德國人則保留全部他們所佔據的土地，並且我們應該負責賠款（表面上說是給養俘擄的費用），賠款數目，約三十萬萬，分幾年支付。

八、在俄羅斯社會主義政府之前，發生了急待解決不容或緩的問題：接受這個

割地的和平呢，還是立刻進行革命的戰爭？這上面不能有折衷的解決辦法。再往下延宕，已經不能了，我們在勉強延宕談判上面，已經用盡一切力所能及的辦法了。

九、在研究那些贊成立刻進行革命戰爭的理由時，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理由，說：現在單獨的和平，在客觀上是和德國帝國主義者妥協，是『帝國主義的交易』等等，所以這種和平，是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完全相違背的。

但是這個理由，顯然是不對的。工人在罷工中失敗了，簽訂對於自己不利對於廠主有利的復工條約，這些工人並沒有叛賣社會主義。要是誰取消有利於一部分工人的條件，而代以有利於廠主的條件，那麼他就是叛賣社會主義；祇有這種協定，才是原則上所不容許的。

誰要是把反對德國帝國主義的戰爭，稱作自衛的和公平的戰爭，而在實際上却得到英法帝國主義者的幫助，對人民隱瞞和他們所訂立的秘密條約，那麼這人就是叛賣社會主義。誰要是對於人民沒有絲毫隱瞞，沒有訂立任何秘密條約，而因目前力量不足以繼續戰爭，所以答應簽訂不利於弱國而有利於一部分帝國主義者的和平

條件，那末他是絲毫沒有叛賣社會主義的。

十、贊成立刻進行戰爭的另一個理由是說：我們訂立和平，客觀上就成德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因為這樣使他能夠調回我們戰線上的軍隊，並得數百萬的俘虜等等。這個理由顯然也是不對的，因為目前的革命的戰爭，也使英法帝國主義能夠得到他們所希望的力量，因之就使我們在客觀上要成爲英法帝國主義的走狗，英國人直接向我們總司令克羅倫科提議，如果我們繼續戰爭，他們可以供給每月每人一百盧布。假使我們不向英、法人要一個銅幣，而還是牽制一部分德國的軍隊，那麼我們在客觀上也是幫助英法帝國主義的。

這上面，我們在兩方面都不能完全脫離帝國主義的連繫：並且顯明的，如果國際帝國主義沒有推翻，那麼要完全脫離這種連繫，是不可能的。這上面正確的結論，應該是：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政府得到勝利以後，解放問題，不應該從挑選那個帝國主義的觀點上出發，而應該看，爲鞏固及發展已經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起見，那些是最好的條件；我們應該從這個觀點上出發去解決問題。

換句話說：作爲我們策略基礎的原則，不是我們幫助那方面帝國主義者比較有利，而是怎樣可以更正確地可靠地使社會主義革命能夠鞏固起來，或者至少使他在別的國家未加入以前，能夠單獨支持下去。

十一、有人說，社會民主黨內反對戰爭的人，變成了「戰敗派」（即希望祖國戰敗）他們要求我們不要對德國帝國主義讓步。但是我們祇承認本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應該敗退，我們永是拒絕在形式上或在事實上和「友好」的帝國主義聯合，以戰勝他國帝國主義，我們以爲這是原則上不能允許的，而且一般的講沒有用處的辦法。

所以這個理由，祇是前一個理由的變相。假使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爲擔保某個時期內的德國的革命運動起見，向我們提議，把單獨的和平拖延到某個時候——那麼這時在我們看來，問題就或許帶着不同的性質。可是德國左派非但沒有這樣說，而且還相反的正式聲明：「在可能的時候，堅持下去呵，你們按照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形勢，解決問題罷，因爲現在關於德國的革命，還不能預先說什麼好話。」

十二、有人說，我們在黨的許多聲明書上，『允許』在帝國主義時代，爲社會主義政府進行革命的戰爭，如果訂立單獨的和平，就是自食前言。

這是不對的。我們說過，應該在帝國主義時代，爲社會主義政府『準備和進行』革命的戰爭；我們說這句話，是爲反對抽象的和平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時代完全否認『保護祖國』的理論，最後更反對一部分兵士的利己的本能；可是我們如果沒有估計到某個時期的可能性，那末我們是決不擔負開始革命戰爭的責任的。

就是現在，我們也應當無條件地準備革命戰爭。我們執行這個允許，好像我們一般地執行我們能夠立刻實行的一切允許一樣：我們破裂了祕密條約，向各國人民提議公正的和平，用盡方法好幾次地拖延和平的談判，使其他人民可以共同加入。

現在能否立刻進行革命的戰爭，要解決這個問題，應該專門估計到實行戰爭的物質條件，以及已經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利益。

十三、如果把贊成立刻進行革命戰爭的理由總起來看，那麼應該得出結論，就是這個政策，或許適合要想漂亮，有力，出色的那種人的需求，可是完全沒有顧到

社會主義革命開始時期客觀上階級力量與物質原素的關係。

十四、無疑的，在目下以及最近幾星期內（或許在最近幾個月內）我們完全沒有能力抵抗德國人的進攻，第一因為供給糧食，替換病卒的事，做壞得不堪設想，所以大部分兵士，都是疲倦憔悴到極點；第二，因我們騎兵隊完全無用，所以不可避免的引起我們砲兵隊的覆滅；第三，完全不能保護從里加起到萊維爾為止的那個邊岸，因此使敵人有確定的機會可以佔領里庫良地亞（即今拉脫維亞）及愛斯塔良地亞（即今愛沙尼亞）的其餘部分，而更往前，從後方襲擊我們軍隊，以至最後佔據彼得堡。

十五，再次在我們軍隊中佔據大多數的農民，將無疑的贊成割地的和平，而不贊成立刻的革命戰爭，因為建設社會主義的革命軍隊以及把赤衛隊參入軍隊之中的事業，還祇在開始。

在軍隊完全民主化的條件之下，如果違反大多數士兵意志而進行戰爭，那麼這是冒險；要建設真正鞏固的思想上的堅定的軍隊，至少需要好幾月。

十六、俄國的貧農能夠幫助工人階級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可是他們在目下沒有能力立刻進行嚴重的革命戰爭。如果在這個問題上忽略客觀的階級關係，那末這就是犯了天大的錯誤。

十七、所以目下關於革命的戰爭，情形是如此：

假使德國革命，會在最近三四月內發生，那末立刻進行革命戰爭的策略，或許不會葬送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

假使德國革命，在最近幾個月內不能爆發，那麼在繼續戰爭的狀況之下，事變的進程，將必然採取這樣的形式：嚴重的失敗，將推翻社會主義的政府，而建立別個政府（例如資產階級的烏克蘭國會 [Radko] 與邱爾諾夫派的聯盟政府，及其他），因為在戰爭中顛連死亡困苦不堪的農民軍隊，在初次敗仗以後，不需要一個月，或是祇經一星期，就可以把社會主義的工人政府推翻。

十八、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如僅僅因為計算德國革命，或許能在最近的短期內的幾星期內爆發，而把已在俄國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作為孤在之一擲，那麼

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策略。這種策略，祇是冒險。我們沒有權利，來冒這樣的險。

十九、如果我們締結單獨的和平，那麼德國革命根據他的客觀基礎，也不會因此而受防礙。或許狹隘愛國主義的瘴氣，暫時能夠削弱德國革命，可是德國的情形，還是困苦到極頂。對付英法的戰爭，將拖延下去；雙方的急進的帝國主義，將都被完全的澈底的揭破。

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例子，將成爲各國人民的活的模範，這個模範的宣傳力及其促進革命的力量，是大得非常的。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制度，和兩隊強盜的面目畢露的掠奪的戰爭，而他方面則是和平及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共和國。

二十、我們締結單獨的和平，並且在目下盡最大的可能，去脫離兩個敵對的帝國主義集團，利用他們的仇視和戰爭，去阻礙他們聯合反對我們的協定，因之我們就可以利用一定的空閒時期，來繼續和鞏固社會主義革命。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之上，在國有銀行，國有大工業的基礎之上，在城市和鄉村小農消費合作社互相交換物品的條件之下，如果有幾個月和平工作的時間，那麼改組俄國，在經濟上，完

全是可能的。這種改組，使社會主義在俄國在全世界上成爲無敵的力量；因之他就可以爲強大的工農紅軍造成堅固的經濟基礎。

廿一、社會主義共和國反對資產階級國家的戰爭，才是現在真正的革命戰爭，此種戰爭具有推翻他國資產階級之目的，此種目的完全爲社會主義軍隊所贊同。可是在目前，我們顯然不能以此爲目的。我們在客觀上，儘願意爲解放波蘭立陶宛，庫良地亞等而戰爭。但是任何馬克斯主義者，要是他沒有脫離馬克斯主義和一般的社會主義，那麼他總不能否認，社會主義的利益是高出於民族自決權的利益之上的。我們社會主義共和國已經採取并且正在採取力所能及的一切辦法，以求實現芬蘭，烏克蘭等地的民族自決權。但是如果是在具體的情形下，爲着幾個民族（波蘭，立陶宛，庫良地亞等）的自決權，要使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存在，發生危險，那麼我們自然要以保護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利益爲重。

所以說：「我們不能簽訂叛賣波蘭等地的可恥與卑賤的和約」，說這種話的人沒有見到，即使他根據解放波蘭的條件來締結和約，他也祇是更加強了德國帝國主

義，來反對英國、比利時、塞爾維亞等國。以解放波蘭、立陶宛、庫良地亞爲條件的和約，從俄國的觀點上看去，或許是「愛國的和約」，可是這個和約，還仍舊毫無變更的是和割地者和德國帝國主義者所訂立的和約。

(作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登載於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第三十四號的真理報)



民國九年
教育部補助

中華民國九年拾月壹日 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2878403



\$0.45



國家圖書館



002878403

